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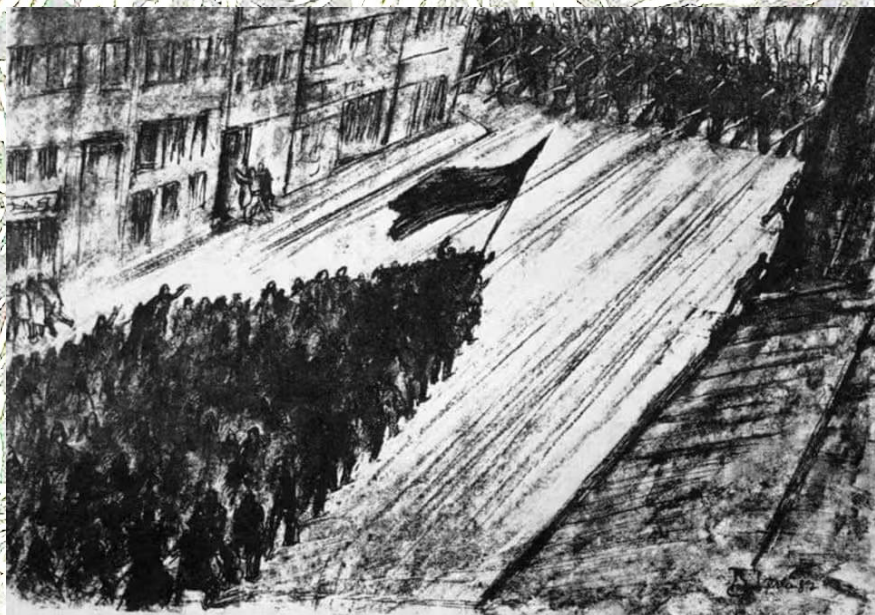
不向风暴低头

战时日本印刷出版工人的抵抗

原著 杉浦 正男

根据凯·布罗德本特与佐藤爱翻译的英文版转译

译者 龚义哲



• 制作 **彼得格勒来信** 公众号 (2021年)

不向风暴低头

战时日本印刷出版工人的抵抗

原著 杉浦 正男

根据凯·布罗德本特与佐藤爱翻译的英文版转译

译者 龚义哲



• 制作 彼得格勒来信 公众号（2021年）

谨以此书纪念出版工俱乐部的会员们，
以及所有反抗压迫、争取建立一个更美好的
世界的活动家们。



英译者序.....	1
导言.....	6
日文第二版序言.....	15
本书中出现的组织.....	16
第一章 在狱中迎来战败的那一天.....	20
通过从对面房间打来的暗号，得知了战败.....	20
由于恶法《治安维持法》而沦为“罪犯”.....	21
第二章 黑暗的时代.....	25
与我们的导师柴田隆一郎的相会.....	25
我的出身.....	26
三十年代的青年.....	28
第三章 播种者——出版工俱乐部的筹备时期.....	32
战时体制的加强.....	32
成立文学同好会.....	33
同人杂志《步》的发行.....	35
第四章 失败与新的出发.....	38
东京印刷罢工.....	38
三十五家公司的工人联合募捐活动.....	40
罢工陷入了困境.....	42
和工会的成立.....	44

第五章 同阻挠组织活动的敌人作斗争	46
和工会的敌人	46
在军国主义日渐强大的时日里	52
二·二六事件	53
安久公司罢工	55
和工会改组为出版工俱乐部	59
第六章 与广大群众相结合	63
成立出版工俱乐部的准备工作	63
以群众为基础建立组织	68
出版工俱乐部的多方面活动	73
是联谊会还是工会?	78
第七章 工人运动在协助战争中走向失败	83
径直奔向侵略战争	83
努力培养活动家	85
困难时期的干部	90
第八章 放低姿态, 进一步走向群众	93
出版工俱乐部的会员倍增运动	93
“海之家”的活动	106
以工厂为中心的活动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110
出版工俱乐部是如何在镇压之下发展起来的	116
关于扩大组织的指导	121
第九章 工会运动的覆灭与产业报国会的成立	124
落入了配合战争的罗网	124
产业报国会的组织化	126
贯彻到底的解散令	129
寻找保存俱乐部的方法	132

转入地下活动的出版工俱乐部	135
地下活动	139
躲避警察的耳目	143
在严酷镇压下残存的妇女组织	148
第十章 地下活动时期遇到的各种困难	150
会员的剧减	150
离开导师	155
第十一章 接连不断的镇压	159
对出版工俱乐部的镇压	159
凄惨至极的拷问	164
第十二章 日本的战败正在迫近	167
绝望的战局与监狱内的状况	167
与柴田重逢	172
生活物资的匮乏与言论管制	175
第十三章 导师殒死狱中与战败	178
失去了两位无可替代的人	178
出狱之日	182
第十四章 播下的种子有了收获	186
俱乐部会员们站起来了	186
参与创立产别会议	190
日文第二版后记	198
访问杉浦正男先生	202
译后记	207
参考书目	211

英译者序

我的许多研究成果都是得自幸运，而促成本书的原因也不例外。2012年，我与汤姆·奥林肯（Tom O’Lincoln）合写了一本书，主题是二战期间日本的抵抗运动，在为撰写这本书的其中一章而研究原始资料的时候，我偶然发现了一笔小小的宝藏——我在日本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¹的劳动图书馆里找到了一本书，书名叫做《战时印刷工人的斗争记录》（戦時中印刷労働者の闘いの記録）。这本书详细记录了“出版工俱乐部”（出版工俱樂部，下文简称“俱乐部”）在战时成立与活动的经过，它由俱乐部的幸存会员在1964年编纂而成并自费印发。他们编写这本书，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导师与同志柴田隆一郎（本名柴田隆一），他在裕仁天皇宣告投降前几个月死于狱中。他们在这本书中描写了柴田英勇不屈的精神，表达了同志们对柴田的钦佩和敬仰，并将这本书献给柴田的家人留作纪念。

通过研究，我得知有不少日本工会隶属于日本共产党创建的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日本労働組合全国協議会）。我相信，尽管在战前和战时有大批左翼政治活动家和团体遭到了国家的严酷镇压，但是，工会反抗的故事一定不会少。在此之前，我还没有找到能够证实这种观点的原始材料或研究成果。能找到这本书，简直就是中了大奖。

为了把这个工会和它的会员们的故事介绍给英语读者，我急切地想与俱乐部老会员交谈。显然，俱乐部会员就算还活着，也早已年老体衰了。我找到了这本书的第二版：《年轻人不向风暴低头：战时印

¹ 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是日本最早的专门研究社会科学的机构，专攻社会与劳动关系研究，成立于1919年，1949年因财政困难而挂靠法政大学。发行《日本社会运动史料》、月刊《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杂志》、年刊《日本劳动年鉴》等重要史料。——中译者注

刷出版工人的抵抗》(若者は嵐に負けない—戦時下印刷出版労働者の抵抗)，这一版是 1981 年出版的，现在这个英文版就是按照日文第二版翻译的。

2016 年初，我联系了老朋友小畑精武²，他是日本的一位工运活动家，非常博学多闻。他告诉我，这本书的作者杉浦正男先生依然在世，而且就住在东京附近。在得知这个消息时，我的欣喜之情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作为一个活动家和一个研究者，我的梦想成真了！

2016 年 5 月，我赶到了东京。尽管杉浦先生年事已高（在接受采访时，他差不多 102 岁了），我们还是谈了两个钟头。离开他家时，我对日本劳动人民在战时面临的困境，特别是对他和他的同志们在战争期间坚持建设工会、坚持进行左翼政治活动时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个英文版当中也收录了这次采访的修订版本。

我特此衷心地感谢杉浦正男先生准许我们翻译这本书并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采访，感谢他和他的同志们、支持者们不顾国家的严酷镇压和酷刑，为了维持和提高工人阶级觉悟而付出的努力。这段抵抗的历史将给未来的世代留下宝贵的财富，使他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世界历史上的这一时期。出版工俱乐部的历史，给予了我们希望和激励，并构成了斗争传统的一部分，这个传统是由世界各地的活动家们共同塑造的，他们早在我们之前就开始了斗争，并为我们现在为之斗争的一切铺平了道路。

² 小畑精武（小畑 精武/おばた よしたけ，1945 年 7 月——），毕业于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曾任江戸川区工会协议会（江戸川区労働組合協議会）事务局长、江戸川工会（江戸川ユニオン）首任书记长，现任现代劳动研究会（現代の労働研究会）代表。——中译者注

我还要感谢下列的人：小畑精武为我牵线，使我见到了杉浦先生，他还同我分享了关于日本工会运动的知识，近三十年来，他一直是我的朋友，一直都在支持我；小畑美智子（Obata Michiko）给我传授了大量工会活动的知识，增进了我的理解；寺间诚治³向我介绍了日本工会运动，使这段历史能够早日得见天日；藤田广登⁴准许我发表这段历史，并对历史方面做了更详尽的解释，还陪同我采访杉浦先生，并准许我采用纪念照片；结城宽子（Yuki Hiroko）协助我把杉浦先生的采访整理成书面语；汤姆·奥林肯和珍妮·斯通（Janey Stone）鼓励我继续进行这项研究；艾伦·迈尔斯（Allen Myers）阅读了手稿，并提出了深刻的问题和意见，使我改善了自己的解释；还有维多利亚·伊万诺娃（Viktoria Ivanova）为本书设计了装帧。我还要感谢社会主义出路⁵的同志们，他们不断地教会了我许多东西：为工人阶级政权而斗争，与被压迫民族的国际团结，并致力于建设一个革命组织。

由于东京和其它地方遭受了大空袭，俱乐部时期的照片和纪念品只有很少留存下来。特此感谢杉浦正男和藤田广登准许本书收录这些照片。

翻译这本书是我长期以来的梦想。我要特别感谢佐藤爱，她协助

³ 寺间诚治（寺間 誠治/てらま せいじ），大学毕业后，曾任京都国家公务员工会共斗会议（京都国家公務員労働組合共闘会議）组织者、事务局次长；1981—1986年任日本国家工会公务员工会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1986—1989年任京都地方工会总评议会（京都地方労働組合総評議会）常务干事，1989—2002年担任全国工会总联合会（全国労働組合総連合）企画局长、调查政策局长、教育宣传局长、综合劳动局长、组织局长，2002—2010年担任工人教育协会（労働者教育協会）副会长，现任工人教育协会常务理事。——中译者注

⁴ 藤田广登（藤田 廣登/ふじた ひろと，1934——），生于长野县諏访郡，毕业于冈谷工业高校。曾在化学公司工作，后来进入工人教育协会和学习之友社（学習の友社）工作，现任工人教育协会理事。——中译者注

⁵ 社会主义出路（Socialist Alternative）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左翼组织。——中译者注

了本书的翻译工作，大大提高了英文版的准确性。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们想要尽量还原原文的风味，所以我们保留了日文版的许多句式，但为了使英语读者便于接受，我们也做了一些修改。

按照日本的习惯，作者用姓氏来称呼书中的人物，只有在同姓的情况下，才会用名字来区分。在大多数情况下，作者省略了日语中一般加在姓名后面的尊称“さん”，我们也就照此办理。对于书中出现的各种组织，我们采用简称，比如和工会就简称为 Society⁶，出版工俱乐部简称为“俱乐部”。对于长音，我们用在元音上加一横的方式来表示，但是那些在英语中比较常见的词汇，比如 Tokyo（东京）或 Yokohama（横滨）中就省略了长音符号⁷。作为本书译者，我们对译文中的任何错误承担全部责任。

凯·布罗德本特（Kaye Broadbent），布里斯班，2019年2月

我要向杉浦先生的毕生斗争和这本重要著作致以最大的谢意。我衷心地感谢凯邀请我参加本书的翻译工作。作为在太平洋战争结束数十年后才出生的日本人，我并不一定熟悉书中的各种事件的细节。但我却非常清楚，杉浦先生是出于对反动倾向的担忧，才创作本书的。我甚至可以说，如今这种担忧正在变得越来越强烈。统治日本的极右势力仅仅是冰山一角；整个世界似乎充满了纷争，隔阂在不断加深。

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杉浦先生的这本书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它介绍了杉浦先生和他的同志们为了反抗政府压迫而进行

⁶ 由于“和工会”用汉字书写十分简短，在译成中文时就直接使用“和工会”，不采用简称。——中译者注

⁷ “东京”（とうきょう）的拉丁化转写（罗马字），严格来说应为 Toukyou，然而习惯上都写成 Tokyo；但“横滨”（よこはま）的读音中并无长音。——中译者注

的可歌可泣的斗争，也是因为它道出了普天下的不屈精神，教会我们睁开眼睛，看清现实，鼓励自己迈出前进的步伐，满怀希望地开辟自己的道路。它教给我们怎样像杉浦先生令人信服地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向风暴低头”。

佐藤爱 (Sato Mana), 东京, 2019 年 2 月

导言

出版工俱乐部（以下简称“俱乐部”）的历史，可以使我们洞悉，在日本扩军备战和随后的战争时期（1931—1945）⁸，日本劳动人民，特别是左翼和工会活动家，面临的是怎样的艰难时世。从俱乐部的故事中可以看出，会员们是如何坚韧顽强地创立和扩大俱乐部的，在这段黑暗、艰难的时期中，同志们又坚韧顽强地呵护了日本工会运动与政治活动的种子，并为未来撒下了种子；为了躲避警察的严酷镇压和严厉审查，他们不得不在巨大的压力和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活动。一旦被捕，就要遭受监禁和酷刑。

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是怎样使国家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这在西方早已广为人知。然而，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抵抗却鲜为人知。社会党和共产党都有自己的史书；但是，军事工业中的反战活动、罢工和其它形式的抵抗，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记载。俱乐部及其会员的故事，是日本工人阶级的非凡抵抗的一个组成部分。

本书讲述的各种事件，主要发生在日本军国主义急剧膨胀的时期，特别是在卢沟桥事件之后；书中还提到了较早的时期，那时人民的政治权利和民权就已经开始受到限制了。

在明治时期（1868—1912），日本走出了近二百年的闭关锁国状态。日本统治集团陷入了危机之中，在经过一连串的斗争之后，政权才巩固下来，天皇重新成为了象征性的国家元首，权力集中在一小撮元老政治家手中。日本经历了剧烈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转型。

⁸ 我这里采用“十五年战争”的说法，即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为止；另请参阅 Banno, 2014 年。——英译者注

在 1894—1895 年，为了争夺朝鲜半岛，中日两国爆发了甲午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日本的军事实力受到了考验。中国的战败，使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朝鲜半岛和满洲成了俄国与日本角逐的焦点，日本在满洲和库页岛部分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加强。

1912 年，明治天皇死后，由他的儿子继位，年号为大正（1912—1926）。历史学家认为，与大正时期之后的二十年相比，大正时期比较平静、繁荣。在大正时期，政府虽然稍为民主一些，但总体上是保守的。尽管在 1923 年的关东大地震中有十五万人丧生，东京和横滨的工业能力大半被毁，但制造业的产量还是翻了一番。

日本继续进行军事扩张。由于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加了协约国，所以它获得了德国在中国、满洲、内蒙古的权益及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大大扩张了它的势力范围。这有一部分也是因为协约国入侵俄国，同红军战斗，直到 1925 年才撤离俄国。1919 年，大正天皇由于精神崩溃而不能视事后，就由他的儿子裕仁代行官方职务；1926 年，大正天皇死后，正式传位于裕仁，年号昭和⁹。

人民的不满日渐加剧，左翼思想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让统治集团深为不安，再加上社会变革的影响，统治集团便采取措施，阻止“危险思想”的传播。比方说，他们在 1925 年通过了《治安维持法》，1928 年，大批左翼政治家在议会选举中当选后，他们又利用《治安维持法》去镇压。规模虽小、却在日渐壮大的日本共产党的大多数党员都被捕入狱了¹⁰。对于集会的镇压越来越严酷，共产党员及同情者是镇压的主要受害者。在 1922 年、1928 年和 1929 年 4 月，发生了一连串针对“赤色分子”的大逮捕、大屠杀和大审讯。仅在 1928 年 3 月 15 日这一天，就有 1200 多名共产主义者和同情者被捕，在 1929 年又有

⁹ Morris-Suzuki 1984:3。——英译者注

¹⁰ Morris-Suzuki 1984:6。——英译者注

700 多人被捕¹¹。在三十年代，对共产主义者的镇压继续进行¹²。在 1932 年 10 月，全国有将近 1500 名活动家被捕。被警察关押的人不明不白地死去的报道，在报纸上不断出现。

岩田义道¹³和小林多喜二¹⁴之死是最著名的事件，在此有必要讲一下。本书中也提到了他们的名字，而他们的经历，证明了杉浦、田口和柴田在狱中遭到的酷刑是特高警察的惯用手段。岩田义道是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死于 1932 年 11 月 13 日，这次事件非常轰动，后来又被压了下去。尽管官方声称他死于脚气病和心脏病的并发症，但在尸检中发现他根本没有这两种病，反倒发现了体内大出血、胸腔和大腿肿胀的痕迹。岩田的父母要求对他的死因进行调查，并认为警方的几个审讯员和特高警察头目是杀害他们儿子的凶手。但是，在东京地方法院的压力下，岩田的父母放弃了要求。小林多喜二是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蟹工船》就是他的名作。他于 1931 年入党，曾多次被捕和遭受刑讯。1933 年 2 月 20 日，他在刑讯中被拷打致死¹⁵。

随着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对人民的管控愈加严厉，镇压也愈加严酷。1929 年，一个军方头目写道：“为了维持国内的政

¹¹ 这两次大搜捕就是著名的“三·一五”与“四·一六”事件。——中译者注

¹² Hanc 2000:123。——英译者注

¹³ 岩田义道（岩田 義道/いわた よしみち，1898 年 4 月 1 日——1932 年 11 月 3 日），生于爱知县叶栗郡，毕业于松山高等学校后，考入京都大学，师从河上肇，1925 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捕，被监禁十个月，又被大学开除。1927 年 12 月参加日本共产党，当选为中央委员。1932 年 10 月 30 日被特高警察逮捕，11 月 3 日在审讯时惨遭杀害。——中译者注

¹⁴ 小林多喜二（小林 多喜二/こばやし たきじ，1903 年 12 月 1 日——1933 年 2 月 20 日），小说家，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人物。生于秋田县北秋田郡的一个小农家庭，1924 年毕业后进入北海道拓植银行工作。1929 年发表《蟹工船》，立即成为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旗手。1930 年担任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书记长，1931 年 10 月参加日本共产党，1933 年 2 月 20 日被特高警察逮捕后，在审讯时惨遭杀害。——中译者注

¹⁵ 消息来源：Mitchell 1992:82-3。——英译者注

治稳定，日本必须向海外扩张¹⁶。”在三十年代初，内阁会议的参加者反复抱怨说，国内的动荡“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妨碍了国防¹⁷”。

在九一八事变中，日本侵占了中国北方的三个省份，扶植了傀儡国“满洲国”，然后又在1932年9月正式承认了“满洲国”。

在三十年代中期，军部和文官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1936年2月26日，一批青年陆军军官发动政变，企图以天皇的名义，消灭“邪恶”的日本政府。陆军有大约1500人参加了政变，但忠于政府的有14000人¹⁸。这次政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政府加强了对民间政治活动的限制，并以这次政变为借口，禁止了1936年的五一节活动¹⁹。1940年，政府成立了由自己控制的工人组织——产业报国会，这个组织是专门为全职工人设立的，政府还为非全职工人设立了另一个组织。在产业报国会里，政府和雇主把企业当作一个大家庭。在右翼工人领袖的配合下，警察在每一个工厂里组建了产业报国会，并对其加以督导，企图迫使工人无条件地接受强迫劳动、加班和低工资。

在这一时期，统治阶级的行动并不是没有受到挑战，社会动荡和抵抗是这个时期的重要特点²⁰。在明治时期，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了日本。争取男性普选权（1925年赢得）、社会福利与工人权利的要求是关键。社会主义者试图建立反对日俄战争的运动，他们在自己的报纸上指出：“资产阶级大发战争财，牺牲的却是平民²¹。”对政治制度的幻灭、通货膨胀、严厉的政策和极为有限的民权，激起了大量的抗议，参加者主要是学生、工人、农民和少数民族。1906年，日本社会党成立；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1919年，日本劳动总同盟成立。

¹⁶ Iegana 1979:11。——英译者注

¹⁷ Gordon 1991:264。——英译者注

¹⁸ Banno 2014:217。——英译者注

¹⁹ Shioda 1982:119。——英译者注

²⁰ 这一节内容摘自：Broadbent and O'Lincoln 2015。——英译者注

²¹ Ienaga 1979:13-14。——英译者注

1922年，水平社成立，它是部落民的代表，提出了部落民的要求；部落民尽管属于日本民族，但由于他们以前从事屠宰牲畜、鞣制皮革等佛教眼中的“贱业”，而长期饱受歧视。这些新成立的组织全都试图向统治集团表达深重的愤怒与仇恨。总同盟是日本最大的工会联合会，尽管它谴责日本对俄国革命的干涉，并要求朝鲜自治，但它的激进主义并没有坚持多久。

左翼文化在二十年代的气氛中诞生了，并形成了对不断发展的军国主义的批判的基础。持续不断的镇压，破坏了许多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宣泄途径，但是，在工厂和农村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小圈子，使工人和农民能够发展出自己的文化。处于地下状态的日本共产党就通过这些圈子开展地上活动，它在传播反战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革命思想这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²²。

通过本书介绍的俱乐部历史，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些活动是如何开展的。重要的是，它使我们对战争带给人民的深重灾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还使我们能够了解到日本人民对政府的扩军备战进行了怎样的抵抗，这样的资料正在不断增多²³。这段历史还能有力地反驳这种观点：日本工会运动全面配合了国家对工人的镇压，要不就是干脆彻底消失了。

战时的工会组织率非常低，只有5%。尽管如此，战时的产业行动却非常频繁。1931年有2456次罢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罢工的数量下降了，但在1937年，罢工的次数却达到了2126次，有231622名工人参加了罢工²⁴。1932年3月，在全协的领导下，东京地铁工人举行罢工，并赢得了胜利，改善了工人的状况。这次罢工的胜利产生

²² Broadbent and O'Lincoln 2015:297。——英译者注

²³ 比方说，请参阅：Dower,1993。——英译者注

²⁴ 如无特别说明，关于日本工会运动的信息均来自：Broadbent and O'Lincoln 2015:299-301。——英译者注

了广泛的影响。本书中提到的东京印刷公司罢工和安久罢工就是在它的影响下发生的；俱乐部的会员们积极参加了支援罢工的活动。

在三十年代，日本工会运动的成员积极参加了反战、反军国主义的活动，但在 1937 年，许多主流工会不再积极地进行产业行动，实际上丧失了工会的职能。地下工会也在这时候遭到了镇压。从 1931 年开始，总同盟的工会合约中就加入了“产业报国”的承诺²⁵。1940 年 7 月，总同盟解散了，没有参加总同盟的工会也大都解散了。

尽管工会运动瓦解了，但在军事工业里，却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产业纠纷。在全国范围内，由于工人的阶级觉悟高涨，由于工人反对战争，爆发了许多斗争²⁶。比方说，在 1942 年，在被海军控制的钢铁厂里，工人在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和领导下，提出了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他们利用怠工进行抗议，采用了包括故意生产废品在内的各种手段。日立公司龟户（东京的一个工人阶级居住区）工厂的工人也进行了同样的怠工行动，迫使管理层同意加薪²⁷。

本书以日本投降、盟军占领日本为开端。这次占领本来应该是人道主义的，本应扶持民主、树立和平劳动。但它实际上却是种族主义的、报复性的，对富人有利的，并使日本重新开始武装。远东美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下令，不得与日本人进行友好活动，尽管许多日本人正在忍饥挨饿，也不能救济他们。西方对日本的改造是半心半意的，因为在中国和朝鲜击退共产主义更加重要。战争结束后被清洗的人，现在又成了反共盟友，而左派又遭到了猎捕。曾为占领当局工作过的托马斯·A·比森²⁸在日记中写道：“日本旧体制遭到的

²⁵ Gordon 1991:299。——英译者注

²⁶ 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 1965:18。——英译者注

²⁷ Fujihara 1975:208-210;293-294。——英译者注

²⁸ 托马斯·阿瑟·比森（Thomas Arthur Bisson, 1900—1979），中文名毕恩来，1923 年毕业于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随后前往中国，曾在北京大学执教，1928 年返回美国，入读哥伦比亚大学。三十年代在外交政策协

唯一一次真正的挑战，已经退去了²⁹。”

工人阶级迅速明白过来：它只能依靠自己的行动，不能指望占领军的帮助。日本统治阶级在战争中元气大伤，使工人阶级获得了斗争的空间。战后，工人阶级对工会运动和产业斗争的兴趣大增。1945年年底，工会会员的总人数为60万人，到了1948年6月，工会会员总人数猛增到670万人，换句话说，53%的劳动人口参加了工会³⁰。对粮食匮乏的抗议，在1946年五一节游行中达到了顶点。大约二百万人参加了这次抗议，仅在东京就有五十万人参加。日共书记长德田球一³¹高呼“打倒天皇！”，赢得了长时间的喝彩。一位观察者写道，那一天充满了“一种奇怪的欣喜——或许正是战俘重获自由时的那种狂喜³²”。

本书正是日本阶级斗争史的一部分，它告诉我们：即使是在最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中，工人群众仍然会进行罢工、斗争，会组织起来。但是，他们坚持反抗军政权的斗争，却使他们个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在军国主义时期，杉浦和其他活动家力图保存日本工会运动的传统，他们的努力在战后立即收到了成效，俱乐部的许多会员都在这项

会（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工作。1937年前往延安，采访了多位中共领袖，并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日本侵华》（Japan in China）。日本投降后，前往日本，参加了解散财阀、制定新宪法的工作。1948年回国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1979年逝世。——中译者注

²⁹ Finn 1992:141。——英译者注

³⁰ Nimura 1994:67。——英译者注

³¹ 德田球一（德田 球一/とくだ きゆういち，1894年9月12日——1953年10月14日），生于冲绳县名护市，毕业于日本大学夜间部，当过律师。1920年参加日本社会主义同盟，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时即加入，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2月26日被捕，直到1945年10月10日才获释。1945年日本共产党重建后，于1945年12月在日共四大上当选为书记长。1946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1950年由于“清共”运动而转入地下，1950年10月流亡中国，在北京遥控日共活动。1955年在北京逝世。——中译者注

³² Moore 1983:177-178。——英译者注

活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书讲述的故事，是在军国主义日益猖狂、工会活动不断遭到镇压的背景下发生的。创作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反驳这样一种观点：在战时，日本是没有工会的。杉浦记载了印刷出版工人为了建立“和工会”³³而进行的活动；在东京印刷公司罢工后，印刷工人为了有一个能够代表普通工人的利益的组织，而在1935年建立了和工会。随后，和工会又改变了行动方针，在1937年改为出版工俱乐部，这样做是为了以一切可行的手段同工人群众保持联系。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杉浦和他的同志们面临着危险、监禁和拷打，但正如他说的：

我们做了对于现在的任何一个工会活动家来说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事……在战时法西斯主义的镇压下，日本的工会全军覆没了，尽管如此，出版工俱乐部仍然保卫了组织，没有让印刷出版工会的血脉就此断绝。

1977年11月6日，为了纪念俱乐部、柴田隆一郎和白石光雄的功绩，人们在东京葛饰区（一个工人阶级居住区）乘愿寺³⁴里立起了一座纪念碑。这是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地点，因为这个寺庙离柴田和白石曾居住多年的地区很近。碑文是由当时的日共议长野坂参三³⁵撰

³³ “和工会”的意思是“日语印刷出版工人协会”。——中译者注

³⁴ 乘愿寺（乘願寺）位于东京都葛饰区高砂八丁目，属于真宗大谷派。——中译者注

³⁵ 野坂参三（野坂 参三/のさか さんぞう，1892年3月30日——1993年11月14日），生于山口县萩市一个商人家庭，本名小野参式，9岁时过继给母亲娘家野坂家后改姓野坂。1912年入读庆应义塾大学，在学期间开始参加工人运动。1919年前往英国，参加了英国共产党。1922年参与创立日本共产党。1931年流亡苏联，1940年前往延安，组织日本工农学校，1944年创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在被俘的日本士兵当中开展反战宣传教育活动。1946年回国，参加了日共的重建工作，同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1950年流亡中国。1955—1958

写的。

1964年，为了缅怀柴田，保存战时日本工会运动的记忆，杉浦创作了本书的第一版：《战时印刷工人的斗争记录》（戦時中印刷労働者の闘いの記録），这本书的写作得到了32位俱乐部幸存会员的协助，汇聚了他们的回忆³⁶。1981年，为了向新一代工会活动家传授工人抵抗的历史，并鼓舞其他人行动起来，这本书又出了第二版：《年轻人不向风暴低头：战时印刷出版工人的抵抗》（若者は嵐に負けない—戦時下印刷出版労働者の抵抗）。

杉浦正男指出：俱乐部活动的参加者当中，有些人确实是具有阶级觉悟的，但也有不少人只是单纯的支持者，有许多人在斗争中牺牲。他还承认，这些人并没有被遗忘。他们不顾镇压，表现出了大无畏的勇气、信念和积极行动的精神，本书英文版的出版，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事迹。

凯·布罗德本特，布里斯班，2019年2月

年当选为日共第一书记，1956—1977年连续当选参议院议员，1958—1982年当选日本共产党议长，1982年退休。1992年，由于在流亡苏联期间诬陷山本悬藏之事曝光，而被日共开除出党。1993年逝世。——中译者注

³⁶ 但在杉浦正男接受采访时，他说当时幸存的会员有三十六人。——英译者注

日文第二版序言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军部和政府强行解散了日本的工会，拼凑成产业报国会，驱使所有的工人强制劳动。

首都东京的印刷工人虽然拒绝解散组织，但不得不伪装解散，从此开始进行地下活动。

在战争期间，政府为了根绝一切反战行动，利用宪兵（军队的警察）镇压国民，又以《治安维持法》为武器，让特高警察监视一切团体、行动和集会，施行强权政治：警察只要觉得可疑，就可以对任何人进行讯问和搜身，无须持有搜查令即可搜查私宅，可以逮捕任何人并将其投入监狱。

也许有人会以为，在这种情况下，能在战时长久地开展的活动，就只能是极富战斗性的。然而，事实上，必须放低姿态，彻底地贯彻群众路线，以工人的要求为基础而开展活动。

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压迫下，青年印刷工人生气勃勃地开展了斗争，他们活动、学习、保卫自己的生活、争取满足自己的文化要求、进行了反对战争的斗争，然后成长为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把这些经验传给了战后的运动。

在本书中，我想把这些青年工人在战败之前的活动经历记录下来，介绍给现在的许多青年。战争时期和现在的形势不同，所以工人运动的情况也不一样，但我认为，当时的经验，在现在也能派上用场。

一九八一年二月
作者

本书中出现的组织

(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产业报国会（産業報国会）：简称“产报”。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强对工业的控制，而于1938年8月30日成立了“产业报国联盟”（産業報国連盟），在各地特高警察的指导下，在各个工厂内设立了产业报国会。1940年，残存的各种工会组织均被勒令解散，并入产业报国会。产业报国联盟于1940年11月23日改为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大日本産業報国会）。1945年9月解散。

工农党（労働農民党）：1925年12月1日，以日本农民协会（日本農民組合）为首的社会主义势力成立了农工党（農民労働党），由浅沼稻次郎担任书记长，但在成立当天就被当局勒令解散。随后，社会主义势力又在1926年3月5日成立了工农党，由日本农民协会委员长杉山元治郎担任中央执行委员长。同年12月，党内右派分裂出去，成立了社会民众党（委员长为安部磯雄）；中派也分裂出去，成立了日本劳农党（委员长为麻生久）。1928年4月10日再次被当局勒令解散。

工农派（労働派）：日共在1922年成立后，以堺利彦、山川均、荒畑寒村等人为首的一派认为成立共产党的条件还不够成熟，便于1924年3月解散了日共，1925年1月日共重建后，他们反对重建，又于1927年12月创办了《工农》（労働）杂志，此后这一派便被称为“工农派”，它对战后的日本社会党内的主要左派团体“社会主义协会”具有重大影响。

全日本产业工会会议（全日本産業別労働組合会議）：简称“产别会议”。1946年8月21日由21个受日共影响较大的产业工会组成，当时拥有163万会员，占有组织工人的40%以上。1949年以后，由于“清共”运动的打击而急剧衰落，1958年2月15日解散。

日本共产党（日本共産党）：简称“日共”，它是共产国际日本支部，1922年7月15日成立。

日本工会评议会（日本労働組合評議会）：简称“评议会”。关东大地震后，总同盟内部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1924年12月，共产党系工会被总同盟开除，1925年5月，总同盟内的共产主义者脱离总同盟，成立了日本工会评议会。1928年3·15事件之后，评议会于4月10日被当局勒令解散。但是，同年12月，它又以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的名义重建。

日本工会全国评议会（日本労働組合全国評議会）：简称“全评”。九一八事变后，在工会运动当中，出现了以加藤勘十为首的一部分左派，他们主张以阶级斗争主义统一工会运动，并在1934年11月18日成立了日本工会全国评议会，由加藤勘十担任委员长，田部井健次担任书记长。它是日本战前的最后一个合法左翼工会，1937年底因卷入“人民阵线事件”而被勒令解散。

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日本労働組合全国協議会）：简称“全协”。1928年3·15事件后，日本工会评议会被勒令解散，左翼工会遂于同年12月25日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重建了全国性组织，称为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由于日共在工会指导方针上的极左倾向，以及政府的严酷镇压，全协在1934年末瓦解。

日本工会同盟（日本労働組合同盟）：1926年，日本劳动总同盟内以麻生久为首的一派被总同盟开除后，于同年12月4日成立了日本工会同盟。1930年与工会全国同盟（労働組合全国同盟）合并为全国工会同盟（全国労働組合同盟）。

日本劳动总同盟（日本労働総同盟）：简称“总同盟”。前身是1912年8月1日成立的“友爱会”（友愛会），友爱会原先只是一个工人的互助会，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工会，1919年改称大日本劳动总同盟友爱会（大日本労働総同盟友愛会），1921年改称日本劳动总同盟。它是战前日本规模最大的全国性工会组织。1936年1月15日，总同盟与全国工会同盟（全国労働組合同盟）合并为全日本劳动总同盟（全日本労働総同盟），简称“全总”，但本书中继续采用“总同盟”的简称。总同盟在三十年代被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势力把持，主张劳资协调，1937年宣布拥护帝国主义侵略战争，1940年自行解散，并入产业报国会。1946年重建，改称日本工会总同盟（日本労働組合総同盟），仍然简称“总同盟”。1964年与全日本工会会议（全日本労働組合会議）、全日本劳动总同盟组合会议（全日本労働総同盟組合会議）合并为全日本劳动总同盟。

日本无产党（日本無産党）：简称“日无党”。1936年1月，全评、东京交通工会（東京交通労働組合）、东京市雇员协会（東京市従業員組合）、东京汽车工会（東京自動車労組）、关东消费组合联合会（関東消費組合連合会）、全国农民协会（全国農民組合）等8个政治团体组成工农无产协议会（労農無産協議会），1937年3月18日，工农无产协议会改为日本无产党，由加藤勘十任委员长，铃木茂三郎任书记长。日本无产党主张“消灭法西斯”和“无产政治战线的统一”，反

对侵略战争。1937年12月底“人民战线事件”爆发后，日本无产阶级遭到沉重打击，大批活动家被捕，12月22日，日本无产阶级和全评被当局勒令解散。它是战前最后一个合法无产阶级政党。

社会大众党（社会大众党）：简称“社大党”。1931年7月，劳农党、全国大众党、社会民众党等几个无产阶级合并为全国劳动大众党，1932年7月24日，全国劳动大众党又与社会民众党的残余势力合并为社会大众党，由安部磯雄（1865—1949）任委员长，麻生久（1891—1940）任书记长。社大党一面标榜“社会民主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反资本主义”，一面又反对共产主义。在三十年代中期，社大党逐步走上了翼赞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路线，1940年7月6日自行解散，并入大政翼赞会。

特别高等警察（特别高等警察）：简称“特高警察”或“特高”。专门镇压革命运动的特务组织。1910年8月21日成立，隶属于内务省警视厅。1945年10月15日被勒令解散。

第一章 在狱中迎来战败的那一天

通过从对面房间打来的暗号，得知了战败

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那一天，我在横滨监狱³⁷的单人牢房里迎来了日本的战败。那天早上，整个监狱的气氛都跟往常不太一样，连看守的“起床！”声都没有听到。我吃下配给我的三等餐，准备上工，做工的材料却没有来。看守也没有在周围转来转去，牢房附近一带静得出奇。吃过午饭后，我开始猜想为什么一个人也没有来，这时从楼下传来大声吟诗的声音。我从牢门上的观察孔望出去，看见一个杂役³⁸正在用悲怆的语调吟诗。听说他以前是右翼斗士，曾企图刺杀一个财界要人，但没成功，因此以杀人未遂的罪名入狱。我觉得很奇怪，一般情况下，监狱里要是有人大声吟诗，就会被看守毒打。就在我看着这一幕的时候，在我对面的牢房里，有人给我打来暗号。

对面那间牢房原本也是单人牢房，但在那时候，判决已经下来、又还没被送到工厂去的犯人，要在里面关上四五天，所以，在狭小的空间里，挤下了三个人。有人从里面给我发暗号。我打开送饭的隔板，对面的人也打开了送饭的隔板，在空中写片假名³⁹。写完一个字，对面的人就点一下头，问我看懂没有。我看懂了就点点头，对面的人就

³⁷ 横滨监狱（横浜刑務所/よこはまけいむしょ），位于横滨市港南区港南四丁目2番地2号，1855年设立。——中译者注

³⁸ 杂役是指监狱里协助狱方做杂工的犯人。——中译者注

³⁹ 片假名是日文的一种表音符号，笔画比较简单。——中译者注

写下一个字。如果我没看懂，就摇摇头，对面的人就会再写一遍。写完之后，我解读出来：

“ニホンセンソウニマケタ”（日本输掉了战争）

我早就隐约察觉到战况在恶化，但是居然战败了！我一下子什么都想通了。我深深地低头鞠躬，感谢对面牢房里那个人。

第二天，同样通过在空中写片假名的方法，我得知天皇已经通过广播宣布战败。

关上隔板后，我开始凭借直觉，思考这种事态会对我们囚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心想“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出狱了”。另一方面，看守们却歇斯底里地说：“反正战争都输掉了，干脆先干掉你们，再自杀。”不过，反正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顺其自然。

但是，我们既没有获释，也没有被杀：我们这些“政治犯”一直被关到十月六日。

我后来才知道，日本的当权者不愿释放政治犯，所以我们才没有立即获释。

由于恶法《治安维持法》而沦为“罪犯”

十月六日那天，我干活要用的材料又没来，所以我白天就待在牢房里，吃了点东西，走来走去，消磨时间。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我听见对面的牢房被人用钥匙一间接一间地打开了。我正在想，是不是来清监？这时我的牢门打开了。

“带上全部个人物品，出去。”

是看守的声音。我心想：还以为是啥呢，原来是换房。我已经对获释不抱希望了，所以根本没有想到获释。我拿起个人物品，走了出去。到了外面，我正要下楼时，看守叫我们排成一列。我在队伍中看

见了我的同志田口。我们按照看守的指示，走出了监舍。在满天群星下，我们跟着看守，沿着入狱时走过的走廊，走了很长一段距离，然后走到教堂，监狱长和教诲师⁴⁰在那里等着我们。监狱长面对着我们，用一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温和语气，向我们讲话：

“此前，你们由于破坏治安而被关在这里。你们现在也应该知道了，日本输了，战争结束了。你们不再是罪犯了。所以，从今天起，你们可以回家了。虽然你们以前跟我的立场并不一致，但我相信，今后大家应当相互帮助，共同度过日本的困难时期。请不要把我想得太坏。”

他说完后，带着求助的神色，看向教诲师。听了监狱长的话后，一些政治犯爆发出了愤怒的吼声。

“你说什么？省省吧，我们被关了这么多年，你现在才说我们不是罪犯？那谁来负责？开什么玩笑，畜生！”

几个政治犯咬牙切齿，想冲上去打监狱长。

许多政治犯就劝他们：“哎，先等一等，别这么冲动，光听监狱长的话，我们还是不了解外面的情况。先出去再说。出去之后想怎么骂都行。”

法律真是可怕。就在昨天，按照天皇制政府制定的《治安维持法》，我们还是罪犯，并因此被关了好几年。但是，盟军一声令下，这些法律就被废除了，所以从今天起，我们就不是罪犯了。我们终于获得了解放。

为什么我在横滨监狱里被关了三年？为什么我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一同入狱的前辈殁死狱中？我被关在牢里的时候，我的妻子在那

⁴⁰ 教诲师（教誨師/きょうかいし）是日本监狱里对服刑人员进行品德教育的人员，大多由佛教、基督教、神道教的神职人员担任。——中译者注

年三月十日的东京大空袭中被活活烧死，丢下了年幼的独生女儿，为什么我要遇到这些惨事？这全都是因为我们做了对于现在的任何一个工会活动家来说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事。

俱乐部成立时，印刷出版产业的工人几乎都没有参加工会。失业率非常高，工人毫无权利。所以，我们自然想要亲手建立组织，确保自己的职业和工作，保卫自己的生活，并通过组织来满足自己的文化需要；我们组织了读书会，丰富自己的知识，彼此帮助，相互提高。这些本来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就因为我们做了这些事，被称作本世纪最恶劣的法律——《治安维持法》就认定我们犯了罪，把我们关进了监狱。

当时，日本侵略了中国，却遭到了中国人民的抵抗，陷入了进退两难的泥沼之中。以军部为首的日本统治者进行了一场豪赌，向美英开战，企图迫使美英求和。为了进行这场豪赌，他们粉碎了国内一切革新政党⁴¹和工会，炮制了大政翼赞会和产业报国会两个御用组织，驱使以工人为首的劳动人民参加战争。凡是反对这种方针的政党和工会都在镇压下覆灭了，只剩下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的政党和工会，而它们也屈服于政府的威胁，一个接一个地自行解散，把工人和劳动人民出卖给了政府和军部。我们反对这种路线。但是，如果我们公开反对的话，就会全部被捕。所以，我们只好当着特高的面，举行了一场假的解散仪式，然后继续在地下进行活动。特高警察就用逮捕和监禁来惩罚我们的行动。

有人说，在战争期间，整个日本工会运动都被迫解散，彻底消失了。但是，回过头来看，就是在黑暗的战争时期，印刷出版业的工人运动仍然没有停止，工人的组织并没有彻底消失。

⁴¹ “革新政党”是指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左翼政党，主要是指日本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但这个说法是在“五五年体制”确立之后才出现的。——中译者注

接下来我要向大家讲述的是：在这段最黑暗的日子里，日本工人运动走过了怎样的道路，它是怎样被迫向军部和统治阶级屈服的；此外，即使是在这段黑暗的镇压时期里，仍然有一部分工人不顾危险，继续开展斗争；在这样的镇压下，工人运动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存续的呢？我想根据我们的亲身经历，来讲给大家听。

第二章 黑暗的时代

与我们的导师柴田隆一郎的相会

“你就是杉浦？！”

我正在车间里拣字⁴²的时候，一个男人朝我喊道。“我是柴田隆一郎。”来人个子很高，皮肤白皙，栗色的头发剃得很短，戴着度数很深的眼镜，简直就像和尚一样。我心想：“啊，就是他呀。”两三天前的晚上，我跟朋友柴一⁴³见面的时候，他跟我说：“排字车间有个姓柴田的临时工，他说要到你的车间去找你。”我跟柴田寒暄几句之后，他就说“以后再好好聊聊”，然后他就装出还有别的事要做的样子，回排字车间去了。

我们都在“东京印刷”⁴⁴工作，这家公司位于深川区⁴⁵的大工町（现在叫白河町）。公司有几栋小楼和三栋大型平房，三栋大平房是核心，办公室、印刷工厂和活版工厂都在这三栋大平房里。我就在活版工厂工作。活版工厂是一栋长三十米、宽十五米的木制大屋，里面一半是排字车间，另一半是拣字车间。大约有八十名工人在这栋平房

⁴² 由于日文和中文的活字数量巨大，所以在给日文和中文排版时，必须把挑拣活字（在日语中叫作“文選”）和排列活字（在日语中叫作“植字”）的工作分开，前者由拣字工负责，后者由排字工负责。——中译者注

⁴³ 全名柴田一郎，由于他的姓名与柴田隆一郎非常接近，为了避免混淆，下文简称柴一。——原注

⁴⁴ 东京印刷公司（東京印刷会社），以下简称“东印”。——中译者注

⁴⁵ 深川（深川/ふかがわ）是东京的一个地区，1878年设区，1947年与城东区合并为江东区。——中译者注

里干活，柴田就是从排字车间过来的。这是我头一次见到柴田。回想起来，从这一刻起，我的命运就被柴田彻底改变了。都是因为他，我现在虽然已经六十六岁了，但我的人生依然与工人运动紧密相连。话是这么说，但我一点也不后悔。如果不是遇到了柴田，我就不会过上这么充实的人生。



我们的导师，柴田隆一郎（庾死狱中）

我的出身

我得讲一讲我自己的出身，我家住在东京的深川区，家里人口很多，有父母、两个男孩和七个女孩。我父亲在运输船上工作，这条船

沿着附近的隅田川来回跑⁴⁶，为一家制糖公司运货，全家都得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养活，所以一贫如洗。然而我父亲一直梦想着拥有自己的房子，他硬是跟放高利贷的——现在叫工薪族金融⁴⁷——借了钱，买了一栋小小的木造平房，又花钱请木匠加盖了第二层楼，可这么一大笔钱我们根本还不起。为了还高利贷，家计更加紧张了。为了补贴家计，我的哥哥姐姐一念完小学就出去工作了。哥哥为了尽孝，进了镇上一家小印刷厂工作，总是没日没夜地加班，一天也不能休息，结果他得了肺结核，必须到中野⁴⁸的疗养院去治疗，让家计更加紧张了。所以家里的人总是营养不良，脸色发青。多亏了父亲的一个熟人帮忙，我才能在附近的“东京印刷”当上学徒。

当时的经济很不景气。就算是能进“东京印刷”工作的人，工资还是很低，为了糊口，所有人都不得不大量加班。只有每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天才能休息，工人的住房都很破烂。没有多少娱乐，工人只能在午休的时候用花札⁴⁹和活字来赌钱，把手头的一点点钱给输光了。一到发薪日，就会有好多工人跑去附近的洲崎⁵⁰寻花问柳。

当时最让我心烦的事，就是要不要辞职。我当时二十岁，通过了征兵体检，我相信自己在工作上能够独当一面了。由于狂妄自大，我那时做过很过分的事情：我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向外面来的临时工挑起竞争，在工作上追赶他们，并为此沾沾自喜。但是，作为学徒，

⁴⁶ 在日文版中并没有“这条船沿着附近的隅田川来回跑”这句话，这是根据英文版补上的。——中译者注

⁴⁷ 工薪族金融（サラリーマン金融，简称：サラ金）是指专门面向工薪族的小额贷款业务，现在通称“消费者金融”，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高利贷。——中译者注

⁴⁸ 中野（中野/なかの）是东京的一个区，当地曾设有收容结核患者的国立疗养所中野医院。——中译者注

⁴⁹ 花札（花札/はなふだ）是日本的一种卡牌游戏。——中译者注

⁵⁰ 洲崎（洲崎/すさき）是东京都江东区的一个町，在1958年以前曾是有名的红灯区。——中译者注

我的工资很低，日薪只有八十钱⁵¹。我是个合格的拣字工，如果跳槽到其它公司去的话，日薪能有一元⁵²八十钱到二元，所以我想跳槽。但是，由于经济不景气，正式工的职位很难找，要是辞了职，就只能当临时工，到各个印刷厂去找工作。现在这家公司虽然工钱给得少，但我至少每天都有活儿干。如果辞职当临时工，有活儿干的时候收入还算不错，但那样我就成了半失业者。我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下不了决心辞职。

三十年代的青年

在一九三三年（昭和八年）前后，失业的人非常多。不管哪个产业的青年工人，情况都跟我差不多，都陷入了绝望。

我记得当时的商业报纸上登过一幅时事漫画，上面画着一个背着背包的青年站在岔路口，在考虑要走哪条路。他面前有三条路——一条是自杀，一条是堕落，还有一条是马克思主义。正像这幅漫画说的一样，当时自杀成风。一九三二年（昭和七年），有个上流阶级的大小姐在大矶的坂田山殉情，尸体还被老渔夫偷走了，报纸把这件事当作猎奇事件，一连进行了好几天的报道。这起殉情事件被浪漫化，还被编成了题为《坂田山殉情》的流行歌曲，风靡全国⁵³。第二年，实践女校⁵⁴的女学生在伊豆的大岛三原山自杀⁵⁵。这一年就有九百四十

⁵¹ 100 钱=1 日元（円）；80 钱大约相当于现在的 5.60 澳元。——英译者注

⁵² 下文中的“元”均为日元。——中译者注

⁵³ 即“坂田山殉情事件”（坂田山心中事件）：东京出身的华族青年、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院学生调所五郎与静冈县出身的富豪之女汤山八重子热恋，却遭到女方父母反对，两人便于 1932 年 5 月 8 日在神奈川县大矶町的坂田山殉情，一时轰动全国，甚至还在同年被改编为电影《在天国结合的恋情》（天国に結ぶ恋），这里提到的“流行歌曲”就是这部电影的同名插曲。——中译者注

⁵⁴ 实践女子学院（实践女子学園）于 1899 年成立于东京麹町，它是日本最早的

多人在三原山自杀，当地的旅游业一下子火了，途径大岛的汽船公司和火山口附近的茶店暗地里乐开了花，当地警署却头疼不已，在警视厅的帮助下，立起了地藏菩萨像，劝阻人们自杀⁵⁶。

而从我那家工厂的情况来看，大部分青年走上了喝酒、赌博、“玩女人”的堕落之路。要想诚实地生活，就只有追随马克思主义、为实践马克思主义而斗争一条路可走。现在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合法的，但在那时候，在天皇制政府的统治下，它们都是非法的。特高警察在全国布下天罗地网，以《治安维持法》为武器，彻底镇压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而且，为了让他们受到大部分劳动群众的孤立，特高警察命令媒体要在报道中把他们写成穷凶极恶的罪犯，让群众害怕他们。普通报纸在报道于一九二八年的“三·一五”、一九二九年的“四·一六”⁵⁷等多次镇压中被捕的日本共产党员、其他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时，就会登出他们满头乱发、一脸凶相的照片，让大多数普通人对他们产生最坏的印象。

当时，在我那个工厂里，有两三个青年，据说是“主义者”。他们时不时会拿筑地小剧场⁵⁸的工人票来卖，售价三十钱。我从其中一

女子学院之一。——中译者注

⁵⁵ 即“三原山自杀事件”：1933年2月11日，实践女校专门部二年级学生松本贵代子给父亲留下遗言“如果您能看见三原山的烟，就请把它当成我的牌位”，然后拜托好友富田贵子见证自己的自杀，松本与富田两人于2月12日来到伊豆大岛的三原山，松本留下遗书后，便跳入火山口自杀，富田大受打击，陷入精神错乱，在火山口周围边哭边走，被当地人救下。此事被媒体报道后，引发了自杀狂潮，仅当年就有900多人来到三原山自杀。富田本人也于4月29日神秘死亡。——中译者注

⁵⁶ 《日本工会故事》（日本労働組合物語），昭和编，第251页。——原注

⁵⁷ 1928年3月15日，特务机关倾巢而出，对日共、工农党、日本工会评议会等左翼组织进行大搜捕，逮捕了数千人；1929年4月16日，特务机关再次进行大搜捕，使刚刚艰难地重建组织的日共受到了沉重打击，仅在1929年，就有4942人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捕。——中译者注

⁵⁸ 筑地小剧场（築地小劇場）是日本最早的上演新剧（指受欧洲戏剧影响的新

个人那里买过票，去了一两次筑地小剧场，那里的气氛让我大吃一惊。

坐在观众席上时，可以闻到从剧场里的餐馆飘来的猪排饭的香味，那种味道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剧场里的观众席之间的过道上的情景很是森严。那里站着几个戴头盔、挎军刀的警察，在开演后的黑暗中，他们打着提灯，监视观众。开演后，电灯一个接一个地关掉了，剧场里面变得一片黑暗后，从某个地方传出了《国际歌》的歌声。警察立即跑过去，大喊“喂！不许唱！”然后另一个方向又有人唱《国际歌》，警察又跑过去制止。观众会大喊“唱啊！唱啊！”，给他们鼓劲，等到骚动平静下来后，一场描写罢工的生动的戏剧就在台上上演了。当演员扮演的堕落干部⁵⁹上台时，观众就紧张起来，大声警告：“他被收买了，别上他的当！”当罢工以失败告终时，舞台上出现了几位英雄般的工人，他们高举着红旗游行，高呼斗争到底。观众全都站起来，深有同感地鼓掌欢呼。

戏演完后，我满足地走出剧场，此时有人向散场的观众发传单。不知什么时候混入观众中间的便衣特务就立刻跑去抓人。离场的观众就尽力阻拦便衣。看到这出骚动后，我在回家路上感到非常惊慌。

第二天，工厂里有个据说是“主义者”的人，可能听说我去了剧场，就过来找我，得意地问我：“昨晚怎么样，很棒吧？”但是，那些“主义者”并没有与工人紧密结合，平时也没有开展过保卫工人利益的活动。因此，他们在工厂里得不到信任，被孤立了。我们这样的工人尽管是在贫困中成长的，但是我们当时对阶级斗争并没有兴趣；所以，对那些“主义者”，我们只想敬而远之。于是他们也看不起我

式日本戏剧，与旧剧、新派对立）的剧场，位于京桥区筑地二丁目，由土方与志（1898—1959）和小山内薰（1881—1928）创立，1924年6月13日开业。1931年，新筑地剧团参加了日本无产阶级戏剧同盟，筑地小剧场也随之成为了无产阶级戏剧运动的据点之一。——中译者注

⁵⁹ 堕落干部（堕落幹部/だらくかんぶ，简称：だら幹），指被资方收买、出卖工人运动的工会干部。——中译者注

们，说什么“那小子觉悟太低”。

我的家庭环境这么糟糕，自己又在毫无吸引力的工厂里混日子，对前途不抱任何梦想和希望，所以，我那时的情绪是灰暗、绝望的。就在这时候，柴田出现了。

柴田是“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以下简称全协）的会员，就在全协被破坏前不久，一个特务打入了东京江东一带的全协组织。我听说柴田就是负责调查这件事的调查委员。但是，我到现在都不能确定他当时到底是不是日本共产党员。后来，出版工俱乐部领导层的几位成员被捕后，特高在对我们严刑拷打时，逼问的第一件事，就是柴田是不是共产党员。但我们确实不知道，最后特高也只好作罢。但是，从我接下来要讲述的故事来看，我认为可以确认他是共产主义者。

第三章 播种者——出版工俱乐部的筹备时期

战时体制的加强

柴田到我的车间来找我，是一九三四年（昭和九年）的事。那时候，普通报纸上全是日本扶植“满洲国”、扶持傀儡溥仪出任皇帝的报道。但是，国内的战时体制却在不断加强。因为侵略“满洲”（中国东北部）虽然成功了，但这并没有解决日本资本主义的矛盾。统治阶级正在准备向中国本土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

在“满洲事变”⁶⁰刺激了军事产业的同时，民生产业却在持续萧条，我们所在的印刷产业的情况尤为严重，这不仅是因为经济萧条，也是因为大企业把压力转嫁给了中小企业之故。共同、大日本、凸版⁶¹等大企业通过集体倾销，压低了印刷费用，逼迫中小企业破产。他们还迫使政府通过了《产业管制法》⁶²和《工厂组合法》⁶³，通过这些法律，对中小企业加以整顿。

而中小企业又把压力全部转嫁给工人，它们在整个行业普遍实行

⁶⁰ 即九一八事变。——中译者注

⁶¹ 共同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印刷株式会社）于1897年创立于东京，原名博文馆印刷工厂，1925年与精美堂合并后改称共同印刷；大日本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大日本印刷株式会社）于1876年创立，原名秀英舍，1935年与日清印刷合并后改称大日本印刷，它现在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印刷企业之一；凸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凸版印刷株式会社）于1900年创立于东京，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印刷企业之一。——中译者注

⁶² 即1931年4月1日颁布的《重要产业管制法》（重要産業統制法）。——中译者注

⁶³ 应为1932年9月6日颁布的《商业组合法》（商業組合法）。——中译者注

了临时工制度，这意味着印刷工人随时都会被解雇。

这种临时工制度跟现在的临时工制度完全不一样，现在的临时雇用期还是比较长的，但在那时候，临时工的雇用期只有三天或七天，能干上一个月就算很长时间了。这种制度使大部分印刷工人陷入了半失业的境地。

再加上由于战时经济导致的通货膨胀，物价也在暴涨；所以印刷工人的生活日益艰难。

成立文学同好会

在这种形势下，印刷工人陷入了绝望之中。但另一方面，这种形势中又蕴含着迫使印刷工人奋起斗争的条件。柴田一边在神田文明社当临时工，一边思考怎样在印刷工人当中建立组织。他找到的第一个同志是坂村义雄⁶⁴；坂村也是排字工，当时在京桥⁶⁵的石川印刷公司工作。坂村喜欢文学，跟柴田都住在立石⁶⁶。两人偶然认识后，很快就成了亲密的朋友和同志。然后，柴田又认识了也住在立石的青年白石光雄⁶⁷。关于柴田和坂村认识白石的契机，坂村是这么说的：

“认识白石君的契机是这样的：出版工俱乐部的创立者柴田隆一郎氏和我在还没有开始建立组织、又没有活干的时候，也就是在寻找同志的时候，在同一个地区里，正好有个

⁶⁴ 坂村战后经营印刷业，但很年轻就去世了。——原注

⁶⁵ 京桥是东京的一个地区，1878年设区，1947年与日本桥区合并为中央区。——中译者注

⁶⁶ 立石是东京都葛饰区的一个地名。——中译者注

⁶⁷ 白石在战后建立了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印刷所、晓印刷公司（あかつき印刷），并担任常务董事，培养了大量干部，对全国的民主印刷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九五九年去世。——原注

二十来岁的青年，每天早上都跟我们一同坐电车，不管什么时候都在非常热心地阅读文学杂志。总是能看见他在热心地阅读《新潮》、《文学界》⁶⁸之类的募集新人、新作家的创作杂志。无论是在等电车的时候，还是在从立石上电车之后，马上就开始读书。因为他是个非常认真的文学青年，所以我们就跟他聊了起来，就这么认识了。

“刚开始的时候，我和柴田氏都没有谈到组织方面的事，只是作为文学青年而与白石结交的。我一开始也只是以文学青年的身份跟柴田氏结交的。在那时候，不得不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然后我们一起创办了同人杂志，杂志的名字好像是叫《步》还是《龙胆》来着。虽然成立了这样一个团体，但并没有把心思全都放在上面。大家都觉得这只不过是为了建立组织而采用的手段罢了。目的并不是创办同人杂志，而是建立工人团体。白石君不久也了解了这件事。

“不久后（白石君）就进入了东京印刷工作，虽然他原先已经在别处工作了，但他听从了柴田氏的意见。他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才辞去了原来的工作，进入东京印刷指导罢工的。虽然我心里充满了疑虑，但白石君却成长得很快。我们是在一九三三年（昭和八年）认识的，他在一九三四年进入了东京印刷，我们当了一年半的朋友。他进入东京印刷，是为了通过争取加薪、改善工人生活而把工人组织起

⁶⁸ 《新潮》（新潮/しんちょう）是新潮社发行的文艺月刊，创刊于1904年5月5日；《文学界》（文学界/ぶんがくかい）是由文化公论社创办的文艺月刊，1933年10月创刊，现由“文艺春秋”发行。《新潮》、《文学界》、《群像》、《昴》和《文艺》号称日本文坛五大文艺杂志。——中译者注

来⁶⁹。”

以这几个年轻人为中心，成立了一个叫做“梧桐”的同好会，并发行了同名的文学杂志。但是，这个社团从来没有超出文学同好会的范围，而且，由于它只是一个讨论小组，一些成员便开始对它的意义产生了怀疑。他们开始考虑建立一个以工人为基础的团体。

当时，柴田在深川的今井印刷当临时工，在那里找到了一个突破口，认识了一个叫金子健一的青年工人，还有跟他同姓的柴田一郎⁷⁰。由于这些青年想创办同人杂志，柴田就积极鼓励他们，给他们出主意。这些年轻人是第一次办杂志，所以，整个过程，从征集稿件到编辑再到投递，都离不开柴田的帮助。

同人杂志《步》的发行

按照他的设想，这份杂志不是为了一部分文学青年、而是为了喜欢追求潮流的青年工人创办的，他要把这份杂志办成一份可以让工人轻松投稿、而又不用为自己的文学水平感到害臊的杂志。他的主张在这个同好会的青年当中赢得了支持。核心成员很快就明白了，按照他的设想去做的话，就会使这份杂志成为组织工人的工具。

这份杂志的第一期取名为《步》（歩み）。第一页上登的是好像女学生写的序言和女工写的感伤的诗，后面刊登的是俳句⁷¹和川柳⁷²，

⁶⁹ 白石光雄追悼文集刊行委员会，《与赤旗在一起》（アカハタとともに）。——原注

⁷⁰ 战后，柴田一郎当上了江户川民主商工会会长，后病逝。——原注
民主商工会是日共组织的中小企业经营者团体，它们的全国组织是全国商工团体联合会（全国商工団体連合会），1951年8月3日成立。——中译者注

⁷¹ 俳句（俳句/はいく）是日本的一种诗歌形式，每首俳句由三行组成，每行各有五、七、五个音节，不须押韵。——中译者注

当时这两种诗在印刷工人中间很流行，特别受到拣字工和排字工的喜爱。购买《步》的不仅有今井印刷里的同好会成员的工友，还有十几份《步》流入了东京印刷（当时日本的五大印刷公司之一，拥有四百五十名员工，位于深川区）。当时中小型印刷厂主要集中在芝区⁷³（现在叫港区），在那一带的工厂里，《步》也赢得了一些读者。



“步”团体的恳谈会（一九三四年），这是运动的发端

编辑有柴一、金子、金野和柴田，他们跟芝区田村町的小野印刷的老板关系不错，所以他们就利用业余时间，到小野印刷去，借用那里的车间，在那家工厂的工人樱井福平⁷⁴、山县円次⁷⁵、重田胜夫等

⁷² 川柳（川柳/せんりゅう）也是日本的一种定型诗，跟俳句一样，每首川柳也由三行组成，每行各有五、七、五个音节。——中译者注

⁷³ 芝区（芝区/しばく）是东京都的一个区，1878年设立，1947年并入港区，现为港区的一个町。——中译者注

⁷⁴ 现在姓吉村，战后当过东洋经济印刷工会委员长。——原注

人的帮助下，一起为杂志拣字、排字，并借用那里的机器印刷杂志。

在《步》的出版和印刷的过程中，许多来帮忙的青年工人得到了教育，他们后来构成了创建俱乐部芝区支部的核心。

第一期《步》的成功，让青年们大受鼓舞；很快就出了第二期和第三期。许多工厂里都出现了这几期杂志。

这些活动很快就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柴田隆一郎、白石和柴一很快就在东京印刷找到了工作，虽然只能当临时工。多亏了《步》的读者的积极工作，才能获得这样的成果。东京印刷是一家大公司，雇用了许多青年工人，而柴田就是要把这些工人组织起来。我当时也在东印工作，所以柴田也来跟我打招呼。后来，柴田也成了经常到东印打工的临时工团体的一员。

⁷⁵ 战后当过日本共产党山口县赤旗分局长。——原注

第四章 失败与新的出发

东京印刷罢工

一九三五年（昭和十年）的通货膨胀对各行各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印刷业之类的民用产业开不了工，形势非常糟糕。物价不断上涨，工资却一点没加。实际工资每天都在下跌。

在柴田经常去打工的东印里（在前一年年底，由于东印的工资实在太低了，我受不了，便辞了职，在神田区的小工厂当临时工），以村越健太郎、羽入新吾等人为中心的一批比较进步的青年工人开始认为，必须争取加薪，不然连饭都吃不上了。

当时，东印的一部分工人参加了以河野密⁷⁶为委员长的关东出版工会（関東出版労働組合），但这个工会并没有采纳青年工人的具体要求，也没有围绕他们的要求开展组织活动，于是青年们就只好亲自提出要求，并且还要自己组织起来开展斗争。

如果采纳青年们的要求，就一定会发展成为斗争。柴田和白石把比较先进的工人聚集起来，通过他们的加薪要求，开始组织斗争。加薪原本只是一部分青年的要求，但很快就蔓延到了许多工厂。

关东出版工会没有办法，只好采纳了会员的要求，提出了把平均工资从九十八钱增加到一元的强烈要求。然而，公司却针锋相对，提

⁷⁶ 河野密（河野 密/こうのみつ，1897年12月18日——1981年1月4日），千叶县出身，曾就读于东京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参加日本工农党，后转入社会大众党，1936年初次当选众议员。战后参与创立日本社会党，1952—1972年连续当选众议员，1972年退出政界。——中译者注

出了给一百一十三名员工加薪、冻结一百六十名员工的工资、给一百六十名员工减薪的方案。最过分的是，公司甚至还要解雇工资最高的二十人——他们的工资超过了二元。这显然是对全体工人的挑战。员工当中有二百二十名工人认为，公司解雇这些工人，正是对自己的挑战，于是他们在三月二十一日举行无限期罢工，反对解雇，要求加薪。公司当即按照惯例，封闭工厂，不许工人进入。为了打垮工会，公司还雇用黑社会看守工厂，又利用警察护送剩余的一百五十六名工人和临时雇佣的一百一十一名工贼进厂工作。

罢工团⁷⁷便按照当时的惯例，在深川区石岛町租了一处房子，设立了斗争本部，准备进行长期斗争。

罢工团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斗争：在工厂周围和社长家附近张贴海报，通过贸易向友好团体进行宣传，在工厂外面部署纠察队阻止工贼进厂，并劝阻那些想要进厂找工作的人。

表面上看，柴田和白石在罢工中并没有担任任何职务，但罢工的中坚力量——青年工人都围绕在他们身边。罢工的真正领导层是以柴田为中心的一批人，他们以隐蔽的方式领导罢工，每天晚上都要举行对策会议。《步》团体不仅领导了罢工的日常工作，还通过罢工培养新的干部。白天的活动结束后，青年们就在夜里集合起来，学习列宁的《怎么办？》，提高自己的觉悟。通过学习，他们理解了自然发展的工会活动，懂得了自己必须有目的有意识地承担起领导工会活动的责任。青年明白了自己是斗争的隐蔽领导层，斗争的胜败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这使他们勇气百倍。在回顾这段往事时，白石是这么说的：

“随着镇压越来越激烈，败像越来越明显，我开始泄气

⁷⁷ 原文为“争议团”（争議団），日本的工人在罢工时，会把所有参加罢工的工人及其家属组成争议团，同资方作斗争。为了便于中文读者理解，便译为“罢工团”。——中译者注

了，就在这时候，柴田对我说：‘从这次罢工的种种迹象来看，我觉得胜算是很小的。但我们不能放弃。我们必须考虑到，就算能赢得加薪，就算公司撤回解雇的决定，这也不过是工人阶级的暂时胜利，不能成为最终胜利。我们不必拘泥于经济上的胜败。在我看来，从这次斗争中会涌现出多少具有阶级觉悟、将来会踊跃投入阶级斗争的活动家，这才是重要的。我们在领导斗争时，一定要充分理解这一点。’”

三十五家公司的工人联合募捐活动

《步》团体的成员不仅是罢工团的中坚力量，它还在争取外部支持、为罢工筹款的活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它不仅为东印罢工筹款，还为好几次罢工筹款。

集结在芝区的小野印刷、参加了同人杂志《步》的出版工作的山县、樱井等人，在坂村的带领下，发起了“反对解雇东印工人支援募捐运动”（東京印刷職首反对支援カンパの運動）。虽然我当时已经离开了东印，但我也参加了这个运动。我们按照地区，分成好几组，走访附近的工厂。我现在还记得，在坂村指导下，我们讨论了怎样在未组织工人⁷⁸中间开展工作的问題。

我们每造访一家工厂，就跟那家工厂的工人碰面，向他们介绍罢工的现状，然后向每人募捐五到十钱，那里的工人又把我们介绍给其它工厂，募捐活动就这样逐步扩大，最后，有三十五家印刷厂的工人捐了钱，每个人捐的钱虽少，但积少成多，最后成了一笔巨款。一般来说，这笔钱应该立即转交给罢工团，但坂村并没有这么做，而是重

⁷⁸ 未组织工人（未組織労働者），在英语中叫做 unorganized workers，指没有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中译者注

新走访了捐款的工人，对他们说：“多亏了你们，我们才能从多达三十五家的工厂募捐到这么多钱。我想尽快把这笔钱转交给罢工团，但是，与其用个人的名义，我觉得还是用三十五家公司工人联名的名义，更能鼓舞罢工工人。不知你们是否愿意？”在得到捐款者的同意后，他让那些积极协助募捐的工人担任三十五家公司工人的代表，然后让代表们去转交捐款。

在转交捐款时，代表们当然要发表致辞。完成任务后，他们还要走访全部三十五家工厂，就罢工的进展做报告。在这个过程中，各家公司里的罢工支持者不知不觉地建立了联系，产生了一个以坂村为核心的活动家们的合作组织。

在参加募捐活动时，我逐渐明白了工人阶级的团结互助是多么重要，我个人的力量虽小，也能为促进工人阶级的团结互助这一重要工作出一份力。



罢工陷入了困境

东印罢工显然陷入了困境。每一天，工贼都在警察的护送下，大摇大摆地走进工厂。尽管只有部分车间开工，但这仍然给了公司自信。社长松井扬言决不让步，宁可让公司倒闭，也要打垮罢工团。罢工因此陷入了困境，进入了忽好忽坏的状态。就在这时候，警视厅又插了进来，要进行强制调解。

就在这一年，由日本扶植的傀儡“满洲国皇帝”溥仪在以“比叻”号战列舰⁷⁹为首的联合舰队的护送下，访问了日本。

警视厅原本站在资本家一边，导致东印罢工长时间僵持不下，但是他们现在突然改变了态度，采取了居中调停的立场。他们装出要为了工人的利益而解决争议的样子，其实他们担心的是，在“满洲国皇帝”访问日本的时候，要是东京的一个区发生了激烈斗争的话，就会大丢脸面。所以，他们想在溥仪到访之前彻底解决罢工，但是他们提出的调停条件却是罢工团根本不能接受的。调解以失败收场，在伪满洲国皇帝来访期间，罢工仍然继续进行。长期僵持不下的罢工就快满一百天了，谁也看不出罢工何时能够得到解决，然而，一天早上发生了一件事，导致罢工突然失败。

罢工团青年部有个叫江沢一郎的小伙子，有一天，他在执行纠察任务的时候，看见一个姓宫岛的工贼走过来，这个宫岛以前都是坐着卡车，在警察的护送下战战兢兢地进厂。江沢就劝阻宫岛，但宫岛不听。宫岛的粗鲁激怒了江沢，他一时冲动，用过肩摔把宫岛丢了出去。他不该这么做的。工贼的脑袋撞到地上，就乖乖回家去了，然后就死

⁷⁹ “比叻”号是金刚级战列舰的2号舰，1911年11月4日在横须贺海军工厂动工，1912年11月21日下水，1914年8月4日入役，1942年11月13日在第三次所罗门海战中自沉。1934年3月1日，溥仪就任“满洲国皇帝”，不久后，便于4月乘坐比叻号访问日本。——中译者注

在了床上。

警察趁机逮捕了罢工团全体成员。

结果，坚持了一百多天、以让公司方面重新录用被解雇者当中的七十人并一次性支付一万五千元为目的的东印罢工就这样彻底失败了。罢工结束后不久，在罢工期间始终支持公司的扇桥⁸⁰署特高警察松村就被公司聘为保安主任，这件事暴露了公司跟警方的勾结。

东印罢工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必须弄清楚这次罢工为何变得暴力。

当时，天皇制政权的暴虐，是现在的人根本想象不出来的。工人和农民都受着压迫。战斗工会“全协”正在争论要不要把推翻天皇制写入工会运动的方针。在争论中，为了揭露天皇制的本质，一个姓坂上的人发表了如下言论：

“日本的天皇制是封建专制的残余，天皇制是从头武装到脚的剥削机器。如果工人和农民提出自己的日常经济要求、并向资本家和地主发动斗争的话，随着斗争的激化，无论他们提出的要求多么微小——也就是说，只要他们提出的具体的切身要求，就会同天皇的官宪⁸¹发生冲突。国民被称作天皇的‘子民’，而国民绝大多数都是工人和农民，他们为了明天的‘面包’，正在向自己的雇主提出具体的要求，并同雇主谈判。然而，天皇的官宪却践踏了工农的要求，并拿起剑为资本家和地主看守大门。这已经成为了常态⁸²。”

⁸⁰ 扇桥（扇橋 / おうぎばし）是东京深川区的一个町，1947年随深川区并入江东区。——中译者注

⁸¹ 官宪（官憲 / かんけん），本意是指官厅或官吏，但在左翼运动中是对统治阶级的暴力镇压机关的统称，主要指警察和特务。——中译者注

⁸² 《现代史资料》，第十五卷，《社会主义运动（二）》，第235页。——原注

当时的天皇制警察可以随意对国民进行讯问、搜身或搜查随身物品，无需搜查令即可搜查私宅、逮捕、拷打和监禁，他们犯下的暴行，远比现在的韩国法西斯政权更坏。

在这种状况下，每当发生劳动争议，警察总是会站在公司一边，不管多小的借口，都会被用来镇压工人。如果工人向公司提出诉求，迫使公司谈判，就会被警察以“强行会面、胁迫、暴行”的罪名逮捕。如果工人在工厂里举行游行，就会被警察以“袭击工厂”的罪名逮捕，工人稍有反抗，就会被警察以“妨碍执行公务”的罪名逮捕。罢工团为了团结工人而对罢工工人进行劝说的时候，警察就会宣称罢工团诱拐、绑架或威胁工人，并以此为借口进行干预。

因此，面对着占据压倒性力量的敌人，而自身的力量又很弱小，工人阶级便开始焦躁起来，变得狂躁了，他们只想给资本家添堵，便转而动用暴力。

东印罢工就是这样失败的。但是，大批青年却开始向《步》团体靠拢。柴田和白石认为，必须把这些青年聚拢起来，结成一个长期性的组织。

和工会的成立

东印罢工失败后，有一百五十名工人被解雇。由于当时的经济很不景气，这些工人怎样找到工作，便成了严重的问题。

柴田和白石把青年们集中起来，向他们解释说：

“很多人由于参加东印罢工而被解雇了，因为经济不景气，他们都在拼命找工作。但是，由于他们曾在东印干过较长时间，所以有不少人都不认识其它公司的人。我们必须做点什么。办法只有一个——大家共同努力，互相帮助。在罢

工的时候，工会很愿意出头，但它在平时并不太关心工人的生活。所以关东出版工会是指望不上了。我们没有办法，只能建立某种组织，通过自己的力量，尽量帮助大家。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这些青年人应当带头，为大家出力。”

在罢工期间，这些青年目睹了以柴田和白石为首的一批工人的无私奉献，当他们听说了《步》团体的事迹后，他们的眼睛都发亮了。就在那一年，在由于参加东印罢工而被解雇的工人盐原的家中，举办了和工会的第一次筹备会，开过几次筹备会后，和工会就正式成立了，并开始壮大，一个人人期盼的群众组织就此萌芽。和工会的核心成员有：柴田、白石、柴一，他们是东印罢工的中坚；坂村，他是发动三十五家公司的工人联名给东印罢工捐款的核心人物；还有樱井福平、山县円次和我自己，我们是三十五家公司的工人代表。

我叔叔在芝区经营着一家小印刷所，山县就在那里工作，他跟在附近的小野印刷工作的樱井借了一个房间，两人住在一起。他们的住处，就成了和工会本部兼芝区支部的办公室，而我家就成了深川支部的办公室。

第五章 同阻挠组织活动的敌人作斗争

和工会的敌人

我们的活动集中于东京的印刷产业，所以我先介绍一下东京印刷产业的分布情况。最大的几家印刷公司当中，共同印刷位于小石川区（现属文京区），大日本印刷位于牛込区（现属新宿区），凸版印刷位于本所区（现属江东区⁸³）。而中型、小型和微型印刷厂零星散布于整个东京，主要集中在神田区⁸⁴（现属千代田区）、京桥区（现属中央区）和芝区（现属港区）。要说原因嘛，神田区有许多出版社，吸引了许多印刷出版物的印刷厂；京桥区是中央政府机关的中心，吸引了许多以承印办公用品为主业的印刷厂；芝区有许多出版经济杂志和业界刊物的出版社和新闻社，吸引了许多印刷报纸和杂志的中小微印刷厂。这些企业的工人几乎都没有参加工会，因此他们的劳动条件非常恶劣。每一家工厂的劳动时间都很长：算上加班在内，一天要工作十三小时，中间只有两次休息，一次是中午，一次是下午五点，每次只有半小时。每个月只有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天能够休息。尽管劳动条件这么差，但是每一家公司开的工资，算上加班费在内，也只能勉强糊口。因此，我们选定这几个地区，开展了下列活动。

和工会是联谊会性质的团体，它一开始只有大约二十六名会员。

⁸³ 此处有误，本所区于1947年3月15日与向岛区合并为墨田区。——中译者注

⁸⁴ 神田是东京的一个地区，1878年设区，1947年与麹町区合并为千代田区。——中译者注

机关报《和工会》是用活版印刷的，在芝区、京桥区和神田区的中小企业的印刷工人当中散发，向他们宣传和工会。这种宣传也像现在的工会活动一样，不会讲太难懂的话。我们最紧要的任务，是尽量帮助那些由于参加东印罢工而被解雇的工人找到工作，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新会员。

经济越来越不景气，在东印罢工的同时，荏原制作所⁸⁵、松竹⁸⁶有声电影部门、东京薄呢⁸⁷、东电千叶、大同电力、东京计器⁸⁸、川崎汽船⁸⁹、东交⁹⁰等企业都发生了许多罢工，它们大多是防御性的，目的是抵挡对劳动条件的进攻，包括裁员和减薪在内。

与此同时，日本正在加紧侵略“北支”（中国北方）。统治阶级为了进行战争，就必须彻底镇压国内的一切反战势力。形势变得越来越黑暗了。

在这种状况下，柴田为了巩固和工会而进行了狂热的工作。他经常说：

“战斗工会已在镇压下彻底覆灭，剩下的工会都被腐化

⁸⁵ 荏原制作所股份有限公司（株式会社 荏原製作所）是东京的一家机械制造商，创立于1912年。——中译者注

⁸⁶ 松竹股份有限公司（松竹株式会社）是日本最大的电影制作公司之一，1895年在京都创立，1920年开始涉足电影业。——中译者注

⁸⁷ 此处有误，应为东洋薄呢。东洋薄呢股份有限公司（東洋モスリン株式会社）是战前的一家纺织企业，1907年成立，1938年改称东洋纺织工业。——中译者注

⁸⁸ 东京计器股份有限公司（東京計器株式会社）是东京的一家精密机器生产商，1896年成立，原名“和田测量仪表制作所”（和田計器製作所），它是日本第一家生产测量仪表的厂商。——中译者注

⁸⁹ 川崎汽船股份有限公司（川崎汽船株式会社），是日本的一家造船公司，原为川崎造船所的船舶部，1919年独立，成为川崎重工的子公司。——中译者注

⁹⁰ 东京市交通局（東京都交通局）是负责运营东京都及周边地区的公共交通事业的机关，前身是1911年成立的东京市电气局。——中译者注

的右翼干部把持着，同政府和资本家勾结起来，全都堕落了。所以，它们不可能为了工人生活、民权或反战等问题而进行认真的斗争。群众自然也就抛弃了它们。另一方面，这些干部一件好事都没干，专干坏事。哪里的工厂发生了罢工，他们就马上跑去指挥。罢工结束后，他们就把罢工基金的一大部分塞进了自己的腰包，美其名曰‘手续费’，简直就跟事件屋⁹¹一样堕落。所以他们失去了工人的支持。但是，有错的不光是这些干部，工人自己也有错。如果工人全都理解工会的重要性，全都加入工会、参加工会活动、按时缴纳会费、支持工会干部，使工会的工作人员能够维持生活，就不会变成这样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为了把工会引上正道，工人必须理解组织的重要性。”

和工会的初步活动，就是向工厂工人提出具体的问题。会员们到自己的熟人工作的工厂去，向工人提问：“你们厂还有排字工或拣字工的空缺吗？要是没有的话，能不能麻烦你们介绍几家还有空缺的工厂？有很多人失业了。如果有哪家工厂愿意雇用他们的话，请一定要通知和工会。”哪里有工厂招工，我们就派人过去应聘——不光是派那些由于参加东印罢工而被解雇的工人，也有其他工人。前面讲过，由于大多数印刷工人没有参加工会，所以他们只能听凭资本家的摆布，而他们的人权也得不到丝毫保障。

那些在大日本、凸版和共同等大型印刷公司和在《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⁹²等大报社工作的工人，相当于印刷工人

⁹¹ “事件屋”（じけんや）是指虽然没有律师资格，却专门挑唆别人打官司并从中渔利的人。——中译者注

⁹² 《朝日新闻》（朝日新聞）于1879年在大阪创刊，现在仍是日本发行量第二大的报纸；《每日新闻》于1872年在东京创刊，原名《东京日日新闻》（東京

中的贵族。这些公司偶尔会有人辞职，留下空缺。谁要想填补空缺，当上正式工，就得给管人事的或有路子的人塞一大笔钱，一般要三百到五百元。大多数印刷工人只能勉强度日，根本出不起这么多钱，所以只好在各个印刷厂来回打零工，当时大家都是这样过活的。人脉广的人，可以靠朋友的路子，比较容易就能找到工作，但是人脉不广的人就会一连几个月都找不到工作。

对于那些身体好、年轻气盛的人来说，由于找不到工作而游手好闲，简直跟死一样难受。所以，和工会的职责就是帮忙找工作，让大家相互救济。

和工会成立后，在刚刚开始帮失业的印刷工人找工作的时候，我们突然遇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强敌。在早稻田⁹³有一家私营的职业介绍所，叫做“寻职会”⁹⁴，它打出大幅招牌，自称“失业者的红十字会”；其实它只是想在失业的印刷工人身上捞钱罢了。现在要想开职业介绍所，必须得到劳动省⁹⁵的批准，但在那时候，到处都有叫做“桂庵”的职业介绍所⁹⁶。寻职会的会长叫木村清五郎，一看这个团体的名字，就会明白它是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的。寻职会给东京所有印刷业老板写信说，“我们可以提供大量的工人，他们愿意拿很低的工资，

日日新聞），1911年与《大阪每日新聞》（大阪毎日新聞）合并，但双方仍然各自使用原名，在东京和大阪两地分开发行，直到1943年才共同改称《每日新聞》，目前《每日新聞》仍是日本三大报之一；《读卖新聞》（読売新聞）于1874年在东京创刊，曾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日报。——中译者注

⁹³ 早稻田原是东京附近的一个村庄，1878年编入牛込区。著名的早稻田大学便设在该地。——中译者注

⁹⁴ 原文为“働きましょう会”，直译为“干活吧会”，但这样不太好听，所以改为“寻职会”。——中译者注

⁹⁵ 劳动省（労働省）是日本的内阁部门之一，负责确保劳动者的福利与职业，1947年9月1日设立，2001年1月6日与厚生省合并为厚生劳动省（厚生労働省）。——中译者注

⁹⁶ 在江户时代，“桂庵”（けいあん）是指替人介绍工作的中介人，在昭和时代初期，“桂庵”引申为职业介绍所的意思。——中译者注

无论您何时需要他们，需要多少人，我们都会为您准备好。如果您需要临时工，请务必联系‘寻职会’。”资本家只用说出自己需要多少拣字、排字、拆版⁹⁷、印刷等工种的工人，寻职会就会按照资本家出的工资，提供相应数量的工人。

寻职会在工人面前，把自己打扮成“失业者的红十字会”，它在广告中声称：“不管您何时前来，都有大量工作。请加入‘寻职会’。”如果有失业工人上门，他们就会问叫什么名字、多少岁了、住在哪里、有什么技术、有多少年工龄之类的问题，然后他们就会说：“哎呀，如果您来早一点就好了。刚才还是有工作的，可惜已经被人占去了。我们一有工作就会立即通知您，请您静候佳音。”然后他们就会收取十五钱的会费，再把人家打发回家。如果真的有工作，他们会让工人顶替，但是公司会把工作优先提供给“寻职会”干部、送礼的求职者和天天上门求职的人；对于其他人而言，交了会费也还是找不到活干。然而，东京只有这家职业介绍所会雇用印刷工人，所以全东京的临时印刷工恐怕都去过那里至少一次。

寻职会的勾当不仅影响了临时工，也无下限地拉低了正式工的工资。而我们的任务，就是积极地帮助和工会会员找到就业机会，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揭露寻职会的性质。我们试图在全体印刷工人中间点燃反对寻职会的情绪，不仅要让活动家们、更要让大多数印刷工人认识到，必须团结起来，迫使寻职会停止这种勾当。

我们通过和工会的机关刊物《和工之友》（和工の友）和每月集会来彻底揭露寻职会。我们指出：

“寻职会自称‘失业者的红十字会’，能够拯救上门求助的任何人，其实它只是在用不可能实现的谎言来欺骗我们

⁹⁷ 在活字印刷中，完成印刷后，要把活字从已经制好的版面上拆下，供其它书排版之用，这道工序就叫“拆版”。——中译者注

这些失业者罢了。想一想吧：东京的印刷工厂的数量是有限的，可以提供的工作岗位自然也是有限的。就算有了寻职会，资本家也不会雇用超出他们需要的数量的工人。说到底，寻职会只是在利用好听的话，欺骗工人在各个工厂之间转来转去，借此大发横财。不仅如此，他们还强迫工人不出怨言地干活，无下限地拉低了正式工的工资。我们必须迫使寻职会停止这种勾当。”

我们的控诉传播得很广。和工会的几个干部白石、坂村、金野等人还造访了寻职会的会长木村，向他提出了抗议。

“你们投资本家所好，按照他们提出的工资水平提供工人。这种做法不仅导致临时工、而且还导致正式工的工资水平一落千丈。我们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很多工人都说寻职会是工人之敌，甚至还说你们的存在本身就是罪恶。希望你们能认真检讨、好自为之。”

我们不懈地进行这项斗争，逐渐强调工人团结的重要意义。和工会的会员们在每一家工厂反复重申，不要让工资下降：

“每当自己的工厂需要临时工的时候，一定要抢在管理层联系寻职会之前，跟管理层交涉，争取获得介绍临时工的权利。这是因为，如果让正式工去介绍临时工的话，他们就会设法让临时工获得较高的工资，使其不至于拉低他们自己的工资；而且，如果开给临时工的工资低到足以拉低在业工人的工资水平的话，临时工也不会接受的。”

通过我们的活动，活动家和工厂工人逐渐认清了寻职会的本质：

他们开始理解加入和工会的必要性。这种活动逐渐加强了和工会的力量。

寻职会也对和工会进行了疯狂的反击，它开始给和工会扣红帽子：“和工会是反资本主义团体，搜罗了一帮赤色分子”，然而，不久后就曝出了寻职会会长木村侵吞公款的消息，他还卷入了通奸丑闻。身败名裂之后，他就自杀了。虽然有个姓稻津的人接替了会长职务，但在一些年轻人得势之后，寻职会也开始分裂了。

在军国主义日渐强大的时日里

在我们继续开展这些活动的同时，国内的军国主义势力也在日渐强大。军部正在逐步落实对“北支”的侵略。“满洲事变”之后，关东军的权力越来越大，在这种背景下，对华外交的基本方针是由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和大藏省四个政府部门来制定的，它们的目标是彻底控制“满洲”，并逐步侵略“北支”，攫取那里的资源。

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对日本的侵略忍气吞声。抗日救国运动像野火一般燃烧起来。中国共产党在万里长征的途中，一面同国民政府军战斗，一面指出：中国国民应当团结抗日，不然的话，民族就要灭亡，因此，它向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全体国民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这个呼吁得到了大批学生和工人的赞成，抗日运动在全中国蓬勃发展起来。柴田把这个情况介绍给了我们，他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懂得了日本的侵略战争的本质，也使我们懂得了这场鲁莽的战争是必然要失败的，这种分析拓宽了活动家的眼界。

和工会集中精力完善组织，除了本部、芝支部和深川支部之外，又在小石川諏访町⁹⁸的一个叫做“向”的人的住宅里建立了神田支部。

⁹⁸ 小石川原为东京的一个区，1947年与本乡区合并为文京区；諏访原是小石川

我们不仅要帮会员找工作，还要开展文化方面的活动，比如组织会员去穴森海岸⁹⁹进行海水浴等。

在这段时间里，由于柴田把精力全部用于开展组织工作，没有时间去找临时工的活计，所以他拖欠了半年的房租，在立石待不下去了，只好搬去本所区的锦丝町¹⁰⁰。然后白石也搬过去跟他住在一起。从那时起，柴田家的二楼就成了和工会和后来的出版工俱乐部的司令部。

不久后，白石同妇女部的渡边圣¹⁰¹结了婚，他们搬到了柴田家附近的一处公寓，虽然是只有六畳¹⁰²大小、附带厨房的单间，但总算是有了独自的住所。不过他们并没有享受新婚的快乐太久，因为他们的家很快就成了青年工人的落脚处。不管谁来，白石和阿圣都不会摆出厌烦的脸色。

二·二六事件

就在我们为了和工会的活动而四处奔波时，新的一年——一九三六年（昭和十一年）到来了。

那年二月的一个早上，雪下得很大，我们听说国会周围一带出了大事，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去公司上班的时候，跟我同在芝区工作的柴田过来找我，叫我跟他一起去。

我们俩冒着大雪涉雪而行。走到田村町一带的时候，发现大街上

区的一个町，现为文京区后乐町。——中译者注

⁹⁹ 此处有误，应为位于蒲田区羽田町（现属大田区）的穴守海水浴场。日语中“穴守”与“穴森”的读音同为 *anamori*。——中译者注

¹⁰⁰ 锦丝町（锦糸町）是东京都墨田区最繁华的地区之一。——中译者注

¹⁰¹ 原文为“渡辺せい”，由于せい并未写成汉字，故只能在同音的日本汉字中找出“圣”字来代替。——中译者注

¹⁰² “畳”是日本传统房间“和室”里铺设地板的材料，即叠席，音译为“榻榻米”。在东京，一畳的大小为 85 厘米乘 170 厘米，即 1.53 平方米。——中译者注

筑起了街垒，路上连一个行人都没有。著名的二·二六事件已经开始了。

近卫步兵第三联队、步兵第一、第三联队、野战重炮兵第七联队的一千四百余名士兵发动叛乱，袭击了首相、大藏大臣、内务大臣、侍从长、教育总监¹⁰³的私邸，还占领了警视厅、内务省、参谋本部、陆军省和朝日新闻社。他们杀死了内务大臣¹⁰⁴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和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重伤了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还发表了冈田首相当场身亡的消息，但后来得知，他的秘书替他受死，救了他一命。叛乱部队把一些重臣血祭后，便在永田町的首相官邸与主力会合，发表声明，扬言要“除去破坏国体的元凶”。

这场骚动持续了三天。戒严令下达了，除了军部的声明之外，禁止一切报道。

陆军省先是把这些部队称作“起义部队”，然后又改称“占领部队”，很快又改称“叛军”。从称呼的变化可以看出：发动政变的青年将校企图建立军政权，这让政界和财界的人很不高兴，而刚刚得知事件真相的国民也对军部感到反感，所以陆军便对叛军采取了强硬的立场。以这次事件为契机，言论、报道与集会的自由受到了非常严厉的限制。内务省还以维持治安为名，禁止了此前每年都要举行的五一节庆典。五一节庆典自此再也没能举行，直到日本战败、国民获得解放之后才能重新举行。军部以流血事件和戒严令为借口，大大加强了自

¹⁰³ 叛军的首批刺杀目标为：时任首相的冈田启介（1868—1952）、时任大藏大臣的高桥是清（1854—1936）、时任内大臣的斋藤实（1858—1936）、曾任内大臣和外务大臣的牧野伸显（1861—1949）、时任侍从长的铃木贯太郎（1868—1948）、时任陆军教育总监的渡边锭太郎（1874—1936）。其中，渡边锭太郎、高桥是清、斋藤实三人被叛军杀死，其余人则侥幸逃生。——中译者注

¹⁰⁴ 此处有误，斋藤实当时的职务不是“内务大臣”而是“内大臣”；冈田内阁的内务大臣应为后藤文夫（1884—1980）。“内务大臣”和“内大臣”是不同的官职。——中译者注

身的发言权。

安久公司罢工

此时的气氛越来越压抑，让国民喘不过气来。

尽管如此，和工会仍然继续组织小型集会，芝、神田、深川等支部仍然定期开会，到了五月，由于五一节庆典被禁止，我们便组织了郊游，不过我们并没有向会员广泛传达。这次郊游是在砧村¹⁰⁵附近的山林里举行的，前来参加的会员和他们的家属共有八十人。柴田看着参加郊游的人群，喃喃自语：“就算形势恶化，仍然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活动。”



砧村的郊游，1936年5月

¹⁰⁵ 砧村（砧村/きぬたむら）是原是东京府北多摩郡的一个村子，现属东京都世田谷区。——中译者注

但和工会并不只是同寻职会进行思想论战。我们当时还在进行两场斗争。

第一场是支援安久罢工的斗争，安久公司位于芝区新桥¹⁰⁶的高架桥下，雇员约有三十人。社长福井安久太打算以优化管理的名义解雇一批工人，其中一些工人是和工会的会员，所以我们反对解雇，而社长就假装关厂。我们在万朝报¹⁰⁷社旁边一家荞麦面馆里设立了罢工本部。随着斗争的激化，公司请来了黑龙会（这是一个从事反共运动的右翼团体，会长是右翼的大人物内田良平¹⁰⁸），所以罢工就变成了和工会与黑龙会的斗争。在当时的劳动争议中，惯常的做法，是让工会的右派干部出面同老板谈判，商量如何解决罢工。但在这次斗争中，在和工会的指导下，我们在各个工厂——主要是在当地的工厂里进行了宣传，吸引了大量工人的关注，逐步扩大了斗争。从京桥区到芝区，和工会会员不知疲倦地张贴海报，向当地工人发放传单，向工人募捐。我们的努力收到了成效，许多工厂踊跃捐款，小孩子也给我们寄来了声援信。

随着斗争在当地的扩大，罢工团获得了大量支援，和工会便向东京印刷工会（東京印刷工組合）和全评旗下的关东出版工会发出呼吁，请求它们共同参加斗争，争取罢工的胜利。于是我们就打算跟这些工会一起召开安久罢工誓师大会。在向警方报批时，警方却说不得举行

¹⁰⁶ 新桥（新橋/しんばし）是芝区的一个地名，1947年随芝区并入港区。——中译者注

¹⁰⁷ 《万朝報》于1892年11月1日在东京创刊，是日本最早的八卦报纸之一，1940年10月1日并入《東京毎夕新聞》。——中译者注

¹⁰⁸ 内田良平（内田 良平/うちだ りょうへい，1874年2月11日——1937年7月26日），生于福冈县福冈市，幼名良助。青年时期即投身亚细亚主义运动，曾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01年成立黑龙会。辛亥革命后，积极参加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亚的扩张活动。1931年成立大日本生产党，并担任总裁。——中译者注

跟安久罢工有关的大会，所以我们就以加藤勘十¹⁰⁹的时局报告演讲会的名义举行了誓师大会，和工会的岩田秀彦¹¹⁰代表罢工团在会上致辞。

这次斗争最后还是失败了，没能阻止关厂。

关于当时的状况，岩田是这么说的：

“虽然讲的是当时的和工会，不过也要讲一下安久工厂的罢工。大户匠¹¹¹和我都在那家公司工作，公司虽小，但白石还是非常努力地指导斗争。斗争结束后，我们对各方捐赠的款项做了结算，我现在记不太清了，好像还剩六七十元，和工会就对这笔钱的用途进行了讨论。最后决定把这笔钱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就拿着这笔钱找到了当时的日本工会全国评议会（全评），当时也有罢工基金、劳动基金（不过跟现在的不一样）这种东西，为了募集基金，这些钱是由白石管的。不过我对这些事不太清楚。那时候全评有个叫高野实¹¹²的人¹¹³，白石跟高野商量后，说服了高野，把余款交给了

¹⁰⁹ 加藤勘十（加藤 勘十/かとう かんじゅう，1892年2月25日——1978年9月27日），生于爱知县丹羽郡，曾就读于日本大学法学院，后退学。1918年随日军出兵西伯利亚干涉俄国革命，在俄国革命的感召下转向工人运动。1928年担任关东金属产业工会委员长，1929年参加工农党，1934年创立日本工会全国评议会（日本労働組合全国評議会），担任议长。1936年当选众议院议员，1937年担任日本无产阶级委员长，因卷入“人民阵线事件”而入狱。1945年参与创立日本社会党，任组织局长。1946—1949年当选众议院议员，1948年担任劳动大臣，1952—1969年连续当选众议院议员，1969年退出政界。——中译者注

¹¹⁰ 战后当过光阳印刷工会委员长。——原注

¹¹¹ 后来当过晓印刷常务董事、光阳印刷社长。——原注

¹¹² 高野实（高野 実/たかの みのる，1901年1月27日——1974年9月13日），生于东京市，1921年考入早稻田大学，同年参加了大学内的社会主义团体“文化会”。1922年参加日本共产党，1924年被大学开除后，投身工人运动。1934

全评的罢工基金，然后就回来了¹¹⁴。”

在这次斗争中涌现出了许多活动家。

另一场斗争是杉田屋印刷厂罢工，这家工厂位于麹町区¹¹⁵，也就是现在的千代田区，在一九三六年（昭和十一年），它通过寻职会雇用了一些技工。这家公司的排字工干的是把票据组成统计表的活，但是计件工资却越来越少，一开始是一页九十钱，可是后来减为八十钱了。当时在那家公司工作的盐原、酒井贡¹¹⁶、柴一等人商量之后，决定以请愿书的形式，提出给每一页的计件工资增加十钱的诉求。

社长的答复是：“竟敢叫我给你们加薪？简直岂有此理！一个子儿都别想加，谁不想干就滚。”和工会的樱井和坂村立即赶去支援，工厂发生了自发罢工，持续了两三天。老板大惊失色，立刻向麹町警署报了案，所以，当大家在早上于四谷站集合，准备去上工的时候，身后还有特务盯着。公司还利用工贼干活。厂里发生了斗殴，两名工人被捕。

樱井已经有了坐牢的觉悟，他去同麹町警署交涉，要求警方放人。但是警方骂了他一顿：“你们还嫌工资太低，要加薪？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工资已经不算少了？邮递员每天还挣不到一元。说到底，还是你们太贪心了！”然后把他赶了出来。不过最后工钱还是加了一点，

年参与创立日本工会全国评议会，担任组织部长兼机关报编辑部长。1937年因卷入“人民战线事件”而被捕。战后于1948年担任日本工会总同盟总干事，1951年担任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总评）事务局长，1955年在总评事务局长的竞选中落败。1956年再次参加日本共产党，1968年被共产党开除出党。1974年因肺结核去世。——中译者注

¹¹³ 战后当过总评事务局长。——原注

¹¹⁴ 白石光雄追悼文集刊行委员会，《与赤旗在一起》。——原注

¹¹⁵ 麹町区是东京的一个区，1878年创立，1947年与神田区合并为千代田区。——中译者注

¹¹⁶ 战后当过东洋经济目黑工厂工会委员长。——原注

虽然不多，但这仍然是一次胜利。

和工会改组为出版工俱乐部

柴田一面建设和工会，使其发展成为群众组织，一面又似乎在考虑更为扎实的组织结构。因此，他努力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虽然叫做干部，但大家都是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青年，幸好我们在这方面得到了一位优秀的帮手，他就是东京大学的学生 T 氏。

T 氏在仙台上高中的时候就参加了学生运动，后来考入了憧憬的东大。但是，他原本要加入的组织被破坏了，于是他认识了一些工人，想通过他们找到人生的意义。经过表弟的介绍，他认识了柴田，于是柴田便请他给活动家们上课。

和工会成立后，已经过去一年了。尽管我们已经揭露了寻职会的真面目，但它的反共攻击却变本加厉；它宣称“和工会是赤色组织”。

我们对此一点也不惊讶，但问题是我们的组织已经停止了增长。经过这一年的活动，我们的会员人数增加了两倍半，但发展到八十人左右就再也发展不下去了。会员人数止步不前的原因在于，顾名思义，我们只吸收日语书籍的活版印刷工人，也就是拣字工、排字工和拆版工参加，而没有吸收那些西式书籍的印刷工参加。这是因为我们原本是一个为了帮助那些由于参加东印罢工而被解雇的工人的组织。为了进一步扩大组织，我们必须吸收印刷出版业的全体工人，包括外文书印刷工、平版印刷工、装订工，以及出版业的工人在内。除了彻底揭露寻职会之外，我们的活动主要是帮助失业的印刷工人找工作，所以，会加入我们组织的人，就只有觉悟的活动家和想找工作的失业工人。

“组织要想壮大，就必须让广大工厂工人乐于加入。”当时大家都在认真地思考这一点。

这就是和工会改组为出版工俱乐部的原因，不过当时我们并不知

道这一切背后的真正原因，但听过一些传言，说海员工会（海員組合）有个组织者，是共产党员，改组是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的。

后来，关口正博¹¹⁷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认为，改组受到了日本共产党的影响：

“我不太记得我是什么时候、怎样认识柴田的了。那是一九三〇年（昭和五年），正是战争爆发前夕，已被强行解散的关东出版工会（它是评议会的加盟工会）在四·一六之后，改组为全国性产业工会——全国协议会旗下的日本出版工会（日本出版労働組合），由于敌人的镇压，而被迫转入地下，努力地进行重建，就在这时候我因为参加了五一节，被拘留了二十九天，我的阶级觉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觉醒的。

“在之后的几年里，我担任了日本出版工会的组织者，在东京支部的小石川、牛込、神田等支部的印刷工厂里开展工作，就在这段时间里，满洲事变爆发了，敌人的镇压一天比一天疯狂，以岩田义道和小林多喜二为首的一批日本共产党优秀领袖就是在这个时期被杀害的，而总同盟也宣布拥护战争，自愿放弃了它唯一的武器——罢工权，在那个时期，我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黑暗。我们这些残存的印刷工人，无论形势如何变化，始终坚信共产党不会消失，并向它寻求指导，在困境中坚持斗争。

“那个时候（年份不明），我认识了松仓二郎¹¹⁸氏，当时我在有贺氏¹¹⁹和山崎¹²⁰的指导下，学习人民阵线战术，后

¹¹⁷ 战后参加了晓印刷的建设，现在担任光阳印刷董事。——原注

¹¹⁸ 战后在晓印刷所活动。——原注

¹¹⁹ 笔名“西先生”（西さん），战后当了评论社社长。——原注

来我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既然不能成立工会，那总得想办法把工人集结起来，我怀着这样的想法，接触了松仓等人，就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了柴田。

“当时柴田的家在深川，他的家就像梁山泊（豪杰和野心家聚集的地方）一样，集结了许多青年，充满了活力。我有时会在和工会露个脸，我父亲当时是加藤文明社的工厂厂长，我就利用这层关系，给那些由于参加东印罢工而失业的工人介绍工作。我父亲也很看得起柴田，说他技术好、上班勤、努力工作又不多话。现已去世的白石等人也经常来当临时工，把那里当作根据地来利用。

“我很快就把和工会的情况报告给西先生和山崎，他们给我们出了一些主意。我想，打算以这个组织为母体、在战争的风暴中培养出印刷工人的新工会——而不仅仅是职业介绍所或联谊会——的人，应该不只有我们。我记得，我在跟柴田联络的时候，讨论过改名为‘出版工俱乐部’的提案、发行报纸、加强辅助活动等问题。我是所谓的地下活动家那种人，在性格上跟柴田恐怕不太合得来，尽管如此，他总是认真倾听我的意见，我记得《出版工俱乐部新闻》（出版工クラブニュース）第一期第一页上的文章就是西先生和我写的。这篇文章在俱乐部会员们的投票中入选了第一等，记得奖品是都电¹²¹的车票。”

¹²⁰ 指当时担任全协组织者、负责日本出版工会东京支部的重建工作的有贺新与山崎早市两人。1991年，山崎在接受采访时，声称柴田和白石是在他和有贺的指导下，才把和工会改组为出版工俱乐部的。请参阅：大原社会問題研究所杂志，No.626，2010年12月，第51—64页。——中译者注

¹²¹ 都电（都電/とでん）是东京都电车（東京都電車）的简称，它是由东京都交通局运营的有轨电车线路。——中译者注

把和工会改组为出版工俱乐部的方针是这样定下来的：

“和工会一直在努力改变工人的想法，但是，要想推动运动前进，这还远远不够。会员人数始终没有增长，也证明了这一点。要想改变工资过低的状况，就必须推动运动前进，增加会员人数。为了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和工会必须转变为一个任何人都能比较方便地加入的组织，使会员人数显著增长。为了吸引新会员，我们必须把工作重心从街头转向工厂，不仅要吸收拣字工和排字工，也要吸收外语排字工、印刷工和胶版工。”

活动家们开始为改组做准备。我还记得，当时柴田说过这样的话：

“在意大利，工人有各种按照地区划分的俱乐部，晚上下班后，他们就聚在俱乐部里，喝茶，听音乐，从一天的疲劳中恢复过来。通过这些活动，他们促进了友谊，加强了团结。我想在日本建立这样的团体。”

第六章 与广大群众相结合

成立出版工俱乐部的准备工作

把和工会改组为俱乐部的工作，是从一九三六年（昭和十一年）年底开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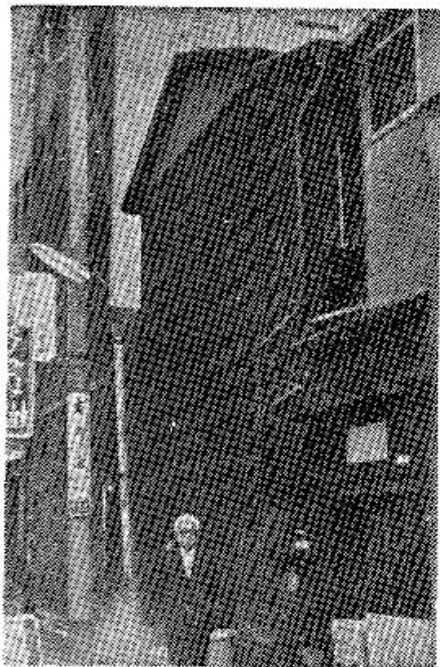
会员们开始对新方针进行讨论，为了给新组织起一个名副其实的名字，进行了广泛的征名活动。从收集到的大量建议中，我们采用了“出版工俱乐部”这个名字¹²²。

然后我们在芝区田村町四丁目（现在的西新桥）的路口租了一栋两层小楼，用作办公室。押金是一百元，租金是二十元。安久罢工的核心人物岩田住在一楼，管理办公室。他的妻子叫喜久枝，以前参加过共产党的活动，是个既漂亮又干练的人。为了让办公室更像样，得有黑板才行。以前帮过忙的一位胶版工为俱乐部做了一块二间半¹²³的大黑板。还有人捐献了将棋¹²⁴和围棋。我们把玻璃板嵌在桌子上，再把厚纸板剪开，贴在玻璃板上，就成了手工制作的油印台，它非常好用，此后就成了我们开展活动的武器。

¹²² 为了方便，“俱乐部”三字一般写成片假名“クラブ”。——原注

¹²³ “间”（間）是衡量地毯大小的单位，在东日本的大部分地方，二间半大约相当于4.5米见方的面积。——中译者注

¹²⁴ 将棋是一种流行于日本的棋类游戏，由古印度象棋演变而来。——中译者注



作者站在位于芝区田村町的出版工俱乐部办公处门前

和工会改组为出版工俱乐部后，马上迎来了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的元月，我们在西神田亭举办了新年庆祝会暨俱乐部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两百人。虽然叫成立大会，却不像和工会时期举行的集会那么严肃拘谨，以会员们表演才艺、唱歌，上演落语¹²⁵和戏剧为主。其中一出是根据采购部的会员们的活动改编的宣传性戏剧¹²⁶，还上演了小山内薰¹²⁷的《儿子》¹²⁸，这些都是符合运动的大众化的方向、与

¹²⁵ 落语是日本的一种表演艺术，类似于中国的单口相声。——中译者注

¹²⁶ 制服和工作鞋之类的货物，是按照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整批购入，然后再卖给会员的——这样可以给组织增加一些收入，也可以帮助工人从微薄的收入中省下一点钱。——英译者注

¹²⁷ 小山内薰（小山内 薰/おさない かおる，1881年7月26日——1928年12

俱乐部的成立相符合的剧目。



出版工俱乐部的成立仪式（1937年1月14日）

柴田向我们这些活动家强调指出：

“迄今为止，我们都只是跟寻职会对抗，但从今以后，我们要扩大自己的活动。我们必须广泛地吸收和组织工人。大工厂里有工会，那里的工人可以依靠组织的力量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中小微企业的工人却没有组织来保卫他们的生活水平。我们当前的目标，就是要把这些不能参加工会、觉悟比较低的中小微企业的工人给组织起来。所以，不要讲

月25日），日本剧作家、表演家、小说家，日本戏剧革新运动的主将之一。《儿子》（息子）是他于1924年发表的剧作。——中译者注

¹²⁸ 这出戏（《儿子》）是新剧运动中的重要作品，而新剧运动又与筑地小剧场有着密切的联系。——英译者注

难懂的话，而要去多多认识人。要广交朋友，通过他们，尽量争取这类工厂中的正式工，培养他们的协作意识。对那些吹嘘自己搞过工人运动或左翼运动、对我们的运动吹毛求疵、又对我们的运动冷眼旁观的人，也就是说，那种好像烧过的柴火¹²⁹一般的人，没必要理睬他们。当你们走访工厂时，会有很多怀着纯真的正义之心的年轻人。重要的是把这些人争取过来。我坚信，如果你们能够明白这一点，并照此发展运动的话，俱乐部就一定能够发展壮大。”

柴田根本看不上那些吹嘘自己参加过工会运动、或是以自己属于知识分子而沾沾自喜的人。相反，他关注的是围绕那些阶级觉悟还不高的青年工人开展活动。

有一次，一个人找上门来，批评了出版工俱乐部，说俱乐部的活动太缩手缩脚了；这个人以前曾是横滨市电¹³⁰工会的干部，但当时已经什么活动都不参加了。柴田毫不客气地反驳了他：

“那你现在又搞了什么活动呢？光讲大道理，却一点实事都不干，这样做又有什么用呢？一个人的价值，并不仅仅取决于能否像学者一样知识渊博。看看那些青年吧，他们正在参加俱乐部的活动，努力把采购部的草鞋运给工人。他们知道，这样做有利于印刷工人的团结，所以他们才会这么做。在我看来，他们比你更了不起。你也跟他们一起，为了工人而行动起来吧。大道理还是留到以后再讲吧。”

¹²⁹ 原文为“烧け棒杭”（やけぼっくい），直译为“烧过的柴火”，大概是指已经燃尽了激情、不愿做实事、只想冷眼旁观指指点点的人。——中译者注

¹³⁰ 日本的“市电”一般是指由市政府运营的电车系统。——中译者注

然后他又对我说：

“那个人还说什么，‘革命到来时，我就会拿起枪到街垒上战斗。’但是，革命形势到来的时候，不管是谁都会这么干。重要的是如何改变现状。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互助运动、介绍工作和采购物资之类的活动，不管多么小、多么不起眼，只要我们做了，就能帮到工人，吸引大量工人加入，然后再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这才是最重要的事。光在嘴上大唱革命高调，是毫无用处的。”

他用这些话，鼓舞我们投入活动。

俱乐部的工作重心是工厂。在工厂里有无数的青年工人，他们的阶级意识可以说是一张白纸。这些青年只有小学学历，顶多也只有高等小学¹³¹学历，所以他们几乎没有阶级觉悟，甚至可以说他们对阶级问题一无所知。这些青年出身贫苦家庭，尝尽了贫穷的滋味，小学毕业后，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和补贴家用，就不得不出来打工。在工厂里，他们工资少，工时长，不管干多久，都没有出头之日。这些青年的人生中一无所有，对他们来说，整个世界是惨淡无光、毫无前途的。

但是，这些青年拥有一切青年都具备的、青年特有的品性：他们拥有正义感，渴求进步，发自内心地憧憬高尚的事物，怀有改变未来的理想精神。他们全都具有惊人的能量，使他们能够为了正义而忍受任何艰难困苦。

出版工俱乐部要把这些人才集结起来，帮助他们体会到为大家奉

¹³¹ 1900年，日本政府规定，小学分为普通小学和高等小学，学制均为四年；1907年改为普通小学六年、高等小学两年；1941年，普通小学改称“国民学校初等科”，高等小学改为“国民学校高等科”，学制不变。1947年，“国民学校初等科”改为小学校，“国民学校高等科”改为初中一年级和二年级。所以这里的“高等小学学历”即相当于初二学历。——中译者注

献的快乐，通过俱乐部的活动来训练和锻造他们，以此为契机，推动运动进一步向前发展，最终把他们培养成阶级斗争的有用之才。

以群众为基础建立组织

写到这里，我必须澄清一件事。柴田曾是战斗工会“全协”的会员，但是，全协覆灭后，他并没有参加其它工会的活动，相反，他却成立了联谊会性质的和工会与出版工俱乐部，直到他庾死狱中为止，他都在坚持开展这种活动，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只要思考一下当时的形势，就能明白了。当时，统治阶级对反对战争的日本共产党和全协进行了严酷的镇压。共产党遭到了不断的、无情的镇压。著名的小林多喜二和野吕荣太郎¹³²就是在那个时期被捕遇害的。另一方面，以佐野学¹³³和锅山贞亲¹³⁴为首的一批共产党最高

¹³² 野吕荣太郎（野呂 榮太郎/のろ えいたろう，1900年4月30日——1934年2月19日），生于北海道长沼町，中学毕业后考入庆应义塾大学，就读大学期间开始参加革命运动，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天便因卷入“京都学连事件”而被捕，被监禁十个月。获释后进入产业劳动调查所工作，担任调查员。1929年4·16事件后再次被捕，被拘留了一个月。1930年1月参加日本共产党，同年开始编纂《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日本資本主義発達史講座）。1932年底开始承担日共的重建工作，1933年11月28日因特务告发而被捕，因遭受毒刑拷打，健康状况严重恶化，1934年2月19日被送往医院后逝世。——中译者注

¹³³ 佐野学（佐野 学/さの まなぶ，1892年2月22日——1953年3月9日），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曾在日本劝业银行和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工作。1922年7月参加日共，1923年2月当选为执行委员，同年5月流亡苏联。1925年7月归国，重建日共，1926年3月被判处监禁十个月。1927年12月担任日共中央委员长。1928年访问苏联，参加了共产国际六大，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常任委员。1929年3月受共产国际派遣，前往上海，同年6月在上海被捕，1932年被判处无期徒刑，1933年在狱中发表转向声明，宣布拥护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和天皇制。1934年5月减为15年徒刑，1943年10月出

干部也转向¹³⁵了。为了驱除混入党内的特务，还引发了“特务审查事件”¹³⁶——这是统治阶级炮制的阴谋，因为共产党勇敢地反对侵略战争，所以统治阶级就要极力破坏共产党的威望。

柴田所属的全协也多次遭到镇压，在一九三三年（昭和八年）二月、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九三四年六月、一九三四年七月的几次大镇压中，大批全协活动家被捕，全协几乎被彻底摧毁了。

这就是当时的工会运动的大致状况。信奉天皇制、鼓吹“建国精神”的日本主义派、国家主义派的工会趁机利用这种形势，企图把劳资和谐的精神强加给工人。

在工会运动当中，既有被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把持的工会，也有一些由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领导的工会，前者的代表是劳动总同盟（以下简称“总同盟”），后者的代表是日本工会全国评议会（以下简称“全评”）。当时，总同盟处于社会大众党的影响之下，打着“反资本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旗号，但这“三反纲领”落

狱。战后创立民主社会主义联盟并担任理事。还曾担任早稻田大学商学院教授。
——中译者注

¹³⁴ 锅山贞亲（鍋山 貞親/なべやま さだちか，1901年9月1日——1979年8月18日），生于大阪府东成郡，小学毕业后当过车工。曾参加友爱会，后参加总同盟和日共。参与了日本工会评议会的创立。3·15事件之后，与佐野学一同负责党的重建工作。在1929年4·16事件中被捕，1933年与佐野学共同发表转向声明。1946年参与创立世界民主研究所并任理事，参加反共运动。1950年与佐野学等人创立民主社会主义联盟。——中译者注

¹³⁵ 转向（転向），本意为改变方向、方针、道路、职业，引申为改变思想主张或政治立场，在日本的社会运动中特指抛弃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立场，是“叛变”或“变节”的委婉语。——中译者注

¹³⁶ 1933年12月23日，时任日共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官本显治和袴田里见，对被怀疑为特务的两位中央委员大泉兼藏和小畑达夫进行审查，在审查过程中动用了肉刑，导致小畑达夫于24日身亡。此事曝光后，日帝当局趁机大肆污蔑共产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涉及此案的官本显治等人也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长期监禁。史称“日本共产党特务审查事件”（日本共産党スパイ査問事件）。——中译者注

实到实际中，就是迫使工人接受反共思想和劳资和谐思想。柴田当然是反对工会中的这些倾向的，所以，我认为他不愿参加这些工会，也是很自然的事。尽管全评坚持阶级立场，并试图组建统一战线，但它的主力是公共事业的运输工人，私营企业的工人很少，所以它没有太大的力量。更要命的是，全协覆灭后，特高就腾出手来，加强了对全评的镇压。

柴田很赞赏全协的阶级觉悟，曾参加过全协的活动，但是，他也认为全协沉溺于街头活动，并对此进行了强烈的批评。他认为，如果不建立起一个拥有群众基础——而不是以街头活动为基础——的组织，就无法保卫工人的生活与权利，也无法阻止即将来临的战争，不能赢得和平。后来，在一九三〇年夏季的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全协的方针和活动遭到了批评。我认为，正是这些批评，促使柴田选择了以联谊会的形式开展活动的方针。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我走访了許多人，向他们打听柴田的事。比柴田稍早一些加入全协的中岛良助¹³⁷告诉我，柴田在后来的活动中，努力避免重新犯下全协的活动中的错误。中岛说：

“我在参加全协活动时，负责分发《赤旗》¹³⁸，结果被关进了市谷刑务所¹³⁹，最后被判了缓刑，才从牢里出来。当

¹³⁷ 战后当过一段时间的日本共产党东京中央地区委员，在自家经营印刷业。——原注

¹³⁸ 《赤旗》（战前读音为せっき，战后读音为あかはた）是日本共产党机关报，1928年2月1日创刊，最初为半月刊，每月1日和15日发行。1935年1月20日发行第187期后，由于日共中央遭到彻底破坏而停刊。1945年10月20日复刊，发行至今。——中译者注

¹³⁹ 市谷刑务所（市谷刑務所/いちがやけいむしょ）原是警视厅锻冶桥监狱，1903年被内务省移交给司法省后，改称东京监狱。在1903—1910年间，东京监狱附近另有“市谷监狱”，经常被混淆。1922年改称市谷刑务所。1937年迁往巢鸭，改称东京拘留所（東京拘留所/とうきょうこうちしょ）。——中译者注

时，在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大会上，洛佐夫斯基¹⁴⁰就日本问题做了报告，这个报告的内容及决议传达下来后，对我们的思想造成了雷击一般的震动。我记得，在读那份文件时，我在上面划了好多红线。文件的内容是：全协是日本的革命工会，但它的活动家在开展工会活动时，却不懂得根据冷静的计算来决定前进还是后退，还批评了把工会和思想团体混为一谈的错误，并决定对此加以纠正。当时领导共产党中央的是田中清玄¹⁴¹，他的领导加剧了全协的错误。在极左方针的指导下，哪怕是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也要鼓动罢工。因此，在全协内部，形成了批判中央方针的‘刷新同盟’。虽然我是追随中央的，但刷新同盟的佐藤秀一（当时在大仓印刷工作）却来做我的工作，想劝我跟‘刷同’走，但我对他说：

¹⁴⁰ 所罗门·阿布拉莫维奇·洛佐夫斯基（Соломон Абрамович Лозовский，1878年3月28日——1952年8月12日），原姓德里佐（Дридзо），生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一个贫穷的犹太教师家庭，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在铁路工人中间开展组织工作。1903年移居圣彼得堡后被捕，被流放到喀山。190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期间，在1905年10月因袭击喀山警察局而被捕，三周后获释，12月又在圣彼得堡被捕，逃亡哈尔科夫后再次被捕。1906年7月至1908年5月被关押在狱中，随后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但在押送途中逃脱，从此流亡国外。1917年6月回国，并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7月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理事会书记。1918年1月11日被布尔什维克开除出党。1919年12月重新加入俄共（布）。1921—1937年间担任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1937年改任副外交人民委员。苏德战争期间担任苏联新闻局副局长。1945—1948年担任苏联新闻局局长。1949年1月26日因卷入“犹太阴谋”而被捕，1952年7月18日被判处死刑，8月12日被处死。1955年11月22日平反。——中译者注

¹⁴¹ 田中清玄（田中 清玄/たなか せいげん，1906年3月5日——1993年12月10日），生于北海道龟田郡，1927年4月考入东京大学，同年9月加入日本共产党，1929年退学，同年7月着手重建被破坏的党中央，并担任中央委员长，实行了武装暴动的极左路线。1930年7月14日被捕，1934年在狱中叛变，转为天皇主义者。1941年4月29日出狱，参加右翼运动。战后下海经商，从事建设业。——中译者注

‘对抗中央是错误的’，反过来说服了他，最后我们就各走各的路了。佐藤是个灵活的人，在理论方面比别人更胜一筹。当时‘刷同’正在牛込、神田开展‘冰水斗争’。在牛込和神田的微型装订工厂里，工时十三小时是很普通的事，就是在盛夏的酷暑中也得拼命地干活。所以就到那些工厂里，开展了‘给我一杯冰水，什么都不加也行’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还要争取十分钟休息时间。这场斗争很快就扩散到了许多工厂里。到了这一步，属于中央派的我们就到处撒传单，鼓动市电罢工。全协虽然具有革命的精神，但那时候的活动却充满了错误，不怎么考虑客观条件。所以，读了红色工会国际五大的决议后，我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我根据这些反省，观察出版工俱乐部的活动。我看到，俱乐部的活动，都是围绕着工厂工人的多方面要求而开展的，我认为这样做是很明智的。”

当时中岛良助正处于缓刑期，所以他不能太接近俱乐部，不过，他在一旁客观地观察了俱乐部的活动。

在这里，参考洛佐夫斯基在日本委员会上做的报告，把红色工会国际的批评意见部分摘抄如下：

“日本现在的经济危机、大规模失业、农业危机、出口萎缩、大众贫困等客观状况，对工会的发展构成了有利的形势。然而，在这两年时间里，日本的工会却倒退了。之所以倒退，固然是因为统治阶级的镇压，但同时也是因为策略错误、群众活动不够充分、不懂得如何与群众相结合。在全协的活动中，充斥着不该在工会中使用的左翼言辞。‘武装罢工’、‘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恐怖’、‘杀死背信弃义的领袖’。

革命的高调虽然喊得震天响，归根结底也不过是儿戏罢了。这种把考虑工资和工作日问题的人当成机会主义者、以为自己还有更重要的课题要考虑的思路就是根本原因。抱着这种思路，组织自然发展不起来。高喊这类口号的干部，必须让他们暂时离开领导岗位。派别组织‘刷同’必须解散¹⁴²。”

就像中岛说的那样，对全协的街头活动抱有疑问的柴田，或许对这个批评意见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随着法西斯主义日渐猖獗，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合法工会，容身之地都越来越小了。我认为，柴田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才会认为联谊会组织工人的最佳形式。后来，在出版工俱乐部的活动中，一些会员多次声称俱乐部的活动方针太软弱，并主张应当把俱乐部转变为工会，组织差点就要分裂，也有不少会员脱离了俱乐部。但是，柴田从始至终都在强调，以联谊会的形式开展斗争，才是正确的做法。随着俱乐部的发展，我越来越相信这才是正确的路线。

俱乐部的活动是扎实的。我们埋头发展会员，收集到了一批工厂内的积极青年的名单，并制定了同他们进行具体接触的对策，照此开展工作。俱乐部吸引了许多怀着青年人的正义感的活跃工人。为了培养这些青年工人，俱乐部开展了多方面的活动。

出版工俱乐部的多方面活动

根据商工省的工业统计，在一九三八年（昭和十三年），印刷装订工厂共有三千九百三十二家，但员工人数为一百人以上的工厂仅占

¹⁴² 《社会主义运动》，第二卷，第三百三十五页，美铃书房（みすず書房），一九六五年。——原注

百分之一·七，而它们的产量占了整个产业的百分之六十，剩下的三千八百六十一家中小微工厂占了剩下的百分之四十。

就算是在大企业里，劳动条件也非常糟糕。

以凸版印刷为例，正式社员的工资是按月发放，而准社员的工资是按月或日来发放，工人则按日领薪，在食堂和宿舍方面，也有身份差异。

每天的工作时间是十个小时，从早上七点直到下午五点，但是，在开工之前，必须提前十分钟抵达工厂。如果迟到，就不能进厂，这一天就要被记为旷工。事实上，由于天天都要加班，每天的工作时间要远远超过十小时。

一月一日到一月四日是社休日¹⁴³，除此之外，只有星期天、十二月三十日和三十一日才能休息，但是，休息日是不发工资的。

在计算退职金时，工人还要遭到公司的压力：如果公司判定工人“严重败坏工厂风纪”，“品德明显不良”，或是“多次警告仍然不能按时出勤”，就会被解雇。有时候，被解雇的工人连一分钱退职金都拿不到。

大公司的情况就是这样，然而中小微工厂的工人，更是个个都有一肚子吐不出来的苦水。许多工厂只有在每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日才会放假，天天都要加班，就算是干得这么苦，工人也只能勉强糊口。对于在中小微工厂工作的工人来说，无论他们是否愿意，成立一个组织来保护他们的权益的条件都已经成熟了。

出版工俱乐部每月都要举行一次大会，特高警察总是会来“参加”，但是，当特高离去、议程结束之后，我们就会用大家都能听懂的话来讨论国内外形势，对大家进行启蒙。俱乐部的活动逐渐变得丰富起来。从和工会时期就存在的采购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求职部

¹⁴³ 社休日（しゃきゅうび）是指除了星期日和法定节假日之外、由公司单独规定的休息日。——中译者注

也与各家工厂加强了联系，积极地为失业者找工作。对于那些找到了工作、却连上下班的车钱都出不起的失业工人，俱乐部还会借给他们交通费，金额相当于那个时候的三元，足以购买一个月的市电车票，等到他们开始工作之后再偿还。这样他们就不会因为买不起车票而无法上班了。

俱乐部还开展了文化娱乐方面的活动，它频繁地组织俳句的运座会¹⁴⁴，还有将棋比赛，发动各工厂参加。久板荣二郎¹⁴⁵的戏剧《神圣家族》在筑地小剧场上演时，俱乐部把整个剧场租了下来，举办了为期一天的会员专场。这出戏的主角是一个活版工，这使我们能够更容易地劝说大家来观看。

在和工会时期，多亏了小野印刷的老板的好意，以及会员们的协助，我们才能印刷会刊。但是，改为俱乐部后，这种手工业式的做法就不能满足要求了。《俱乐部新闻》是在神田的冢田印刷厂印制的；有一位会员在那家工厂工作，他说服了老板，让老板给我们优惠价。我们的印量是一千份左右，印刷费是九元左右。一位会员向冢田印刷的老板介绍了俱乐部的宗旨，请求老板给我们打折，老板同意了，他还说了一番同情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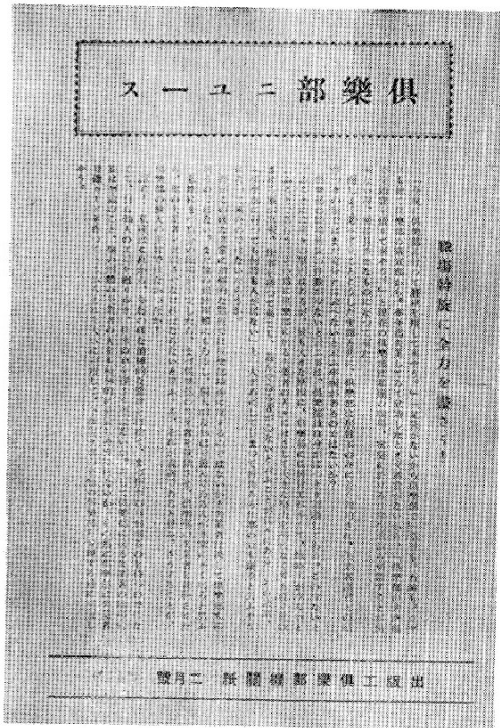
“像出版工俱乐部这样让工人聚在一起增进友谊的组织，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我一直希望工人能过上好生活。将来的工人不应住在城市里，而应该住在郊外的漂亮的小房子里，周围围着花坛，生活在这样舒适的环境里。这是我唯

¹⁴⁴ 运座（運座/うんざ）：一群人聚在一起，创作、朗诵、鉴赏俳句的活动。——中译者注

¹⁴⁵ 久板荣二郎（久板 栄二郎/ひさいた えいじろう、1898年7月3日——1976年6月9日），剧作家，生于宫城县名取郡，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院，在读大学期间参加无产阶级戏剧运动。1934年参加新协剧团。《神圣家族》（神聖家族）是他在1939年创作的剧本。——中译者注

一的理想。”

出版工俱乐部非常感激这位老板的善意。毕竟我们的会费标准并不高：日薪一元以上的会员，每月交十五钱，日薪不到一元的会员每月交十钱，失业的会员不用交会费，所以我们的资金非常紧张，从这么点资金当中挤出印刷费，是件艰难的任务。



原本以为已经全部毁于战火、但后来又重新找到的《俱乐部新闻》

每年正月，各支部都要举行新年会。无论哪个团体都会这么做，但出版工俱乐部有个独特之处，就是它总是让新加入的活动家来组织新年会，从当日的准备到具体实施，再到接待参加者，都由新人包揽。

此前一直浑浑噩噩地混日子的青年活动家，在这种活动中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便全力以赴地组织新年会。先是策划活动、租赁会场，搞定之后再跟各工厂联络，敲定当天的日程安排。年轻的干部付出的巨大努力获得了回报，许多工厂的工人前来参加新年宴会。年轻的干部虽然神色紧张、手忙脚乱，但还是努力主持宴会。在这种友好和谐的氛围中，新年宴会圆满结束了。

新年会结束后，柴田总是会听取新加入的活动家的报告。然后他们就会交流意见，讨论哪些方面做得很好，哪些方面做的不好。最后他就会诚恳耐心地鼓励他们：

“你们不要以为这些工作是琐碎小事。通过这些工作，可以把未组织工人给团结起来。只要我们不停地开展这些活动，就一定能够把整个东京的印刷工人给团结起来。但是，这只有你们这些年轻人才能做到。年纪大的人，回到家里，还得照顾老婆孩子。他们都被家庭拴住了。要让他们像你们那样去做事，实在太勉强了。只有你们这些具有正义感的青年，才会奋不顾身地为他人工作。这就是我对你们的期待。想一想吧，把你今天的生活跟过去的生活比较一下，为帮助他人而全力工作不是更带劲吗？”

我们不光举办新年宴会。那些来参加将棋比赛、俳句会和运动会的人，起初只是因为爱好才来的，但是，到了一定程度，我们就会有意识地让他们做点什么事，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在一项活动中完成了杂务的新活动家欣喜地参加了接下来的活动。而且他们还在上班的时候挤出时间，无偿地参加活动。

中岛讲述了他的感想：

“我认为柴田氏是这么想的：重点在于，要让尽可能多的工人觉醒起来，让他们懂得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阶级。现在要唤醒这种觉悟，有很多机会，比如选举。但在那时候的活动中，就只能逐个逐个地培养工人的自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那些只会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的伪知识分子给聚集起来，也不会产生什么力量。他认为作为物质力量的工人本身才是重要的，并坚信工人身上具有建立革命力量的条件。所以说，没必要唱高调、讲大道理。让女工读《居里夫人传》，哪怕受到感动的只有三四个女工，这样做才是重要的。他在跟工人谈话的时候，会非常慎重地选择字眼。他不讲当时的进步人士偏爱的那些字眼，总是用平易近人的方式讲话。

“参加出版工俱乐部的活动的人，并不都是勇敢的人。就连已经去世的福田君¹⁴⁶那样温和、性格软弱、连朴素的阶级觉悟都没有的人，也受到了柴田氏的鼓舞，他们虽然觉得我们做的事情很吓人，但是看见我们在选定这条路之后就会义无反顾地走到底的样子，好像也感受到了柴田的非凡的领导能力。我想，一个单纯的鼓动者，是不可能像柴田那样指导和培养这些人的。在我看来，他毫无私心、为运动鞠躬尽瘁的人格——换句话说，就是作为革命家的人格魅力，把这些人给吸引过来了。”

是联谊会还是工会？

正当我们积极开展这些活动时，国外发生了一件大事，对日本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就是一九三五年（昭和十年）的共产国际第七

¹⁴⁶ 战后当过全日本印刷出版工会京桥支部会员。——原注

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提出了这样的方针：为了打倒法西斯主义，全世界劳动人民必须携手斗争，也就是要组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此时，在二·二六事件后，日本的法西斯主义风潮变得越来越强大了，因此，共产国际的方针开始出现在报纸和杂志上，它们急切地宣告，为了反抗法西斯主义，从左翼到自由主义者都应当联合起来，建立广泛的人民阵线。但是，本应成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核心的日本共产党，已经在接二连三的镇压中瓦解了。尽管如此，还是出现了一些符合这些报道的期待的动向，这确实是事实。

此时，工农无产协议会（后来改为日本无产党）与全评、东京交工会、东京市从业员工会等组织联名向社会大众党建议，共同进行反法西斯斗争。

围绕着这个问题，出版工俱乐部内部出现了一个问题。

当时，高津正道¹⁴⁷（战后当上了社会党籍的国会议员）建议，把东京印刷工会和全评旗下的东京出版工会（東京出版労働組合）合并为东京市印刷工拥护联盟（東京市印刷工擁護連盟），并邀请各团体参加恳谈会，也邀请了出版工俱乐部。这件事引发了本部和神田支部之间的矛盾。

当时神田支部设在小石川諏访町的一个姓“向”的人的住宅的二楼。它跟芝支部和深川支部一样，会员都是完全没有参加工人运动的青年，但是它的会员当中有几个人，出身于学生运动，有过工人运动的经验。在这些人看来，出版工俱乐部的活动方式——自称是帮助失业工人的联谊会、在工厂廉价出售货物、通过棒球比赛和俳句活动发

¹⁴⁷ 高津正道（高津 正道/たかつ まさみち，1893年4月20日——1974年1月9日），生于广岛县御调郡，1918年考入早稻田大学文学院哲学系，在学期间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22年参与创立日本共产党，1923年流亡国外，1925年归国后退出日共，1927年参加劳农党，1937年参与创立日本无产党。战后参与创立日本社会党，并多次当选国会众议员，1954—1955年担任众议院副议长。——中译者注

展新会员——实在太缩手缩脚了，并不符合当前形势的要求，所以，他们开始主张，应当把出版工俱乐部转变为工会。自从他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之后，他们对俱乐部的活动，自然就不像以前那样积极了。在行动之前，他们总要长篇大论一番，说什么形势如此如此，这般那般什么的。

柴田既没有邀请这些人参加学习会，也不太愿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另一方面，这些人很可能认为，柴田把许多青年吸引到自己身边，利用青年们对自己的敬意，把青年们当作手脚来使用，并把青年们束缚在低水平的运动上。一九三六年（昭和十一年），无产阶级政党——社会大众党在大选中取得了大跃进，众议员人数从五人猛增为十七人¹⁴⁸，工人运动也出现了短暂的上扬，他们就觉得，这证明了他们的信念是正确的，变得更加坚定了。于是，本部和神田支部就发生了论战。柴田和白石每晚都到神田支部去，就路线问题进行争论。我们也间接地得知了论战的结果。

最后，由于路线问题得不到解决，以 Y¹⁴⁹为首的一些人脱离了俱乐部，成立了以高津正道为首的印刷技术员协会（印刷技術員協会）¹⁵⁰。Y 回忆道：

“最后，我们跟白石君就下列事项达成了妥协：在发生罢工时，像你们这样的联谊会是没有能力站出来领导罢工

¹⁴⁸ 1936年1月21日，立宪政友会在众议院中对冈田启介内阁提出了不信任案，于是冈田启介便宣布解散众议院，重新举行大选。在1936年2月20日的众议院选举中，社会大众党有18人当选众议员。——中译者注

¹⁴⁹ Y就是时任神田支部长的山崎早市（山崎 早市/やまざき そういち，1908年？月？日——1992年6月29日），他是主张把俱乐部改为工会的人之一，脱离俱乐部后，他参加了全日本出版工人协会，并担任书记长。——中译者注

¹⁵⁰ 但山崎早市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成立的这个组织叫“全日本出版工人协会”（全日本出版労働者協会）。——中译者注

的。所以，每当发生罢工时，就应该让协会来处理，作为交换，我们会让那些觉悟较低、尚不足以参加工会的工人参加俱乐部。白石君笑着说，‘那就这样吧’，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在印刷技术员协会的成立仪式上，他代表俱乐部向我们祝贺。”

但是，双方其实并没有进行过这样的合作。

柴田的态度与白石截然不同。他坚决反对这次分裂，甚至用这件事来教育我们青年。他解释说，战斗工会一个又一个地被镇压了，所以，在这种形势下，就算我们打出工会的招牌，也还是无济于事，他还批评说，这些人把高津正道这个名人抬出来背书，这种做法是权威主义，在目前形势下，把俱乐部改为工会的主意显然是错误的。他强调指出，在严厉的镇压下，要想维持和发展组织，就只能像俱乐部现在这样开展活动，让每个会员自主活动，在工厂扎根，培养大量的青年。最后神田支部只有这一小批人分裂出去。后来 Y 当上了印刷技术员协会的书记长，但是三年后，这个组织就不复存在了。

在决定运动的发展方向时，柴田总是非常慎重。

“黑帮在敲诈勒索的时候，会充分考虑对方的力量。如果对方太强，他们就不会敲诈。小偷在入室行窃之前，同样也会对目标进行彻底的调查，这样他们才不会被抓住。没有哪个小偷会傻到闯入有警察把守的房子。不用说，在我们的运动中，也要考虑我们与对手的力量对比。不能在参加运动之后才考虑这个问题，要在开展活动之前——而不是之后——想出对策，这并不是怯懦，恰恰相反，这样做才是正确的。”

柴田用这个事例，来向我们解释：在开展活动时，必须始终考虑

双方的力量对比。

在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四月三十日的众议院选举中，无产政党取得了大跃进：社会大众党有三十七人当选，日本无产党有一人当选¹⁵¹，共有三十八人当选。特别是在东京第五选区参选的加藤勘十获得了五万四千票，这在当时是一个破天荒的数字，创下了最高纪录。

也就是说，在日共和全协遭到彻底镇压、被迫转入地下之后，许多反对战争的劳动人民通过给社会大众党和日本无产党投票，表达了他们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意愿。

¹⁵¹ 1937年3月21日，林銑十郎内阁宣布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在4月30日的大选中，社会大众党有36人当选，成为议会第三大党；日本无产党也有1人当选（加藤勘十）。——中译者注

第七章 工人运动在协助战争中走向失败

径直奔向侵略战争

然而，军部粗暴地践踏了劳动人民的意志，它在七月七日挑起了卢沟桥事变，变本加厉地扩大了侵华战争。而工人运动也随之走上了更加右倾的道路。

社会大众党给自己的定位是无产政党，它本应反对侵略战争，但它却践踏了给它投票的几百万人的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意志。

“支那事变是日本民族的圣战，我们要通过这场圣战，构筑以日满支三国为轴心的远东和平机制，阻止支那的殖民地化和共产主义化，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¹⁵²。”

它就这样提出了积极支持侵略战争的方针。

在社大党的影响下，劳动总同盟也在十月举行的大会上提出了“产业协力”、“国难突破”、“劳动奉公”、“举国一致”等口号，还通过了《皇军士兵感谢决议》，并建议全力配合战争，总同盟书记长西尾末广¹⁵³甚至提议发表“根绝罢工宣言”，并得到了大会的批准。

¹⁵² 《社大党战时运动方针》（社大党戦時下運動方針），1937年。——原注

¹⁵³ 西尾末广（西尾 末広/にしお すえひろ，1891年3月28日——1981年10月3日），生于香川县香川郡，小学退学后便开始四处打工，1915年参加友爱会，1924年12月担任总同盟主事，1926年参与创立社会民众党，并任党中央执行委员，1928年当选众议员，1936年1月担任总同盟副会长，1940年3月被社会大众党开除。战后参与创立日本社会党，1945年11月担任社会党中央

拥护资本主义体制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最后必然会走到这一步。

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拥护战争的表态，鼓舞了以军部为首的统治阶级，它不仅扩大了侵略战争，更在当年十二月十五日以“人民阵线团体”的罪名，一口气逮捕了以日本无产党、全评为中心的四百多人，又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取缔了这两个团体。

取缔它们的理由是：“日本无产党企图变革国体，并按照共产国际的方针，把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作为运动的目标”¹⁵⁴。

于是，在工人运动内部，一切从阶级立场出发、为反对战争而斗争的势力都被消灭了。人民别无选择，只好被迫参加侵略战争。

这种趋势，让我们这些参加出版工俱乐部活动的人倍感压抑和黑暗。

战争气氛急剧加强，越来越多的青年被拉去参军。

在那个时候，街上到处都能看见人们高唱“一定要胜利归来”¹⁵⁵送别士兵的景象。士兵的家人迫切地希望他们能平安归来，怀着抓住救命稻草的心情，请求过路人在千人针上缝上一针¹⁵⁶。

执行委员，1946年9月—1948年1月担任社会党书记长，1947年6月1日—1948年3月10日担任内阁官房长官，1948年3月10日—1948年7月6日担任国务大臣，1952年日本社会党分裂后，参加右派社会党，1955年社会党重新统一未担任党内职务，1959年12月退出社会党，1960年1月24日参与创立民主社会党，出任民主社会党委员长。1967年辞去社会党委员长的职务，1972年退出政界。——中译者注

¹⁵⁴ 《近代日本工人运动史》（近代日本労働者運動史），第170页。——原注

¹⁵⁵ “一定要胜利归来”（勝ってくるぞ）是《露营之歌》的第一句歌词。——中译者注

¹⁵⁶ 千人针（千人針/せんになびり）是二战期间流行的一种风俗，据说请一千个女人在一块布上用红线各缝一个结，再把这块布寄给前线士兵，就能保佑士兵平安归来。——中译者注

一些军歌，比如《露营之歌》和《讨匪行》¹⁵⁷，它们的曲调仿佛在诉说前线士兵的痛苦，于是它们也流行了起来。

随着战争的激化，军费开支也在节节上升。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昭和十二、十三年），军费高达七十三亿八千万元¹⁵⁸。换算成现在的货币的话，那将是一个无法想象的数字。政府为了压榨国民，采用了种种办法：增加税收、发行国债、奖励储蓄、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如果不这么做，政府就无法提供巨大的军费开支。他们变本加厉地剥削人民，工人阶级首当其冲。

努力培养活动家

在战争中，为了战争目的，必须动员每一个人、每一点物资。一九三八年（昭和十三年）三月，《国家总动员法》发布了，这部法律不仅要让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完全服从于战争动员的需要，而且还要禁止一切劳动争议、言论、集会，等等¹⁵⁹。

电力完全被国家管理，棉制品的制造受到了限制，一切商品都要在政府管制下生产。

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就连我们印刷业都很难弄到材料，在印刷所需的油墨材料当中，以炭黑为首，钢、铅、锌、硝酸银、冰醋酸、氢氧化钠、氰化钾、酒精等等都成了军需品，必须优先用于军事用途，

¹⁵⁷ 《露营之歌》（露营の歌）创作于1937年，词作者为藪内喜一郎，曲作者为古関裕而；《讨匪行》（討匪行）创作于1932年，词作者为八木沼丈夫，曲作者为藤原義江。——中译者注

¹⁵⁸ 大约相当于现在的4600亿澳元。——英译者注
英译者数错了数位，把原文看成了“七百三十八亿元”，所以计算出了错。换算成现在的澳元的话，大概相当于460亿澳元。——中译者注

¹⁵⁹ 《国家总动员法》（国家総動員法/こっかそうどういんほう）于1938年3月24日被国会通过，4月1日公布，5月5日起施行。——中译者注

这对印刷业打击很大。

问题不只是缺乏原材料。压抑的气氛逐步抑制了我们的活动，我们几乎被窒息了。

为了进行战争，特高警察四处搜捕和镇压反战分子。

下面列举一些刊登在当时的主流报纸上的、具有代表性的镇压事件：

一九三八年二月 工农派团体三十八人被捕。

一九三八年九月 日本共产主义者团的春日庄次郎¹⁶⁰等五十九人被捕。

一九三八年九月 京滨团体¹⁶¹被破坏。

一九三八年十月 东京大学教授河合荣治郎¹⁶²的著作被查禁。

¹⁶⁰ 春日庄次郎(春日 庄次郎/かすが しょうじろう, 1903年3月25日——1976年4月9日), 生于大阪, 中学辍学后, 进入博文馆(现为共同印刷)当印刷工, 1923年参与创立关东印刷工会。1924年前往莫斯科留学, 就读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1927年加入日本共产党, 1928年在三·一五大搜捕中被捕, 被判处十年徒刑。服刑期间始终拒绝转向, 1937年1月23日刑满出狱, 同年12月5日, 为了重建被破坏的日本共产党, 而在兵库县尼崎市与残存的一部分日共党员成立了“日本共产主义者团”, 1938年8月至9月, 日本共产主义者团被特高破坏, 春日庄次郎也于9月13日被捕, 被判处无期徒刑, 日本战败后获释, 当选为党中央委员。在1957年7月举行的日本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结构改革·社会主义革命论”, 并当选为中央统制委员会议长, 1961年7月, 在日共八大召开前, 因路线分歧而退党, 1962年5月, 参与创立统一社会主义同盟。——中译者注

¹⁶¹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35年被彻底破坏后, 一部分共产主义者试图重建共产党, 由于他们主要在东京—横滨工业地带的工人当中开展组织和学习, 因此被称为京滨团体(京滨グループ/けいひんグループ)。该团体于1938年10月遭到第一次镇压, 残余人员试图重新开展活动, 于1940年5月遭到第二次镇压, 组织被彻底破坏。——中译者注

¹⁶² 河合荣治郎(河合 荣治郎/かわい えいじろう, 1891年2月13日——1944年2月15日), 生于东京府南足立郡, 1915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院政治系。在学期间开始研究劳动问题。1920年担任东京大学助教, 1922—1925年留学英国, 1926年担任教授。因发表反法西斯言论, 而遭到反动势力的敌视。1938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 与唯物论研究会¹⁶³有关的二十九名共产主义者被捕。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 东洋人造丝公司滋贺工厂宿舍内的一个左翼小组的三十七名成员被捕。

一九三八年的被起诉者当中，有一百〇四人与日本共产党有关，一百〇三人与日本无产党有关，二十八人与新兴宗教青年联盟¹⁶⁴有关¹⁶⁵。

而工会运动继续全面右倾。东京印刷工会被迫解散。然后，在日本工会会议¹⁶⁶的右翼干部的操纵下，东京交通工会、海员工会率先组建了“产业报国会”。

在这种动荡的形势下，出版工俱乐部仍在不声不响地全力扩大会员、培养活动家。

柴田坚信：

“无论时局如何，工厂里都一定会存在着具备领导能力

年，内务省下令查禁他的著作，1939年1月31日被剥夺教职。1944年因心脏病去世。——中译者注

¹⁶³ 1932年10月23日，户坂润（1900—1945）、三枝博音（1892—1963）、冈邦雄（1890—1971）等人成立了学术研究团体“唯物论研究会”，发行机关刊《唯物论研究》，对日本的唯物论研究影响很大。1938年2月自行解散。但在1938年11月29日，唯物论学会的主要会员仍然遭到了逮捕。——中译者注

¹⁶⁴ 即新兴佛教青年同盟（新興仏教青年同盟），其前身为大日本日莲主义青年团，1931年4月5日改为新兴佛教青年同盟，由妹尾义郎（1889—1961）出任委员长，主张用佛教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反战运动，1936年12月遭到当局镇压。——中译者注

¹⁶⁵ 《世界民主革命年表》，田宫滋，1948年，第163页。——原注

¹⁶⁶ 1931年6月25日，全国工会同盟与日本海员工会（日本海員組合）合并为日本劳动俱乐部（日本労働倶楽部），共拥有8个团体、225000名会员。1932年9月25日，日本劳动俱乐部改组为日本工会会议（日本労働組合会議）。1940年7月在军部的压力下解散。——中译者注

的活动家。工人的生活越差，这些活动家就越是要站出来采取正确的行动。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出这些活动家，让他们参加俱乐部的活动，并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得到锻炼。”

我们到处寻找活动家，小宫吉一¹⁶⁷和大桥广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找到的，我们以这两人为中心重建了神田支部。神田支部的办公室暂时设在神田站附近的大桥的公寓。田口俊郎¹⁶⁸也是这样参加俱乐部的。他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我是昭和十二年参加出版工俱乐部的，当时我在芝区的近藤印刷所工作，我从杉浦正男那里听说了出版工俱乐部的事，而且，不管工人怎么努力工作，生活还是一天一天变糟，所以我觉得很不满，很气愤。是杉浦教给我，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谁才是真正的敌人。他建议我读一下《第二贫穷故事》¹⁶⁹和《雇佣劳动与资本》¹⁷⁰。不久后我参加了俱乐部，杉浦带我去锦丝町，到柴田家去，把我介绍给了柴田。那时，他充满激情地说，工人如果不能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就永远不能解放。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我跟杉浦、小宫等人一起参

¹⁶⁷ 战后当过京都产别副议长，现为公司董事。——原注

¹⁶⁸ 曾当选为东京中央区议员，现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顾问。——原注

¹⁶⁹ 《第二贫穷故事》（第二贫乏物語）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经济学著作，于1929年春至1930年夏连载于《改造》杂志。——中译者注

¹⁷⁰ 《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六卷，第473—506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ia-chinese-marx-184904.htm> ——中译者注

加俱乐部活动的事，我在京桥那边活动，为了发展未组织工人参加俱乐部，我跑了好多工厂，叫卖采购部的草鞋。那是非常艰苦的，特别是在下雪的晚上，但我坚信这种活动是非常重要的。我能有这样坚定的信仰，都是因为柴田的教诲。柴田把当时的活动家都请到他家里，热情地向我们解释：是谁、用什么方法在剥削工人，工人要想从这种剥削中获得解放，唯一的办法就是团结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然后他就对我们说，你们要自己承担起这项工作。多亏了柴田的思想启蒙，我们才能夜以继日地开展活动，并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快乐。在当时那种社会形势下，正是有了他的指导，我们这些青年才能怀着如此伟大的希望生活下去。

“每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开展活动，或是读不懂推荐给我们的书的时候，我们就会到柴田家去请教他。我们总是到夜里十一二点以后才去找他，因为时间很晚了，门上了锁，但是，只要听到楼下有声音，他就会马上下楼，面带微笑邀请我们进屋，倾听我们的问题，然后提出恰当的建议。现在想起来，最让我佩服的，是他无论多晚都在读书。我一开始还怀疑他到底什么时候才睡觉。

“无论我们上门拜访的时间有多晚，他都会跟我们讨论，我们无话不谈。

“在这种时候，柴田那双高度近视的眼睛就会闪闪发光，使他看起来就像是热忱的化身。在那段时间里，造访柴田使我们获得了巨大的勇气，回去时就会觉得更有信心了。从那时起，只要见到他，就会让我勇气百倍，见不到他的话，就忍不住想去见他，所以，就算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我也会去找他。

“他还经常叫我给出版工俱乐部的报纸写稿子。不管写的是什么，是运动会还是将棋比赛的报道，他总是让我强调工人团结的必要性。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报道都是很简单的，但在那时候，却费了我好大的力气。写完后他就会表扬我，指出我的报道中哪里体现了阶级觉悟，着重强调这些观点的重要性，鼓励我继续发扬，增进我的理解。

“然后他就会说：‘这本书应该不错’，把书推荐给我看。他也会推荐理论著作，不过他的特点，就是他会推荐很多小说。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是：他不仅向我们推荐严肃的书籍，还有意识地通过小说里的人物来教育我们，这才是他作为一个导师的伟大之处。当时我读了大量的俄国文学作品，从中学到了很多，获得了大量的勇气。”

困难时期的干部

从俱乐部的核心活动家对柴田的印象中可以看出，柴田是个卓越的人。每当我想起柴田，就会想起他以正坐的姿势坐在简陋的书桌旁边，在电灯那昏暗的灯光下专心读书的样子。我找过许多当时的活动家，询问他们对柴田有什么印象，他们印象最深的也是这一幕。

在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的黑暗时代，他坐在书桌旁边，指导着在巅峰时期成员多达一千五百人的出版工俱乐部。每当俱乐部里出现重大问题时，柴田自然就要离开书桌去进行指导。

在和工会时期，柴田每天晚上都要在芝区的樱井、山县的家、深川区的我家、小石川区的向家之间来回辗转，为了建立组织而奔波在第一线，偶尔才在其中一个会员的家中休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和工会改为出版工俱乐部之后，他就不再参加一线工作，而是退到书斋里了。我记得，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是这么说的：

“出版工俱乐部必须成为一个能吸引许多人参加的群众组织。俱乐部要想发展下去，就会越来越需要理论。必须有人去研究理论。从现在起，我要承担这项工作。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经常地参加本部和支部的会议了。白石君和你们大家要代替我，成为运动的中坚。”

这话乍一听好像是自私任性的歪理，但我们没有资格指责他，因为他亲自背负了沉重的责任。他作为排字工，一生都没有离开排字车间，每天早上他都会带着便当盒上班，在车间里加班工作，回家后吃饭，然后上到二楼的房间里，坐在书桌前读书，几乎没有时间享受天伦之乐。

他不再参加一线活动，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

在战时，在《治安维持法》的严厉监管下，出版工俱乐部只能采取彻底的合法主义，逐步发展组织，而柴田曾因参加全协而被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太活跃，就可能引起特高的注意。我猜测，他可能认为，他不上一线，而是通过白石来培养活动家，管理俱乐部，才比较安全、比较稳妥。

但是，坐在书斋里能领导群众运动吗？不管是谁，都难免会产生这样的疑虑吧。哪怕是现在，如果有人叫我这么做的话，我也是做不到的。然而柴田还是做到了这一点，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他彻底地吸收了科学社会主义。就算青年们带着各种各样的难题去请教他，他也能从阶级立场出发，给他们提供正确的指导。第二，他的干部政策和培养人才的方法都很出色。第三，他具有出众的人格。对青年们来说，他是一位富有魅力的人格导师，所以大部分青年都对他心悦诚服。而且，他家里总有一两位核心活动家陪在他身边。有一段时间，陪在他身边的是白石，但白石与渡边圣结婚后，搬到了离柴田

家很近的地方。不久后，田口和小宫就搬进了柴田家。柴田通过白石了解俱乐部的整体情况，通过田口了解深川支部和京桥支部的动向，通过小宫了解神田支部的动向，所以，对整个俱乐部的情形，没有谁比他了解得更清楚。此外，出版工俱乐部的图书部的书库也设在他家里，采购部的物资也堆在他家里。所以，各地区的主要活动家总是到他家去，交换书籍，或是挑选物资。这些青年在取书和取货的同时，还会向他请教。每当我们从后门走上二楼时，不管时间有多晚，都能看见他坐在书桌前专心读书，他一看见我们，就露出和蔼的笑容慰问我们：“你们辛苦了”。然后我们再向他汇报，介绍我们遇到的问题，请他指教，他马上就能给出恰当的指示。通过这种方法，他每一次都能让我们弄清楚以后应该怎么做，让我们都觉得恍然大悟、勇气一下子涌现出来。就像田口说的那样，每次拜访结束时，他都会向我们推荐一些书，这些书唤醒了我们心中的正义感，使我们鼓起了勇气。对于那些觉悟较高的人，他就会推荐那些可以使他们更加了解阶级问题的书籍。柴田是如何指导我们这些会员的，我都看在眼里，从中学到了这样一个道理：所谓指导，不光是站在一线斗争；把握核心问题，激励大家，唤起大家的勇气，系统地开展活动，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八章 放低姿态，进一步走向群众

出版工俱乐部的会员倍增运动

一九三九年（昭和十四年），正当战争进行时，我们在坂村家中举行了新年会。我们通过了这样的方针：为了发展会员（去年有七百人），要开展会员倍增运动，把会员人数增加一倍。但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老干部和新干部之间却发生了矛盾。小宫回忆道：

“他（柴田）的独特之处，就是他决不独断专行。在开展倍增运动之前，他做了这样一些准备工作：尽管高津派已经脱离了俱乐部，但一些从和工会时期就入会的老会员认为，随着俱乐部逐渐大众化，它的阶级觉悟也在逐步流失，他们还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招来的新会员连寻职会和俱乐部之间的区别都说不出来，那么，发展新会员和加强俱乐部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些老会员到处进行争论，让新的活动家们十分困惑。

“新年会的举办地点，特意选在立石的坂村氏家中。在宴会上，年轻的活动家与看上去像是前辈的人坐在一起，听大家讨论关于发展群众组织的原则，以及由辩证地掌握质与量的问题而生的唯物辩证法，再以此为契机学习这些问题。通过这种方法，使大多数人形成了对高津氏等人的明确的批评意见，促使他们理解了倍增运动的意义，加强了他们对这项工作的信心。每当柴田做出重大决定时，他就会通过这种方法，

让活动家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做好准备。”

会员倍增运动是这样来开展的：我们印制了调查表，上面列出了工厂工人可能感兴趣的各种活动项目，然后在各工厂散发。不管是哪一家工厂，只要里面有一个俱乐部会员，我们就可以调查这家工厂的情况。

我们利用这份调查表，在各自的工厂里进行了调查，在大家的帮助下，我们收集了调查结果。这样一来，就能制成一幅完整的“政治地图”，可供组织工作参考。

对收上来的调查结果进行汇总之后，就可一目了然：那家工厂有多少人喜欢看电影，有多少人喜欢俳句，有多少人喜欢登山，有多少人喜欢读书。通过这个调查，我们便掌握了工人在文化方面的要求。为了满足这些要求，必须有人去帮助他们。

掌握了调查结果之后，活动家们便据此组织工人进行交流。比方说，喜欢看电影的几个人，就让他们负责组织观影会，根据兴趣调查的结果，邀请其它工厂的电影爱好者一同观看电影。看完电影后，负责人就组织大家去喝茶，一边喝茶一边讨论：电影哪里拍得好，哪里拍得不好，哪里好看，然后再邀请大家参加下一次观影会。在这样的过程中，大家熟悉了起来，然后负责人就会劝说新人读一下俱乐部的通讯。这里的关键在于，一定要把负责观影的人发展成为新的活动家。

我们还为各工厂的登山爱好者制定了野营和登山的计划。首先，为了预先侦察，我们组织了先遣队。不管是哪个工厂的人，只要喜欢登山，都可以参加先遣队。先遣队回来后，就讨论日期、时间、费用、线路等问题。在讨论的基础上，制定好计划，再把计划印出来，招呼各个工厂里的登山爱好者前来参加。

到了预定登山的日子，那些当过先遣队员的人就很好地完成了照顾大家的任务。由于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活动非常成功。青年工人

都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回去后，同样要举行点评会，讨论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做得不好，相互讨论通过登山加深了印刷工人的感情、大大推进了阶级事业等问题，然后再制定下一个计划。



在向丘游乐园举办郊游（1938年9月）

印刷工人当中历来都有不少俳句爱好者，所以我们就为他们举办了俳句会。我们邀请了几位有名的俳句诗人——他们自己也是印刷工——请他们选定季题¹⁷¹，再在各个工厂里举行征文活动，然后把征集到的作品刊登在自己印的杂志上，再散发到工厂里去，让工人们投票选出最优秀的作品。投票结果刊登在下一期杂志上，同时继续征集新一批作品。仅在杂志上进行这项活动可能会比较枯燥，所以我们还在

¹⁷¹ 按照俳句的习惯，每首俳句都要有一个符合季节的主题，主要是当季的风物、景色、天气等，这个主题就叫“季题”（きだい），又叫“季语”（きご）。——中译者注

爱宕山包下会场，组织了俳句会，吸引了许多人参加。

俳句爱好者大多是年纪较大、资历较老的工人，在各自的工厂里都有较强的影响力，所以，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就能使俱乐部的活动更加顺利。为了出版俳句杂志，我们每个月都一定要到各家工厂走访两三次，为杂志征集作品，或是散发刊登了征集到的作品的杂志。这些联络活动都是由那些喜欢俳句的人来做的，他们不久就意识到，这些活动的真正目的，是把印刷工人组织起来，便怀着这样的自觉而行动起来。此外，我们还努力收集各个工厂的信息，为俱乐部发展会员。我们还购买了大量的衬衫、裤衩、袜子和草鞋之类的商品，以低于市价两三成的价格卖给各个工厂里的工人。当时中小企业内部是没有小卖部的。因此，当活动家们到工厂出售这些货物时，到处都受到了欢迎。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同许多工厂保持了联系。

问题始终在于实践。关键在于把不同工厂的工人联系起来，但各工厂的工人的阶级觉悟水平却并不一致。我们必须争取那些阶级觉悟较高的工人。这项任务是由读书部负责的。起初，我们只有柴田的大量藏书可用，不过，为了建立读书部，我们还向所有工厂的工人募捐书籍，不管什么书都行，哪怕只捐一本也好。我们收到了大量的书籍，又给收集到的书籍编列了书目，然后走访各个工厂，把书目借给喜欢读书的人。接到借书的申请后，就把书借出去，通过这种方法，活动家们频繁走访工厂，同读者聊天，从借出的书的内容来了解他们的思想、他们还想看什么样的书。

为了进一步开展这些活动，在一九三九年秋季，我们在葛饰区的柴又¹⁷²举办了一次大运动会。这次运动会展示了我们的活动取得的成果——运动会非常成功，共有四百五十名会员参加，快乐地度过了一天。

¹⁷² 柴又（しばまた）是东京都葛饰区的一个地名。——中译者注

为了举办这次运动会，我们事先在工厂里开展了周密的准备工作。在各个工厂里，制作了用于蜈蚣竞走¹⁷³的长木屐，还用纸做出了相扑裁判用的褶裙¹⁷⁴和扇子。我认为这是俱乐部活动的最高点。在为写作本书而进行采访时，Y 回忆道：“我和朋友一起参加了。在观看运动会的时候，我还跟朋友说，把这么多人聚集起来会不会有问题？搞不好会遭到镇压吧。”

柴田连这一点也考虑到了：为了掩护，大家高唱爱国军歌，“看啊！东海的天空破晓了！”¹⁷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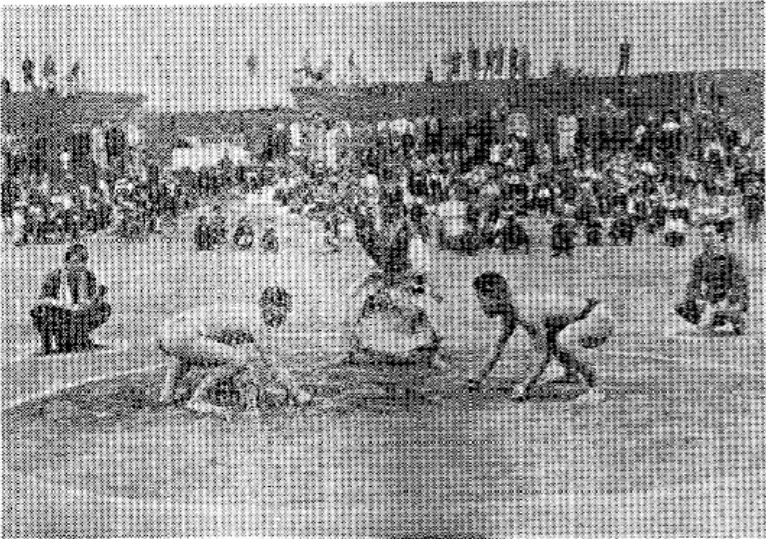


在柴又运动会上使用的出版工俱乐部的旗帜

¹⁷³ 蜈蚣竞走（ムカデ競走/ムカデきょうそう）是一种在日本很常见的集体运动项目：在比赛中，各参赛队伍都要像蜈蚣一样排成一列，所有人都要穿上特制的长木屐，以整齐的步伐行进。——中译者注

¹⁷⁴ 褶裙（袴/はかま）是指日本和服的下衣部分。——中译者注

¹⁷⁵ 这是《爱国进行曲》（爱国行進曲）的第一句歌词。——中译者注



柴又大运动会（相扑裁判的褶裙是用纸做的，1939年4月）

在通过这种方式开展以工厂为基础的活动的同时，为了让工厂里的任何人都愿意接受俱乐部，我们还向工人征集口号。在征集到的口号中，“好人、好技术¹⁷⁶、好俱乐部”（よい人、よい腕、よいクラブ）被选为最能代表俱乐部特色的口号。所有活动家都相信，这个口号无论在哪家工厂里，都很有吸引力，而在严酷的镇压中，它又能迷惑特高警察。柴田还专门强调，活动家必须成为技术能手。“道理说得再好听，如果技术不好，群众就不会跟你走。所以，不光要会讲道理，更要练好手艺，大家才会敬重你。”

上面讲的是俱乐部的公开活动。俱乐部的干部按照各自的水平，划分为几个层次，继续开展学习。前面讲过的那个东大学生 T 氏不时会过来给我们上课。为了在现在或将来背负起出版工俱乐部，干部们学习了讲座派¹⁷⁷出版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分析》、德永直¹⁷⁸与渡边顺

¹⁷⁶ “技术”这个字眼，在原文中使用的是汉字“腕”，本意是“胳膊”，但也可以译为“技术”。在这句口号中，它有两重含义：字面上看，它是指印刷工人的技术；但结合俱乐部的所作所为来看，它又是指发展会员、提高阶级觉悟的政治技术。——英译者注

¹⁷⁷ 从 1933 年到 1937 年，在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当中，围绕着日本资本主义的性质发生了激烈的论战，史称“日本资本主义论战”（日本資本主義論争），参加论战的人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出版《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团体为中心的“讲座派”，认为当时的社会经济体制是半封建的地主制度，应当先进行打倒天皇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派在 1936 年底遭到镇压，其代表人物有野吕荣太郎、山田盛太郎、平野义太郎、服部之总等人；另一派是以《工农》杂志为据点的“工农派”，认为明治维新是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应当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派在 1938 年底遭到镇压，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堺利彦、山川均、江田三郎等人。——中译者注

¹⁷⁸ 德永直（德永直/とくなが すなお、1899 年 1 月 20 日——1958 年 2 月 15 日）生于熊本县鹿托郡（现属熊本市西区），出身贫寒，小学毕业后当过印刷工，1920 年参与创立熊本印刷工会。1922 年进入博文馆印刷所（后改称共同印刷）工作，同时开始创作小说。1926 年参加了著名的共同印刷罢工斗争，斗争失败后被解雇。1929 年以共同印刷罢工斗争为蓝本创作了长篇小说《没有太阳的街》，一跃成为知名的无产阶级作家。三十年代中期，慑于日渐严厉的镇压而转向，

三¹⁷⁹合著的《唯物辩证法》¹⁸⁰，水平较差的干部的就学习《论列宁主义基础》¹⁸¹、《怎么办》¹⁸²等经典著作。妇女部的活动家还学习了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¹⁸³，以及《居里夫人传》¹⁸⁴。

那些时候的书本上都打满了××¹⁸⁵，但是，学习会把被××代替的字都改了回去，还让参加学习会的人在严格的时限内读完书。

当时，科学社会主义著作、马克思和列宁的书仍然可以在书店里买到。我们特别喜欢岩波文库、改造文库出的文库本¹⁸⁶，因为它们

1933年退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战后又逐渐回到无产者文学的立场，1958年因胃癌逝世。——中译者注

¹⁷⁹ 渡边顺三（渡辺 順三/わたなべ じゅんぞう、1894年9月10日——1972年2月26日），生于富山县富山市，祖上是士族，明治维新后没落。1913年开始创作和歌。二十年代成为著名和歌创作者。二十年代末在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下，于1928年参与创立无产者歌人联盟（無産者歌人連盟），提倡创作反映劳苦大众真实情感的短歌。1941年被捕，被判处缓刑。战后继续活跃于民主主义文学运动。——中译者注

¹⁸⁰ 应为《辩证法读本》（弁証法読本），渡辺順三与徳永直合著，ナウカ社，1933年。——中译者注

¹⁸¹ 约·维·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人民出版社，1973年。

全文可在此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russian_communists/stalin/23.pdf——中译者注

¹⁸² 弗·伊·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6卷，第1—183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1901-1902/index.htm>——中译者注

¹⁸³ 全文可在此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beble/1879/index.htm>——中译者注

¹⁸⁴ 此书是居里夫人的小女儿艾娃·德尼丝·居里·拉布伊斯（Ève Denise Curie Labouisse，1904—2007）为母亲写的传记，1937年发表，1938年即出版了日文版。——中译者注

¹⁸⁵ 按照当时的法律，书籍在出版之前都要接受内务省警保局图书科的审查，过不了审查的，不予出版。因此，出版商为了通过审查，就用××来代替“敏感”词句。——中译者注

¹⁸⁶ 文库本（文庫本/ぶんこぼん）是日本的一种图书出版形式，它是一种预计有

价格比较便宜，开本也小，可以放进口袋里。我们可以带着它们到处走，而又不会引起注意，这让我们感到很高兴。这些书仍可在书店里出售，所以，按理来说，购买和阅读这些书应该不成问题。然而，成立读书会，学习这些书籍，那又另当别论了。那是一个特高警察可以随意闯入民宅抓人、进行背景调查、在调查中严刑拷打、炮制治安维持法案件的时代。学习会通常很晚才结束，所以我们在回家路上必须特别小心。因此，我们就把比较厚的书留在柴田家，把文库本带回家里继续看。我们把书藏在兜裆裤里面，这样虽然有点脏，但警察在搜身时就搜不出来了。当时主要街道上都有岗亭，二十四小时都有警察执勤，根据《治安维持法》，就连级别最低的巡警，都有权扣下路人，命令路人脱下衣服接受检查和搜身，还可以不经申请逮捕令就抓人。

在走路回家时，第一，一定要避开这些岗亭。第二，如果在路上碰见巡警，就必须事先想好理由，解释自己为什么这么晚还在街上逛。比方说，当巡警问“喂，你去哪里？”的时候，我们一般就说“接到通知说姨妈快不行了，赶去见她最后一面”，或者说“刚参加完亲戚的葬礼回来”。在讲到要去哪里或是从哪里回来时，一定不能支支吾吾，必须说得流利才行。

但是，由于我们每天至少都要上十三个钟头的班，还要参加俱乐部的大量活动，所以，持续参加学习会，是一件非常艰辛的任务。

大多数活动家只有小学学历，顶多只有高小学历，所以知识水平很差，而且当时的书也跟现在的书不一样，现在的书都是由从事社会科学教育的讲师编写的，为了方便工人理解，他们把书都写得很通俗易懂，可是当时的书却很难读懂。因此，学习的进展比较慢。每当柴田跟活动家谈话时，他总是反复强调“读书，读书”。他说过，“上床

大量读者的小型平装丛书，一般为 A6 开本，价格也比市面上同样大小的书籍要便宜。日本最早的文库本丛书就是 1927 年 7 月 10 日创刊的岩波文库。改造文库是改造社发行的文库本丛书，1929 年创刊，1944 年停刊。——中译者注

后，要读五到十分钟，读书时睡着也无所谓。只要坚持这样做，就能养成读书的习惯，养成习惯后，就会觉得不读点书就受不了。”他经常这样说。

只要是能启发青年、提高阶级觉悟的书，柴田都会读，读完之后，他就会推荐给别人，他会怀着极大的热情，把书的内容介绍给青年。听了柴田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这本书非读不可。

在我印象里，学习会用过的教材包括河上肇¹⁸⁷的《第二贫穷故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工资、价格和利润》¹⁸⁸、《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¹⁸⁹、《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¹⁹⁰、《进一步，退两步》¹⁹¹，还有皮

¹⁸⁷ 河上肇（河上 肇/かわかみ はじめ，1879年10月20日——1946年1月30日），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生于山口县玖珂郡，1898年考入东京大学，1902年毕业后，曾在东京大学、读卖新闻社、京都大学等地任职。1913年留学欧洲，1914年获法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后获教授职称。1920年9月出任京都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二十年代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1928年辞去教职，并参加了工农党（労働農民党），1930年脱离工农党，开始把《资本论》译为日文。1932年参加日共，1933年8月1日被捕，在狱中脱党，1937年出狱，1946年因病去世。——中译者注

¹⁸⁸ 卡·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6卷，第111—169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16/021.htm> ——中译者注

¹⁸⁹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9卷，第201—247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1880/index.htm> ——中译者注

¹⁹⁰ 弗·伊·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1—95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9/001.htm> ——中译者注

¹⁹¹ 弗·伊·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8卷，第197—425页。

亚特尼茨基¹⁹²的《组织者》¹⁹³。

但是，与理论著作相比，真正启发了我们这些青年的，还是小说，包括高尔基的《我的大学》，伊利夫¹⁹⁴与彼得罗夫¹⁹⁵的《金牛犊》¹⁹⁶，

全文可在此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8/028.htm>——中译者注

¹⁹² 奥西普·阿伦诺维奇·皮亚特尼茨基（Осип Аронович Пятницкий，1882年1月29日——1938年7月29日），本名约瑟夫·奥伦诺维奇·塔尔西斯（Иосиф Орионович Таршис），生于沙皇俄国科夫诺省（今立陶宛）维尔克米尔一个犹太木匠家庭。曾当过裁缝学徒，后子承父业，当了木匠，参加了地下工会运动。1899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被捕，后逃脱，流亡德国。1903年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在二大上支持列宁。1905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三大，同年返回俄国，在敖德萨积极参加革命。1906年1月再次被捕，半年后获释。1908年再次流亡国外。1913年回国从事工会运动，1914年6月第三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到莫斯科，入选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委员会。十月革命后，1919—1920年担任铁路工会主席，1920年在俄共（布）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21年担任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部长，1922—1934年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1937年10月被捕，1938年7月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¹⁹³ 应为《组织论》（組織論），无产阶级书房（プロレタリア書房），1931年。这本书是根据德文版《组织问题》（Organisatorische Fragen）翻译的，收录了皮亚特尼茨基在1924年5月至1925年5月之间发表在《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和《国际新闻通讯》（Inprecor）上的几篇论文。——中译者注

¹⁹⁴ 伊利亚·阿诺尔多维奇·伊利夫（Илья Арнольдович Ильф，1897年10月15日——1937年4月13日），本名叶希耶尔—雷布·阿里耶维奇·法因季利贝格（Иехиел-Лейб Арьеви́ч Файнзи́льберг），苏联作家，生于敖德萨一个银行职员家庭，十月革命后开始当记者，从二十年代中期开始，与叶夫盖尼·彼得罗夫合著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小说，1937年因肺结核去世。——中译者注

¹⁹⁵ 叶夫盖尼·彼得罗维奇·彼得罗夫（Евгений Петрович Петров，1902年12月13日——1942年7月2日），本名叶夫盖尼·彼得罗维奇·卡塔耶夫（Евгений Петрович Катаев），苏联作家，生于敖德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二十年代中期开始，与伊利亚·伊利夫合著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小说。苏德战争爆发后，他当上了战地记者，前往被围困的塞瓦斯托波尔采访，在返程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中译者注

¹⁹⁶ 伊利夫和彼得罗夫在1928年发表了讽刺小说《十二把椅子》（Двенадцать стульев），大受欢迎，两人再接再厉，于1931年发表了续集《金牛犊》（Золотой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暴风雨中诞生的》¹⁹⁷，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¹⁹⁸与《静静的顿河》，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须井一¹⁹⁹的《绵》、《清水烧风景》与《工人源三》，井伏鱒二²⁰⁰的《多甚古村》，岛木健作²⁰¹的《生活的探求》；俱乐部妇女部读的书还包括高尔基的《母亲》，艾格妮丝·史沫特莱²⁰²的《大地的女儿》，《居里夫人传》（作者不明²⁰³），野

телёнок），这两本书是两人的代表作。——中译者注

¹⁹⁷ 《暴风雨中诞生的》（Рождённые бурей）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它描写了十月革命期间乌克兰的形势复杂而又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但由于作者突然去世，这部小说未能完成。——中译者注

¹⁹⁸ 《被开垦的处女地》（Поднятая целина）是苏联作家米·亚·肖洛霍夫（М. А. Шолохов，1905—1984）创作的长篇小说，描写了一个村庄在1930年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的变迁。这部小说的第一部于1932年出版，第二部于1959年出版，1960年荣获列宁奖金。——中译者注

¹⁹⁹ 须井一（須井 一/すい はじめ）是谷口善太郎的笔名。谷口善太郎（谷口 善太郎/たにぐち ぜんたろう，1899年10月15日——1974年6月8日），生于石川县能美郡，高小毕业后开始参加文学创作活动，后来前往京都，参加工人运动，在1928年“三·一五”事件中被捕，后获释。从1931年起，发表了《绵》、《清水烧风景》（清水焼風景）、《工人源三》（労働者源三）等作品，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之一。战后积极参加日本共产党的政治活动，多次当选国会众议员。——中译者注

²⁰⁰ 井伏鱒二（井伏 鱒二/いぶせ ますじ，1898年2月15日——1993年7月10日），日本小说家，本名井伏满寿二（井伏 満壽二/いぶし ますじ），生于广岛县安那郡，中学时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后考入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法文系，但在1922年退学。《多甚古村》发表于1939年。——中译者注

²⁰¹ 岛木健作（島木 健作/しまき けんさく，1903年9月7日——1945年8月17日），本名朝仓菊雄（朝倉 菊雄/あさくら きくお），生于北海道札幌市，1925年考入东北大学法学部，1926年退学后，开始参加农民运动，并参加了日本共产党，在1928年“三·一五”事件中被捕，1929年发表转向声明，1930年被判刑，因肺结核而于1932年2月假释。获释后，发表了一系列文学作品，成为“转向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1945年因肺结核去世。《生活的探求》（生活の探求）是他于193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中译者注

²⁰²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年2月23日——1950年5月6日），美国进步作家、记者。——中译者注

泽富美子²⁰⁴的《烧砖女工》和吉野源三郎²⁰⁵的《你们是怎样生活的？》等等。

为了拓宽视野，除了小说之外，我们还读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八路军从军记》²⁰⁶和羽仁五郎²⁰⁷的《米开朗基罗》等著作。对当时的我们来说，这些书都很难读，但是，读了《我的大学》之后，了解了跟我们一样出身悲惨的彼什科夫把社会当作“大学”、进行自我教育的过程后，我们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更加确信了；读了《钢铁是

²⁰³ 应为居里夫人的小女儿艾娃·德尼丝·居里·拉布伊斯（Ève Denise Curie Labouisse, 1904—2007）。——中译者注

²⁰⁴ 野泽富美子（野澤 富美子/のざわ ふみこ、1921年2月13日—2017年10月13日），生于神奈川県横浜市，小学毕业后当过女工，1940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战后加入日本共产党。《烧砖女工》（煉瓦女工）是她于1940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同年即被改编为电影，但未能通过审查，1946年才能上映。——中译者注

²⁰⁵ 吉野源三郎（吉野 源三郎/よしの げんざぶろう，1899年4月9日—1981年5月23日），生于东京，1922年考入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后转入文学部哲学系。1925年大学毕业后参军，1927年退役，在东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因参加社会主义运动，而于1931年被捕。1935年担任“日本少年国民文库”主编，1937年担任明治大学讲师。1939年升任教授。战后创办《世界》杂志，积极参加和平运动。《你们是怎样生活的？》（君たちはどう生きるか）是他在1937年发表的小说。——中译者注

²⁰⁶ 即《中国在反击：一位美国妇女的八路军从军记》（China Fights Back: An American Woman With the Eighth Route Army），1938年出版。国内一般译为《中国在反击》。——中译者注

²⁰⁷ 羽仁五郎（羽仁 五郎/はに ごろう，1901年3月29日—1983年6月8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本名森五郎（森 五郎/もり ごろう），生于群馬县桐生市一个富有的商人家庭。1921年考入东京大学法学部，数月后休学，前往德国海德堡大学留学，1924年回国后入读东京大学文学部史学系。1927年毕业后，在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工作。1928年3月辞职，同年10月创立杂志《在新兴科学的旗帜下》（新興科学の旗のもとに）。1932年参与编纂《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1933年9月被捕，被迫辞去日本大学教授教职。1945年3月再次被捕，10月4日获释。《米开朗基罗》（ミケルアンジェロ）是他于1939年发表的米开朗基罗传记。——中译者注

怎样炼成的》之后，我们被柯察金的革命热情深深打动了，发誓要向他学习。读完柴田推荐的书后，他就会问我们有什么感想，觉得哪些地方打动了自己；听了我们的回答后，他就会说，“我懂了，很好，”然后再推荐另一本书。通过这种方法，我们的阶级觉悟逐渐觉醒了。整个俱乐部都仿效了他的指导方法。神田支部的谷口荣次郎²⁰⁸说：

“白石每周会来三次左右。他一来，大家就会围着他，听他朗读岛木健作的《生活的探求》或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他还说‘躺着听也行’。”

我读书时，如果受了感动，就会把这本书推荐给别人。河崎正一²⁰⁹说过：“杉浦让我读的书有：吉野源三郎的《你们是怎样生活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开垦的处女地》、《静静的顿河》等。”

“海之家”的活动

一九三九年（昭和十四年）夏天，俱乐部为了开展活动，在江之岛²¹⁰的海边租下了一间“海之家”²¹¹，租期为两个月，从七月开始。两个月的租金一共是七十元，每到星期天，就有许多工人离开职场，来到这里住宿和游玩。我们的目的，就是趁机把未组织工人给组织起来。我们从俱乐部会员的家里借来了被褥。白石把家搬了过来，负责

²⁰⁸ 战后当过港区民主商工会理事。——原注

²⁰⁹ 前日本印刷出版工会中央支部委员。——原注

²¹⁰ 江之岛（江の島/えのしま）是神奈川县藤泽市的一个陆连岛，现在是湘南地区的中心，也是神奈川县著名景点。——中译者注

²¹¹ “海之家”（海の家）一般是指建在海水浴场沿岸，提供住宿、冷饮、洗浴、小吃等服务的设施，基本上只在海水浴的旺季才开业。——中译者注

打理海之家。我们还在海之家进行干部教育。在俱乐部本部设立了“管理委员”，接受来自各个工厂的申请，决定使用海之家的顺序。如果接到了重要工厂的工人的申请，我们就会尽量让他们优先使用，甚至不惜拒绝其它申请。在申请去海之家玩的人当中，如果物色到了有前途的人，就在晚上邀请他们到海边去，谈论各种话题。在星期天和假日以外的普通日子，就把俱乐部会员的小孩叫过来，让他们玩上差不多一星期。这些活动效果很好，所以第二年（一九四〇年）又搞了一次。管理海之家的是白石的妻子阿圣，在回忆当时的事情时，她是这么说的：

“昭和十四年夏天，我们家从新婚后住的房子里搬到了江之岛的海之家。柴田先生对我说：‘你结婚后身子就不太好，去了江之岛的话，身子应该会好一点的，你就去那里吧，悠着点就行。’话是这么说，可是在那边根本没时间休息。那两个多月里，白石要坐火车到位于芝区的钻石印刷公司上班，到了周六和周日，就会有来自各个工厂的大批工人过来，我得跑来跑去，帮他们做饭、泡茶。”

当时在钻石印刷公司上班的加藤政吉²¹²在谈到海之家时，是这么说的：

“当时印刷工人没有娱乐设施，所以海之家大受欢迎，每到周六和周日，都会有来自各个支部的许多工人前来。活动家们为了给前来玩耍的工人服务，忙着做咖喱饭和猪肉汤，根本没时间下海游泳。”

²¹² 战后参加了晓印刷公司的建设，现在参与机关报的印刷工作。——原注



出版工俱乐部的海之家（1939年7月—8月）

原全协会员、当时正在缓刑期间的中岛良助的感想是：

“有一次，我在俱乐部办公室里，看到了柴田氏是怎么对待年轻人的，这让我非常佩服。那次好像是京桥支部和神田支部的代表为了哪个支部能在星期使用海之家而争了起来。从一开始，柴田氏只需要说一句话，就能做出结论，立即让争论停下来。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耐心地让双方说出自己的意见、让双方讨论。双方争着争着就有些激动了。然后他就劝了一两句：海之家不是单纯的娱乐场所，而是全体印刷工人的重要的休养设施。于是双方都冷静下来了。经

过长时间的讨论后，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样的事情很常见。我以前在参加安布论战（安那其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布尔什维克〕的论战）时，为了排除无政府主义者，总是急急忙忙地得出结论，但是，还是应该让大家自己决定才对。我住在海之家的时候，那里也对工人进行教育。记得有个同盟社²¹³的记者讲了国际形势。他讲了西班牙、法国、德国、巴尔干和北欧三国的地理，还讲了日本和美国的地位，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力量对比，还对欧洲各国工人运动与日本工人运动的差异做了专门的说明。有人就问，为什么日本会是这个样子呢？记者自然就解释说，日本的天皇制是如何跟资产阶级与地主勾结、如何剥削日本人民的，这时候柴田氏就劝记者不要讲了，‘剩下的还是改天再讲吧。’我们并不能确定来海之家的都是什么人²¹⁴。在那种情况下，他仍然不急于鼓动、而是把踏实地培养年轻人当作当前要务，从这一点来看，他的活动是有意识有计划地推进的，而不是要进行自发的联谊。我当时因为参加全协的活动被判了缓刑，但是，俱乐部关于运动的想法，却与我不谋而合，这让我非常感动。”

两个月后，海之家关掉了，白石夫妇在神田三崎町租了一家咖啡店，叫做“天鹅”，那里就成了神田支部的据点。

²¹³ 同盟通信社（どうめいつうしんしゃ）是日本的国家通讯社，成立于1936年1月1日，日本投降后，于1945年9月14日被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下令解散。
——中译者注

²¹⁴ 意思是说，谁也不敢确定，在这些人当中没有特务混入。——中译者注

以工厂为中心的活动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就在我们开展活动的时候，形势变得越来越黑暗了。

对工人的管制越来越严厉。一九三九年（昭和十四年）出台了一系列法令：要求国民申报自己的职业技能的法令、限制工资和劳动时间的法令——话是这么说，可是劳动时间并没有缩短，反而加长了——还有限制雇用员工的法令，竭力确保劳动力的稳定。尽管发布了这些法令，可是劳动力还是不够用，于是又发布了国民征用令，规定军需工厂可以随时征用工人。

翻开主流报纸，尽是各种组织——读书会、联谊会、同人杂志、生活学校、日文拉丁化运动、世界语运动、学生运动、消费合作社运动等等——遭到镇压的报道。在报道里，这些组织的活动，都被说成是跟共产国际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有联系的赤化运动。在此之前，遭到镇压的都只是上级团体，但现在劳动群众的活动也要遭到镇压了。

尽管形势越来越恶劣，但俱乐部继续以工厂为中心，开展以文化要求为主的活动，培养新的活动家。

那时候登场的一位新活动家佐藤次雄²¹⁵对当时的印象是：

“我在征兵体检中原先被列入乙种第二等²¹⁶，但是马上又被编入乙种第一等，当年（昭和十三年）十一月被征召入

²¹⁵ 原世界工会联合会日本出版协会事务局长、神奈川机关报印刷社长，一九七九年一月病逝。——原注

²¹⁶ 在日军的征兵体检中，身体强壮或健康者被列为甲种，可服现役；身体一般者被列为乙种，也可服现役，但乙种人员又分第一等和第二等，第一等可服现役，第二等一般不用服现役，但需要充当现役人员的替补。丙种为身体缺陷较多者，不适合服现役，只适合国民兵役；丁种为视力、说话能力有严重障碍者与精神状态不健全者，不能服兵役。但随着日军的兵力损失越来越严重，乙种、丙种人员也会被征兵。——中译者注

伍进行训练，次年退伍，但是没过多久又被重新征召，部署在中国山东省。然而好像是由于不需要替补人员，不到半年我又退伍回家了。我先在中屋三间印刷干，但我嫌那里工钱太少，很快就跳槽去了神田的三秀舍²¹⁷。但三秀舍那里有许多由养成工²¹⁸转来的拣字工，总是催我干活，可是工钱也不多，所以我就不上班了，到巢鸭²¹⁹的康文社和小石川的常盘印刷等公司去碰碰运气，结果都不怎么样，不管哪里都是一个样。

“一想到我们生活中的现实，我就很窝火，有一天午休，我正在沉思的时候，杉浦正男先生拍了拍我的肩膀。虽然我跟他在同一个拣字车间工作，但他排九点²²⁰，我排八点，不在一个地方干活，所以没跟他说过话。但我知道他是出版工俱乐部的干部，经常看见他跟工头顶嘴，那个工头总是坐在宽大的拣字车间正中央的一张桌子前，气势汹汹地冲我们大吼大叫，但杉浦却面无愧色地向他提出抗议或申诉，我从装活字的箱子后面看见他这样做的时候，都觉得既害怕，又很佩服他。

“我就断断续续地把自己的想法都给讲了出来。我现在不记得杉浦当时说了什么，但他的结论是劝我打起精神，给俱乐部帮点忙。跟杉浦同样排九点字体的铃木幸一²²¹君也过来给我打气鼓劲。

²¹⁷ 三秀舍（三秀舎/さんしゅうしゃ）是一家老字号印刷公司，创立于1900年。
——中译者注

²¹⁸ 养成工是指为了锻炼技能，而在作业现场接受训练的工人。——中译者注

²¹⁹ 巢鸭（巢鴨/すがも）是东京丰岛区的一个町。——中译者注

²²⁰ “点”（ポイント）是日本出版业使用的长度单位，用于表示字型的大小。按照日本的工业标准，1点=0.3514毫米。——中译者注

²²¹ 原大日本印刷工会执行委员。——原注

“当时出版工俱乐部神田支部是按照地域分成东西两片开展组织工作的。东边是以三秀舍为中心的一块地方，位于从国电²²²的神田站到都电的神田桥、小川町再到国电的御茶水站一线的内侧，包括活文社、明治印刷、宫本印刷、秀英社等十三家印刷工厂，这一带的发展会员、联络等工作是由杉浦牵头搞的，铃木幸一君也给他打下手。西边的组织工作的领头人是小宫吉一，他的助手还有大桥宏荣、南云富吉²²³等人。

“联络其它工厂的会员、发放机关报、收集会费、以低于市价的价格批量购买、分发工作用的草鞋和遮阳帽²²⁴等物品，这些工作基本上都是在午休的时候做的，为了最有效地利用午休时间，午饭的便当都是放在装活字的箱子后面，在工作时间偷偷吃掉，午休的钟声一响，就马上跳上公司的自行车，飞驰而去。

“各公司都开始成立产业报国会的时候，三秀舍也经常叫全体员工到印刷工厂集合，听社长岛连太郎的儿子岛诚训话。岛诚这个人以前在上帝大²²⁵的时候，曾经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而被捕，遭受了残酷的拷问后转向了，因为拷问，落下了面部神经痛的后遗症，说话的时候脸部经常抽搐。

“岛诚打算在产业报国会三秀舍分会里成立青年部，为

²²² 国电（国電/こくでん）是指日本国有铁道的列车，也指设在大城市周边的近距离专用铁路线路。——中译者注

²²³ 战后曾代表日本共产党参加区议员选举，现已病逝。——原注

²²⁴ 原文为“光線除け”，但现已无法查明词义，恐怕已经成为死语，因此只能猜测其意为“遮阳帽”。——中译者注

²²⁵ “帝大”是“帝国大学”（帝國大學/ていこくだいがく）的简称，指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后到二战投降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成立的九所国立综合大学：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东北大学、九州大学、北海道大学、京城大学、台北大学、大阪大学和名古屋大学。——中译者注

此向杉浦提出了同俱乐部的年轻人谈一谈的建议，杉浦、铃木、佐藤商量之后，决定由我和铃木幸一带头，去跟岛诚会谈。当天晚上，有大概八个青年拣字工出席了会谈，为首的是来给俱乐部帮忙的野泽惠意²²⁶君。岛诚提起了成立青年部的事，并向大家征求意见。

“这是我们头一次参加会谈之类的玩意，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们啥都说不出来，对方又是社长的少爷，又有学生运动的经验，所以我们谁都不敢开口。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只好鼓起勇气说了几句：‘你们的意见，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但我们还是不愿接受自上而下地强制成立青年部、自己却毫无自主性的做法。如果非要这么说的话，至少请让我们自己来成立。’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岛诚盯着我的脸，说了一句‘让你们自己来？’，露出了嘲笑似的表情，然后就什么都不说了。成立青年部的事儿也就搁下了，不久后岛诚死了，这个主意就再也没人提起了。

“当时神田支部的办公室就设在水道桥站附近的白石光雄的家里。虽然立着‘天鹅咖啡店’的招牌，但我在那里的時候，楼下的椅子什么的都倒过来放着，就好像已经关店一样。晚上加完班以后，或是在不加班的傍晚闲逛的时候，我经常到二楼跟小宫吉一讨论。当时我信神佛——虽然并不虔诚——对于我的唯神论和唯心论，小宫总是耐心地听我讲，再用具体事实来劝说我。但是，没过多久，我们就不再进行这样的讨论了，这并不是因为我发现了自己的错误，而是因为参加俱乐部的活动后，不得不做的事情越来越多，再也没有时间去讨论这些事了，我们讨论的主要话题变成了跟活动

²²⁶ 活跃于机关报印刷所。——原注

有关的各种问题。我第一次见到田口俊郎，也是在咖啡馆的二楼，那时他穿着立领学生服，显得很精悍。白石的妻子阿圣也是在这时候怀上了长男一雄²²⁷君，挺着大肚子。

“杉浦负责芝支部一带的活动，东神田的活动就由铃木幸一和我牵头搞，所以我充满了干劲，每天晚上都要到办公室去，跟小宫、南云、大桥等人的关系也变得密切了。一天晚上，小宫他们说‘找到了一个人才’，不由分说地把那个人拉来了办公室，他就是渡边武²²⁸。他当时在精兴社工作，拣字技术好，又写得一手好俳句。于是我们又多了一位新活动家。”

就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生活进一步恶化了。政府对物资和劳动力实行了国家管制，工人本来已经饱受通货膨胀政策之苦，可是政府又延长了劳动时间，政府还强制执行计件工资制，加大劳动强度。另一方面，由于必须在战线上投入大量兵力，工厂陷入了劳动力不足的情况。雇主把所谓的“战时状况”运用到了极致，在全体产业推行了临时工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被招进来的临时工根本得不到工资保障。

由扩军备战而导致的通货膨胀，致使物价急剧上升，因此，在工人当中，出现了要求加薪的强烈势头，然而政府发布了“限价令”，采取了“限薪”政策，不许物价和工资超过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的水平²²⁹。可是黑市上的物价还是在飞涨，生活物资越来越难获得，只

²²⁷ 日本共产党葛饰地区委员。——原注

²²⁸ 参加过晓印刷的建设，后来当了神奈川机关报印刷厂厂长，现已因病退休。——原注

²²⁹ 1939年10月16日，阿部信行内阁根据《国家总动员法》第19条，发布《公司职员薪资临时措施令》（会社職員給与臨時措置令）、《工资临时措施令》（賃金臨時措置令）、《价格等管制令》（価格等統制令）等多个法令（均于10月20日生效），将物价与工资冻结在9月18日的水平。——中译者注

有工资没有上涨，所以工人的生活就变得越来越艰难了。

随着战争的长期化，工人运动遭到了越来越严重的镇压，但俱乐部仍然继续向工厂发展。会员逐渐增加到了一千五百人。以下就是当时有出版工俱乐部会员存在的工厂的名单。当然，每个工厂里，会员少则两三人，多则十人左右。

神田支部：铁道弘济会、同兴社、冢田印刷、太阳社、文雅堂、一番馆、广业印刷、日英社、加藤文明、川濑印刷、长濑印刷、三秀舍、宫本印刷、三钟印刷、有朋堂、欧姆社（オーム社）、精兴社、大山印刷、胜文社、秀英社、活文社、新闻之新闻社、常盘印刷、松村印刷、桑田印刷、文诚社、明治印刷、堀口印刷。

芝支部：常盘印刷、中屋三间印刷、川口印刷、一色活版、联合社（ユニオン社）、日本时报²³⁰社（ジャパントイムズ社）、安久社、钻石社（ダイヤモンド社）、青野印刷、小野印刷、山县印刷、中村印刷、野村五七堂、和田印刷、金山印刷、近藤印刷、民友社、鷺见文西堂、砚文社、杉田屋、曙新闻（あけぼの新聞）、日进社、月山社、东京制本合资、青山印刷、研文社、厚生社、胜田・森岛两友堂。

京桥支部：大参社、三友社、厚田印刷、滨野印刷、第一印刷、丸之内印刷、円谷印刷、丰文社、尚文社、倭文社、三丰社、邦文社、金凤社、大仓印刷、庄司印刷、典文社、电信堂、石川印刷、国际出版印刷、细川活版、文祥堂、特急社、藤生社、三协印刷、帝国兴信所、福神印刷、信使通信（ヘラルド通信）、安信社、伊坂印刷、不二印刷、京屋印刷、三共印刷、农林印刷、国光印刷、川桥仁川堂、民友社、明文、一九堂、金山一凤社、井坂印刷、文寿堂。

其它：行政学会印刷、陆军小林印刷、康文社、昭文社、今井印刷、文明社、正文社、畠野制版、旭印刷、凸版印刷、中岛印刷、安

²³⁰ 《日本时报》（ジャパントイムズ/The Japan Times）是日本最早、最大的英文报纸，1897年创刊。——中译者注

田印刷。

在各支部所覆盖的地域内，有会员存在的工厂，占工厂总数的百分之六十。

出版工俱乐部是如何在镇压之下发展起来的

出版工俱乐部非常重视同工厂的联系。当俱乐部会员从工厂辞职时，我们会问他，有没有人可以顶替他担任联络人，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拜托他一定要先等联络人找到之后再辞职。尽管如此，还是有人一声不吭就辞了职，结果联络就断了。于是，俱乐部会员在辞职的时候，不管多么费劲，也要先找到继任的联络人。而在没有组织的工厂里，如果我们打听到有谁（可能成为俱乐部会员）的话，不管在那个工厂里有没有认识的人，我们都会找上门去，请对方订阅我们的机关报，或是参加我们的各种集会，以此来建立联系，然后再慢慢地邀请对方加入俱乐部，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开展工作。

在战争期间，只要工人要求加薪或发动罢工，当地的特高就会立即出动，完全接受资本家一方的说法，不由分说地逮捕工人领袖，并调查他们的背景和思想。这就是战时的劳资关系。

在如此严酷的镇压下，为什么出版工俱乐部还能进一步发展呢？对此必须进行深入的研究。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工人很少提出经济性的要求，但这绝不等于他们就没有要求。工人有多种多样的要求：想找到工作；由于工资太低，想获得便宜的货物；想满足文化方面的需求。只要我们能够接受工人的要求，他们就一定会追随我们。因此，不管镇压多么严酷，只要能够诚实地采纳工人的要求，运动就能发展下去，出版工俱乐部的活动证明了这一点。

就从这个观点重新出发，看看出版工俱乐部是如何采纳工人的要求的吧。

走进出版工俱乐部的办公室，第一眼看见的就是一块大黑板，上面写着正在招工的公司的名字。八木宗一老人²³¹坐在那里，谁想找工作，都可以跟他商量。求职者如果没钱坐电车，可以跟俱乐部借钱，如果因为失业吃不起饭，就会有会员带他去附近的食堂，请他吃顿饭，帐先记在那个会员身上，然后再让他去找工作。不过这样也会给会员造成较大的经济负担，所以我们后来就不这么做了。

办公室里有好几副将棋和围棋，会员们随时都可以下一盘。早期我们还办过口琴班。我们向批发商大量购入口琴，再由会员大河原教其他会员吹口琴。

我们每月出版俳句杂志，有时还在爱宕山和神田桥附近的荞麦面店的二楼举办运座。这本俳句杂志从誊写到印刷和装订，都是靠许多活动家齐心协力完成的。



出版工俱乐部的棒球大赛（1939年，月岛运动场）

²³¹ 战后继续参加租地租房者组合（借地借家人组合）与地方民主运动，一九七八年因衰老去世。——原注

我们还成立了一支棒球队，叫“出版工俱乐部”²³²，在月岛²³³填海地打过几场对抗赛，跟凸版印刷、三钟印刷、三秀舍、欧友会等公司的队伍打过比赛，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谊。俱乐部有个会员姓竹入，他家就住在月岛，所以在俱乐部棒球队去月岛打比赛的时候，妇女部的人就会去为棒球队加油，她们还用水桶装满水，带去给棒球队。俱乐部有时还会举行戏剧观赏会。我现在还记得，我们看过本乡座的《在底层》²³⁴、市村座的《东洋车辆工厂》²³⁵、筑地小剧场的《火山灰地》²³⁶等剧目。还有一种活动是到现在也忘不掉的，那就是看电影。我们看过法国电影《自由属于我们》²³⁷和大量的苏联电影，还看过《土》²³⁸、《大地》²³⁹、《是什么把她逼到这个地步？》²⁴⁰、《海援队》²⁴¹等

²³² 原文为片假名“プリンティング・レーバー・クラブ”，是 Printing Labour Club 的音译，这里仍然译为“出版工俱乐部”。——中译者注

²³³ 月岛（月島/つきしま）是东京都中央区的一个地名。——中译者注

²³⁴ 《在底层》（На дне）是高尔基于 1901—1902 年创作的著名戏剧。——中译者注

²³⁵ 《东洋车辆工厂》（東洋車輛工場）是村山知义（村山 知義，1901—1977）创作的剧本，发表于 1931 年。——中译者注

²³⁶ 《火山灰地》是久保荣（久保 栄，1900—1958）于 1938 年创作的戏剧。——中译者注

²³⁷ 《自由属于我们》（À nous la liberté）是由勒内·克莱尔（René Clair，1898—1981）导演的电影，1931 年 12 月 18 日在法国首映，1932 年 5 月在日本上映。——中译者注

²³⁸ 《土》是根据长冢节（長塚 節，1879—1915）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电影，由内田吐梦（内田 吐夢，1898—1970）导演，1939 年 4 月 13 日上映。——中译者注

²³⁹ 此处有误，《大地》（The Good Earth）是美国电影，根据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1892—1973）的同名小说改编，由西德尼·富兰克林（Sydney Franklin，1893—1972）导演，曾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最佳摄影奖，并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最佳影片奖和最佳影片剪辑奖的提名。1937 年 1 月 29 日首映，同年 11 月在日本上映。——中译者注

²⁴⁰ 《是什么把她逼到这个地步？》（何が彼女をさうさせたか）是藤森成吉（藤森 成吉，1892—1977）于 1927 年发表的戏剧，1930 年改编为同名电影，由铃

日本电影。我们还组织过叶山²⁴²海水浴一日游、到向丘游乐园²⁴³观光（有一百五十人参加）、到弁天洞窟²⁴⁴远足等休闲活动。

采购部把外衣、短衬裤、裤衩、工作时穿的草鞋、遮阳帽、安全剃刀、用于拆版的镊子、木炭、障子纸²⁴⁵等东西以原价卖给工人。由于出售这些货物的所得不足以弥补亏空，所以我们还得出售装货的箱子。

图书部把许多工厂的工人寄赠的书编成书库，每月还要购买新出版的书籍，用来充实书库。柴田的妹妹静江²⁴⁶从富山房、东京堂弄来图书目录，参考这些目录，给书库里的书编列了图书目录。但是，被当局查禁的书就不能列入目录。这份目录被传到各个工厂，工人想读哪本书，都可以通过目录预订，这种做法也有助于保持工厂之间的联系。

妇女部也为妇女开展了专门的活动，开办了厨艺班、和服制作班，还在咖啡店里举办读书会。

规模最大的活动，当然是在柴又举行的运动会。参加的人数大约有四百五十人。在组织运动会的过程中，各工厂的队伍进行了拔河等项目的对抗赛。

木重吉（鈴木重吉，1900—1976）导演，1930年2月6日上映。——中译者注

²⁴¹ 《海援队》是由辻吉朗（辻 吉朗，1892—1946）导演的一部电影，以倒幕战争时期的倒幕派组织“海援队”为题材，1939年11月30日上映。——中译者注

²⁴² 叶山（葉山/はやま）是神奈川县三浦半岛西部的一个町，当地有海水浴场。——中译者注

²⁴³ 向丘游乐园（向ヶ丘遊園/むこうがおかゆうえん）是神奈川县川崎市的一处游乐园，1927年建成，2002年停业。——中译者注

²⁴⁴ 弁天洞窟（弁天洞窟/べんてんどうくつ）是东京都稻城市的一个地下陵园，被誉为新东京百大景点之一。由于有塌方的危险，现已关闭。——中译者注

²⁴⁵ 障子（障子/しょうじ）是日式房屋中用来分隔房间的可拉式糊纸木制窗门，障子纸（障子紙/しょうじがみ）就是用来贴在障子上的纸张。——中译者注

²⁴⁶ 现在在民主会计事务所（民主計理事務所）工作。——原注

常务工作人员一个人处理不来的活动，就需要以芝（本部）、神田、京桥、深川各地的办公室为中心的大量活动家的协力。

那时候，在工厂里上班的我，每一天的生活轨迹都是这样的：早上五点半，母亲叫我起床后，洗完脸，狼吞虎咽地吃完早饭，单手提起便当盒，走出家门。走路的话是要迟到的，所以我飞奔到车站，登上电车，赶到公司时差点就要迟到了。我换上工作服，拿出拣字箱，开始干活，在午饭时间前五分钟，躲着工头吃完便当，利用午休的三十分钟，跑到附近的两三个工厂，同工人联络。匆匆忙忙赶回公司后，又一连干到下午五点。在加班前的三十分钟休息时间里，又跑到附近的工厂，然后再赶回来，从下午五点半加班到晚上八点。加完班后，又要赶到俱乐部的办公室去。办公室里聚集了许多青年，印制旅行会、俳句会、读书会的印刷品。大家一起做这些工作，然后帮忙做其它事，或是开会什么的，不知不觉就到了十二点。然后再乘末班电车回家，上床睡觉时已经是一点半了。到了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又被叫醒。这样的日子重复了好几年。但是，像这样生活的不只是我一个人，还有好多年轻人，我们充满热情，甘于承受这样的生活。

我一心扑在运动上，完全顾不上家里的事，然而我的家人却没有怨言，这真是不可思议，不过，柴田经常向活动家们强调说：“我们必须尽孝”、“我们能够像这样开展活动，都是因为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必须恭敬地对待家人”。我想这就是我们没有遭到家人反对的原因吧。

但是，在开展这些活动的过程中，不管是谁，都难免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柴田对这种情况非常关心。他觉得有谁心情消沉的时候，就会请那个人去喝咖啡或看电影。在咖啡店里，一边听着古典音乐，一边解释音乐的含义，同时鼓励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不管什么电影，他都能从中找出经验教训，给予我们强烈的激励。当他发现我们疲惫乏力的时候，就会拿书给我们看。他让我们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等小说，以此来激励我们。多亏了他的关照，

活动家们才能尽快从消沉中走出来，振作起精神，重新投入到活动中去。

关于扩大组织的指导

前面讲过，为了编写本书，我走访了俱乐部的老会员，询问他们：在组织问题上，柴田是如何指导他们的呢？

吉村（原姓樱井）回忆说：

“下班后，绝对不要一个人回家。一定要跟别人一起回去。在工厂里，如果有人诉苦，要注意倾听。可以的话，把那个诉苦的人带到办公室来，让他畅所欲言。还有，在要开展组织工作的工厂里，要对核心人物集中开展工作。中屋三间印刷有个酒井贡²⁴⁷，他是公司里技术最好的技工。公司在制定计件工资率的时候，都是先让他干活，再根据他的效率来决定计件工资率。他的技术很好，所以很受工人信赖。他得盲肠炎的时候，俱乐部的所有人都积极援助他。所以他加入了俱乐部。他加入俱乐部之后，俱乐部会员在中屋三间印刷的影响力也随着扩大了。”

还有，山县曾反对接纳某个吊儿郎当的工人加入俱乐部：“让那种人加入俱乐部，那还得了？”柴田则说：“关键在于，可以通过那个人来招揽新人。”他说服了大家。

在渡边圣建立妇女部的时候，有个女会员，别人都说她品行不良。

²⁴⁷ 战后当过东洋经济新报社工会委员长。——原注
此处与第五章的说法不一致，原因不明。——中译者注

有人建议：“应当把那种女人赶出俱乐部”，柴田就说：“就算对方真是品行不良，也不能把自己降到跟对方同样的水平上。应当努力把品行不良的朋友改造成为好人，哪怕能挽救一个人也好，这是非常重要的。做不到这一点的人，不配当俱乐部会员。”后来，正是通过那个被别人认为“品行不良”的女会员，我们才招募了西田²⁴⁸，而西田后来也成了俱乐部干部。像这样的故事还有不少。

当时，在东京印刷工人当中，自发出现了一些联谊会。比如压榨工人的“寻职会”；在印刷工人当中有较长历史、只吸收西式书籍印刷工人参加的行会组织“欧友会”²⁴⁹；从“寻职会”中分裂出来的“日本印刷技术员协会”、“亲技会”、以横滨为中心的“滨友会”等等。

当时印刷工人当中有很多人失业，为了生存，他们只能以某种方式集结起来，相互帮助。因此产生了许多联谊会。

俱乐部打算把这些联谊会全都统一起来，但不包括“寻职会”在内。由出版工俱乐部来发出统一的呼吁，这是最恰当的做法，因为我们会员人数最多、最活跃，要向其它团体发出呼吁的话，我们的立场是最有利的。从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二月到九月，为了与这些团体统一起来，我们前后一共举办了八次会议。负责同外部团体交涉的白石，在行动中发挥出了非凡的能力。我们在这些团体当中寻找觉悟最高的分子，找出这样的青年之后，就直接跟他们会面，劝他们读书。在这些团体内，围绕以下几点开展讨论：

- 把各团体运营的（印刷工人的）职业介绍所统一起来；
- 建立共同的办公室；

²⁴⁸ 可能是指作者的第一任妻子西田富子。——中译者注

²⁴⁹ “欧友会”的“欧”是指“欧文工”：由于西式书籍的排版方式与日式书籍有较大差异，所以西式书籍的排版工作属于单独工种，这种工种就叫做“欧文工”。——中译者注

- 制定最低工资；
- 共同发行新闻通讯；
- 在各团体之间举行棒球赛。

在这些要求当中，只有举行棒球赛一项得到了落实。不过，通过这些讨论，“印刷技术员协会”、“欧友会”等团体的活动家开始向出版工俱乐部寻求指导。在此期间，我们继续开展统一活动，还跟大日本印刷的“健生会”的干部举行了恳谈会，但结果算不上成功。

第九章 工会运动的覆灭与产业报国会的成立

落入了配合战争的罗网

就在我们继续开展活动的同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在不断加剧。每天收到的报纸上都配着中国地图，每当城市陷落，就会在头版上大肆渲染。大城市陷落的时候，政府就会组织提灯游行，用“胜利了！胜利了！”的消息来激励国民。然而，“大本营”²⁵⁰的声明，只不过是不断地欺骗国民罢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抵抗正在使战争变成持久战。蒋介石撤退到了偏远的重庆。在辽阔的中国，日本只能控制一些战略要地和它们之间的交通线，不得不把大量的兵力和军需物资投入中国。在一部分国民中间，厌战的情绪开始出现。

但是，大部分国民并不知道真相，所以只能沉默地服从政府与军部。

政府制定了“物动计划”²⁵¹（依照《国家总动员法》，将物资和劳动力全部集中于军需产业的计划），打出了“奢侈就是敌人”的口号，下令禁止生产一切非必要产品、非紧急必需产品和奢侈品。由于没有汽油，汽车只能烧木炭和柴火。街上立起了许多标语牌，写着各种各样的口号：“日本人就不该奢侈”、“女人不要烫发”、“把袖子剪

²⁵⁰ 大本营（大本营/だいほんえい）是日军的战时最高统帅部。——中译者注

²⁵¹ 全称“物资动员计划”（物資動員計画/ぶっしどういんけいかく）。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为了确保物资优先分配给军需产业，而对物资进行全面管制，便制定了这个计划。——中译者注

短吧”。妇女只能穿扎腿套裤²⁵²。

像我们这些在民用产业工作的工人，只要接到俗称“蓝纸”的国民征用令，就会被拉到军需工厂工作。政府以“圣战”的名义，强迫劳动人民忍耐这一切。

一九四〇年（昭和十五年）六月，对外侵略达到了新阶段，嘴上标榜反资本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反共产主义，实则翼赞侵略战争的社会大众党自行解散了。政府对它施加压力，说它的党名的阶级意味太强烈，要求它改名，否则就要取缔它；它顶不住压力，就只好解散了。在解散仪式上，他们遥拜皇居、齐唱国歌、祈祷皇军武运长久、为英灵默祷。就连如此积极配合战争的社大党，都不被允许继续存在下去了。当年十月，大政翼赞会成立了。它的核心是政府官僚，在中央和地方设有各级组织，又有民间领袖加以辅助，政府创立它，是为了制造一张罗网，把国民网罗起来，迫使国民支持战争。

民间的自主团体都被强行解散，并入大政翼赞会。大政翼赞会为了强化自身组织，还在街道一级成立了“邻组”²⁵³，作为自己的基层组织。在参加邻组的例会时，跟警察有关系的头头就会耀武扬威地叫大家做这个做那个，什么收集废品啦，节省粮食啦，义务清扫街道之类的，美其名曰“勤劳奉公”，甚至还强迫大家带上水桶、灭火器，去参加防空演习。还强行摊派国防捐款和战时国债，叫你交多少就得交多少。生活变得越来越艰苦了。就连私生活也要遭到邻组组长的监视。在国际上，形势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德军在一九三九年（昭和十四年）九月一日凌晨入侵波兰，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²⁵² 扎腿套裤（もんぺ）是妇女在下田劳动时穿的一种工作服。——中译者注

²⁵³ 从江户时代开始，日本的村落内就存在着五人组、十人组之类的村民互助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随着战局日益紧张，日帝当局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在1940年9月11日发布《邻组强化法》，将原先的居民互助组织改为“邻组”（隣組/となりぐみ），以五户到十户为一组，进行居民动员、防空、思想管制等活动。类似于中国的保甲制。——中译者注

在这种状况下，柴田努力让活动家们理解当前形势。他经常到书店去，虽然在战时很难找到介绍国际形势的书，但是，只要有这种书，他就一定会买下来。他通过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八路军从军记》，了解了中国红军的本质，红军的严明军纪，使他确信红军必将赢得最后的胜利，他经常跟我们谈起八路军。活动家们受主流报纸的报道影响较大，所以他便努力使他们了解中国和德国的真实战况。

到了这个时候，侵华战争已经不仅仅是日本和中国之间的问题，而是变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之间的对决——的一部分，事态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把中国这个烫手山芋抱在怀里的日本就算想要谋求和平，也不得不将问题放到全世界的层面上来解决。

军部不得不进行最后的豪赌。就在前一年，也就是一九三九年（昭和十四年），日军以切断敌军补给线为由，向苏军挑起武装冲突，却遭到了惨败。而这一次，为了确保石油和其它资源，日本又要向包围自己的英国、美国、法国、荷兰开战，给予这些国家猛然一击，以此争取和谈的一线生机，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日本从泥潭中挣脱出来。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国内的镇压体制，更重要的是，为了继续战争，必须极度扩张生产力，所以必须迫使工人阶级配合战争。

产业报国会的组织化

一九三九年（昭和十四年），厚生、内务两省的次官下令，民间企业必须配合政府，把所有人组织进产业报国会。特高警察强行解散了日本的所有工会，炮制了政府的御用组织——产业报国会，让产业报国会吞并了所有工会组织。

当时负责代表俱乐部同警方交涉的山县说：

“自从俱乐部在芝区田村町设立办公室之后，我就负责代表出版工俱乐部同警方交涉。每个月我都要把跟本部和芝支部有关的集会申报表向警视厅和爱宕警署上报一次，集会结束后，还要把议事内容、参加人数等情况写成书面报告上报，而且，俱乐部发行的机关刊物，每个月也要拿给警视厅审阅科检查一次。这项工作很费时费力。因为从事这项工作，我在哪个印刷所都干不长。不是在提交材料的那天上班迟到，就是不得不向公司请假。

“一九四〇年（昭和十五年）初，我接到了爱宕署的特高警察发来的‘请求’：‘产业保国会很快就要成立了。所有的工会都要进行建设性的解散。不如你们也像其它工会一样，解散之后再加入产业报国会吧？’我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柴田，他说：‘尽管对方这么说，但我们也不必马上答应照办，先看一看再说。’于是我就对警方说：‘我们是联谊会，不用加入产报吧？再说，每个会员都已经加入了他们所属的公司的产报了。’以此来拖延时间。警方以官僚的独特作风，以为可以利用高压逼迫我们就范。警方重申：我们必须解散组织、加入产报，一开始还是恳求，最后变成了恐吓：‘再不加入产报，就把干部统统抓起来。’

“到了这个地步，已经不能再糊弄下去了。我就回复说：‘总之，我们得先跟大伙商量一下，到月底再答复，请你们先等等吧。’然后我就回去了。”

那一年，警察是如何执行厚生省和内务省的决定、将日本的工会全部解散的呢？就用内务省当时的资料来说明吧。

昭和十五年 被解散的工会²⁵⁴

(会员一千人以上的工会)

- 二 月 邮电从业员同盟(逓信従業員同盟)
- 三 月 东京市从业员工会(東京市従業員組合)
- 四 月 邮电从业员工会(逓信従業員組合)
- 五 月 东京瓦斯工会(東京瓦斯工組合)和另外一个工会
- 六 月 东电职员同志会(東電職員同志会)和另外四个工会
- 七 月 日本劳动总同盟、日本工会会议、东京交通工会(東京交通労働組合)和另外十二个工会
- 八 月 东京汽车鹤见从业员工会(東京自動車従業員組合)和另外四个工会
- 九 月 日本海员工会(日本海員組合)、日本港湾从业员工会(日本港湾従業員組合)和另外四个工会
- 十 月 日本制陶工会同盟(日本製陶労働組合同盟)和另外一个工会
- 十一月 名古屋市电从业员俱乐部(名古屋市電従業員俱樂部)和另外一个工会

从此以后，直到终战为止，日本的工会在纸面上便不复存在了。

仅存的最大工会——总同盟直到最后仍想保存组织，但是，总同盟的大头目松冈²⁵⁵、西尾被叫去警视厅，在那里有人威胁他们，说如

²⁵⁴ 内务省警保局编，《社会运动的状况》(社会運動の状況)，一九四〇年(昭和十五年)。——原注

²⁵⁵ 松冈驹吉(松岡 駒吉/まつおか こまきち，1888年4月8日——1958年8月14日)，生于鸟取县岩美郡。高等小学毕业后未能升学，到处打工。1906年加入基督教。1910年进入日本制钢所(日本製鋼所)工作。1914年加入友

果不散的话，就没有好下场，于是他们只好忍痛解散了总同盟。

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就连这种鼓吹劳资妥协的右翼工会都不被允许存在了，被迫一一解散了。

对于总同盟的头头来说，这反倒是因祸得福：总同盟解散后，他们没能搭上产业报国会这趟车，所以在战后才能躲过“公职追放”²⁵⁶。

贯彻到底的解散令

总之，在厚生省和内务省的恐吓下，总同盟发表了悲壮的声明，然后就解散了。被粉饰为“建设性的解散”的强制解散命令，就这样得到了贯彻。工会的财产被强行处分，工会存在过的痕迹也都被抹杀了。下面这个例子就很有代表性。

海员工会解散后，兵库县的海员工会会员们聚集起来，在日本海员工会会馆前的空地上，立了一块“日本海员工会纪念碑”，可是兵库县特高警察却来找碴，说这块纪念碑居心不良，想要永久性地宣示工会作为阶级组织的意义，而且从立碑的地点来看，也会促使前工会会员和海上劳动者重新萌生工会意识，因此便强行把纪念碑上的“日本海员工会纪念碑”改成了“日本海员会馆纪念碑”。

爱会。1921年友爱会改组为日本劳动总同盟后，1925年担任总同盟中央委员，1932年担任总同盟会长。1946年8月参与创立日本工会总同盟（日本労働組合総同盟），并担任会长，同年代表日本社会党当选国会众议员，1947年5月21日——1948年12月23日出任众议院议长。1958年因肝病去世。——中译者注

²⁵⁶ 日本投降后，驻日盟军司令部于1946年1月4日发布《关于褫夺不适合从事公务者的公职的文件》（公務従事に適しない者の公職からの除去に関する件），要求将战犯或积极配合军国主义的人从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中驱逐出去，通称“公职追放”（公職追放／こうしょくついほう）。到1948年5月为止，有二十多万人被开除公职。朝鲜战争爆发后，驻日盟军司令部逐步缩小了清洗范围，1952年彻底废除了“公职追放”令。——中译者注

特高还加紧了对解散后的团体的监视，前工会会员的聚会，如果被特高得知的话，马上就会被特高驱散。在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于一九六五年发行的《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的第四十三页上，描写了当时的情况：

“于是，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大日本产业报国会于工会的废墟上成立了。它组织起了五百五十万工人，然而，它根本不像工会，而是被内务省和厚生省操纵的、用于战时动员和压迫的庞大官僚机构。产报驱使工人从事军需生产，对资本家来说，它是能够保证无限制剥削的奴隶劳动组织。这样一来，战争体制就完成了，最后，到了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开始了。”

在接到解散命令之前，柴田就预料到了这件事，他说过：

“日本工人运动的右翼干部协助军部，瓦解了工会组织，把工人出卖给了敌人。许多团体因此被强行解散。俱乐部恐怕也会接到解散命令。在那种情况下，俱乐部由于以前的活动，肯定会被当成‘赤色’组织。无论如何，俱乐部都必须保存自己。为此必须顺应时局，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形式。工人只要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就能提高阶级觉悟。不要拘泥于形式。接下来，我们要么以生活为基础而开展活动，比如改为消费合作社，要么改为印刷业者的技术研究会，这样做的话，无论是谁，都会认为在这种形势下，这样做是必要的。我们必须对此进行认真的研究。”

他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又叫大家读一读关于英国的罗奇代尔合作

社²⁵⁷的书。然后我们立即开展工作，努力把运动转到这个方向上。我们跟当时住在山手那边的贺川丰彦²⁵⁸的消费合作社进行交涉，弄到了木炭的配给证，跟附近的木炭商人一起去栃木县宇都宫的飞机场旁边，买来两货车的木炭，运回东京后，一车分给木炭商人，另一车分给芝、神田、京桥、深川的俱乐部会员。白石、杉浦、田口用排子车和两轮拖车帮助分发木炭。我们还帮会员修理家里的破损的障子，这项工作主要是由芝支部的江口健治郎²⁵⁹，京桥支部的小泉孝一²⁶⁰、原田米三²⁶¹、泷泽保二等会员来做的。

此外，为了争取经营者的支持，我们还打算成立技术研究会，为此我们以“如何提高作为手工业的印刷企业的效率”为卖点，跟神田区的三秀舍高管岛诚、芝区的爱宕印刷高管会面，讨论了排字的设计等问题。如果能够得到这些印刷业经营者的赞同，我们就要努力建设一个合法组织，再把整个俱乐部并入其中。柴田还在新富町²⁶²的餐厅

²⁵⁷ 罗奇代尔公正先锋社（Rochdale Society of Equitable Pioneers）于 1844 年成立于英格兰兰开夏郡罗奇代尔市，它是最早的消费合作社之一，它提出的“罗奇代尔原则”是现代合作社运动的基石。——中译者注

²⁵⁸ 贺川丰彦（贺川 豊彦/かがわ とよひこ，1888 年 7 月 10 日——1960 年 4 月 23 日），生于兵库县神户市，幼年失去父母，15 岁时家庭又因兄长生活放荡而破产。1904 年在上中学期间受洗，加入基督教会。从 1909 年起，开始在贫民区传道和经营慈善事业。1919 年参与创立友爱会关西劳动同盟会（友爱会関西労働同盟会），并出任理事长。1920 年发表自传体小说《越过死线》（死線を越えて），引起轰动，同年创立神户消费合作社（神戸購買組合），还创办了《基督教新闻》（キリスト新聞）。1922 年参与创立日本农民协会（日本農民組合）。1926 年参与创立工农党，并担任执行委员，当年年底工农党分裂时退党。三十年代主要从事宗教活动。二战爆发后参加“国际反战者同盟”（国際戦争反対者同盟），1943 年因遭到宪兵队调查，退出国际反战者同盟。二战后参与创立日本社会党，晚年致力于世界联邦运动。——中译者注

²⁵⁹ 原千代田印刷工会执行委员。——原注

²⁶⁰ 原行政学会印刷执行委员。——原注

²⁶¹ 原土井印刷执行委员长。——原注

²⁶² 新富（新富/しんとみ）是东京都中央区的一个地名，原属京桥区，在三十年

里，跟京桥滨田印刷的滨田仙松²⁶³举行了会谈。当时跟柴田一同出席会议的小宫说，在酒席上跟经营者一起谈话，对清廉正直的柴田而言，应该是一件很难受的事吧。

我们还要继续举行俳句会和旅行会等活动，但并不是作为单纯的娱乐活动、而是作为当时被厚生省当作国策大力鼓吹的“余暇善用”运动的一部分来开展。这样做的话，就能够减小被敌人发现的风险。

小宫在三钟印刷工作，他拿着社长开的介绍信，找到东京市劳动局，请课长写一篇稿子，就说海之家的活动“有益于余暇善用、身心锻炼，适合当前时节”，再登在《俱乐部新闻》上。一般来说，劳动局的人是不太愿意给我们写这种稿子的。所以小宫觉得这事没戏，但柴田说：“你先把文章写好，再请课长署名就行，反正我们要的只是他的官衔。”课长勉强在文章上签了名。另一方面，为了在接到解散命令之后仍能保存力量，柴田还采取了周密的措施，准备把俱乐部拆分为旅行会、俳句会和读书会。

寻找保存俱乐部的方法

在做准备的时候，柴田也考虑了遭到镇压的情况，于是他便同少数领导干部谈话，让他们对镇压做好心理准备。

“我认为，我们不会遭到镇压，但是，思考一下在遭到镇压时该怎么办，肯定是有好处的。这是因为，在遭到逮捕时，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做，就无法同警察斗争。万一被抓走了，绝对不能供出组织的情况。好比说，警察要打你十下，

代，当地曾聚集了多家高档餐厅。——中译者注

²⁶³ 青年印刷经营者联盟的委员长。——原注

你要是为了少挨两下打就招供的话，那大家就都完了。你可能会想：‘这么点小事，说出来又会怎么样？’但是，如果你这样想，那就糟糕了。你们要知道，如果你们招供了，不管说的是多么小的事，都会导致另一个同伴陷入危险。所以千万不能招供。只要心中满怀阶级仇恨，无论什么样的酷刑都能挺过去。在同刑讯斗争时，必须怀着这样的信念：每挺过一次酷刑，能够肩负起下一个时代的人就会一个接一个地出现。”

那年（一九四〇年）八月底的一个星期日，在出版工俱乐部于江之岛设立的海之家里，来了大约三十位活动家。他们是来参加会议的，而这场会议将决定出版工俱乐部的存续。俱乐部存续的基本方针，已经在锦丝町的柴田家中定下来了。干部们前一晚就住了下来，商量好了第二天的对策。我们事先在活动家当中做了动员，谁跟谁一起来都安排好了，所以出席人数是三十人。会场里还有同盟通信社的记者 O 氏。但 O 氏并不是会议的正式参加者，我们开会的时候，他偶然来到这里，就碰巧参加了会议。我们请他介绍国际形势。他讲完后，是留在会场，还是马上回去了，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

最后，柴田提出了事先定好的基本方针：

“我自己根本不想让俱乐部消失。出版工俱乐部要是没了，此前围绕着它团结起来的工人，又该依靠什么活下去呢？产业报国会吗？那是让工人充当战争道具的组织。一看就知道了，那就是个自上而下的组织，根本不允许工人进行横向的联络。就是为了这些工人，也必须保存俱乐部，让俱乐部承担起把各工厂的工人联系起来的任务。我已经下定了决心。今天请大家到这里来，是想听听大家的想法。我知

道大家的想法基本上都没有改变。然而，虽说要保存俱乐部，但俱乐部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活动了。我们要按照警方的要求，在形式上解散俱乐部。但是，俱乐部之前做的各项工作，要分散开来，继续进行下去，这样就能在实质上保存俱乐部。好比说，把现在的旅行部改为旅行会，把俳句部改成俳句会，把读书部改成读书会，让现在的俱乐部会员加入到各个会里去，这样就能保存现有的组织。各个会之间的联络，必须小心地进行，这样做多少会有一些危险，但运动不可能没有危险。大家说，干不干？”

按照前一天晚上的碰头会上的部署，有几个人发言表示赞成他的意见，然后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仔细一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日本在中国战线上陷入了泥潭，为了打破僵局，它要“举国一致”地向美英开战，为此，它把彻底消灭阻碍战争的工会定为国策，而这次会议的决定，便是对这一国策的反抗。深思熟虑的柴田，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一点就冒冒失失地决定保存俱乐部。我们本来打算向全体出席者详细介绍形势，让他们明白，如果他们决定保存俱乐部，可能会招来什么样的后果，使他们加强对抗镇压的觉悟，然后再让他们自主地做出决定。但是，如果这样对他们说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否决保存俱乐部。在这种窘境中，柴田恐怕是非常难熬的。他衷心地希望镇压不会真的发生。后来，他战斗到了最后一刻，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我们遭到了镇压、逮捕和监禁，但我仍然认为，会议做出的不服从政府的解散命令、继续保存俱乐部的决定是正确的。参加江之岛会议的俱乐部会员，包括我在内，战后大多继续活跃于工人运动，或是为了建设民主印刷所，而参加了民商²⁶⁴活动或其

²⁶⁴ 民主商工会（民商）是由日本共产党发起的中小企业主的联合组织，在全国各地共有 615 个民主商工会，它们的全国性组织是全国商工团体联合会（全国

它民主活动，我认为这一事实证明了决定的正确性。

因为这次会议是按照上述方式进行的，所以，在当天的参加者当中，只有少数几个人意识到，俱乐部的存续一旦暴露，就会导致全体出席者被捕。由于俱乐部此前的活动并没有遇到多少麻烦，所以大家也都觉得比较安心。

转入地下活动的出版工俱乐部

出版工俱乐部在本部办公室举行了解散仪式，不过这只是装装样子罢了。爱宕县特高警察也出席了仪式。佐藤次雄讲述了当时的情况：

“在海之家举行的活动家总会结束后，大概是八月中旬吧？在芝区办公室举行了解散仪式。参加解散仪式的干部和活动家，以白石为首，来了很多人。有个没见过的穿西装的男人，他是爱宕县的特高，他叫白石把参加者的名字全都记下来。白石一边看着每个人的脸，一边把名字写下来，然后交给那个男人，仪式就这么简单地结束了。结束后，白石对我说：‘一起回去吧’，然后我们就从新桥出发，去了银座。由于战况吃紧，物资匮乏，商店橱窗里空空如也。白石说，他妻子怀孕了，就买了一些黄油和奶酪给她吃。然后我们去了银座六丁目的‘巴西咖啡’（ブラジルコーヒー），进门后，白石看着我的脸，安慰我说：‘刚才的名单全是我瞎编的，我没写你的名字。’但我没有说什么。因为我发现，面前的白石没有了以往的活力，显得非常沉痛哀伤，我实在不知道

商工団体連合会/ぜんこくしょうこうだんたいれんごうかい), 1951年8月3日成立。——中译者注

该说什么才好。”

从那时起，白石暂时退出了俱乐部的活动，原因不明。但是，见证了俱乐部解散的白石，在战后参加了晓印刷的建设，为晓印刷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前面讲过，在俱乐部被强行解散之前，以总同盟、东交为首的许多工会，就已经自发地、或是在警方的压力下被迫解散了。到了十一月，大日本产业报国会成立了，会长是平生鈇三郎²⁶⁵（国铁会长），理事长是汤泽三千男²⁶⁶（前内务次官），工作人员由特高、官僚、军需工厂的劳动事务负责人，以及三轮寿壮²⁶⁷、菊川忠雄²⁶⁸等前社大党

²⁶⁵ 平生鈇三郎（平生 鈇三郎/ひらお はちさぶろう，1866年7月4日——1945年11月27日），生于美浓国加纳蕃（现为岐阜县岐阜市加纳町），父亲是加纳蕃蕃主的家臣。1881年入读东京外国语学校，1886年入读东京商业学校，1890年以首席毕业于高等商业学校，1893年担任兵库县神戸商业学校校长，1894年进入东京海上保险工作。1924年担任大正海上火灾保险会长、扶桑海上火灾保险会长，1933年任川崎造船所社长。1935年被选为贵族院议员，1936年担任文部大臣，1939年担任日铁矿业会长，1940年担任大日本产业报国会会长、日本制铁社长，1941年担任日铁矿业社长、铁钢管制会会长，1942年任重要产业管制团体协议会会长，1943年任枢密顾问官。1945年去世。——中译者注

²⁶⁶ 汤泽三千男（湯沢 三千男/ゆざわ みちお，1888年5月20日——1963年2月21日），生于栃木县上都贺郡一个神社官司家庭，191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后，进入内务省工作。1929年担任官城县知事，1931年担任广岛县知事，1935年担任兵库县知事。1936年担任内务次官，1940年担任大日本产业报国会理事长，1942年2月7日——1943年4月20日担任内务大臣。战后被公职追放，追放解除后，担任过中央社会保险医疗协议会会长、市町村建设促进中央审议会会长、明治神宫总代等职务。1959年代表自由民主党竞选参议员成功。——中译者注

²⁶⁷ 三轮寿壮（三輪 寿壮/みわ じゅそう，1894年12月15日——1956年11月14日），生于福冈县糟屋郡藤内村（现属古贺市），父亲是村长。1920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后，当了律师，担任过日本劳动总同盟和日本农民协会的法律顾问。1926年担任工农党书记长，同年年底工农党分裂后，担任日本劳农

干部充当。他们有意识地切断了工人之间的横向联系，从此以后，工人就被关进了名为“战时状态”的监狱，被当作奴隶使唤。

战时的镇压越来越严酷。俳句、诗歌、漫画等方面的民主团体、文化团体都遭到了镇压，就连基督教、救世军也得宣布自己的立场是“纯正的日本基督教”，不然也要遭到镇压。一九四〇年（昭和十五年）八月，新协剧团²⁶⁹遭到镇压，村山知义²⁷⁰和另外二十六人被捕，

党书记长。1932年参与创立社会大众党。1937年当选众议员。1940年社会大众党解散后，积极拥护帝国主义战争，担任大政翼赞会联络部长、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厚生部长。战后加入日本社会党，担任第二东京律师会会长（第二东京弁護士会）和日本律师联合会（日本弁護士連合会）副会长。1952—1956年当选众议员。1956年因肺癌去世。——中译者注

²⁶⁸ 菊川忠雄（菊川 忠雄/きくかわ ただお，1901年3月1日——1954年9月26日），生于爱媛县越智郡一个鱼类批发商家庭。1923年考入东京大学经济学部，1926年毕业后进入日本劳动总同盟工作。1936年担任日本劳动同盟本部总干事，1941年担任大日本产业报国会中央本部文化部副部长。战后加入日本社会党，担任日本矿工工会（日本鉱山労働組合）会长，1954年在洞爷丸海难中身亡。——中译者注

²⁶⁹ 日本无产阶级戏剧同盟（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演劇同盟）瓦解后，村山知义于1934年9月鼓吹“新剧团大团结”，成立了新协剧团（新協劇団/しんきょうげきだん）。1940年8月19日，新协剧团遭到镇压，被迫解散，以村山知义为首的26人被捕。战后，村山知义等人于1946年1月19日重建新协剧团，1959年1月15日，新协剧团与中央艺术剧场合并为东京艺术座。——中译者注

²⁷⁰ 村山知义（村山 知義/むらやま ともよし，1901年1月18日——1977年3月22日），小说家、画家、剧作家生于东京市神田区一个海军军医家庭，1921年考入东京大学哲学科，1922年发表童话画集《罗宾汉》，以新锐画家的身份参加先锋艺术运动。1925年12月参与创立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艺連盟），并加入美术部。1926年10月创立左翼剧团“前卫座”。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分裂后，于1928年4月参与创立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全日本無産者芸術連盟）。1929年2月参与创立日本无产阶级剧场同盟（日本プロレタリア劇場同盟）并担任中央执行委员。1930年5月被捕，同年12月获释。1931年5月加入日本共产党，10月参与创立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化連盟）。1932年4月被捕，1933年12月出狱，1934年3月被判处2年徒刑缓刑3年。1934年9月主持创立新协剧团。1940年8月被捕，1942年月获释，1944年被判处2年徒刑缓刑5年。1946年2月重建新协

随后新筑地剧团的八田元夫²⁷¹等十四人也被逮捕，剧团也被迫解散。对劳动人民的管束和严厉镇压，都是为了进一步扩大战争而做的准备。

军部在辽阔的中国，陷入了连战略要地及交通线都无法确保的窘境，它在极度焦躁之中，以切断补给线为由，把战线延伸到了中国背后的印度和缅甸，然后，日本为了打破英国、美国、荷兰的经济封锁，又进一步向法属印度（现为印度支那）、菲律宾、婆罗洲、苏门答腊、新几内亚、澳大利亚进攻，为了做好同美英开战的准备，日本准备进一步压榨国民。

于是，在越来越黑暗的形势中，俱乐部会员在特高眼皮底下埋头工作，努力修复被产业报国会切断的工厂与工厂之间的联系。

我们在芝区成立了“日出旅行会”（日の出旅行会），在京桥、深川成立了“曙旅行会”，在神田成立了“若叶旅行会”；又在神田成立了“青桐吟诗社”（あをぎり吟社），在芝区、深川、京桥成立了“朝雾吟诗社”（あさぎり吟社）。为了把这些团体联系起来，还设立了简易图书馆，它把文库设在柴田家中，然后就开始工作了。

我们仍然像以前一样开展活动，只是俱乐部会员不能像以前那样集合起来、齐心协力地做事了。

活动开展得很顺利。“若叶旅行会”和“曙旅行会”为了筹措旅费，实行了月费制度，两个旅行会共同制定了旅行计划。不过在招收会员时，两个旅行会是分开行动的。

剧团。1960年出任日本演出者协会理事长。1965年参与创立日本民主主义文学同盟，并担任副议长。——中译者注。

²⁷¹ 八田元夫（八田 元夫/はった もとお，1903年11月13日——1976年9月17日），戏剧导演。——中译者注

地下活动

当时日本完全倒向德国，引进了德国候鸟运动²⁷²的休闲活动。纳粹为了吸引青年，打出了“劳动就是欢乐”的口号，利用候鸟协会组织青年过集体生活，组成许多队伍，一边旅行一边进行劳动动员。我们的两个旅行会就伪装成候鸟协会的拥护者，动员许多工厂的青年工人登山。

活动家们为了制定多个登山项目，请喜欢登山的人做了实地调查，然后再经过集体讨论，定下了 ABC 三个登山项目。A 项目是规模较大的登山活动，时间为四天三夜，费用也很贵；B 项目也是登山活动，需时两天一夜，费用比较便宜；C 项目是当天往返的远足活动，很适合大众；各个旅行会都制作了用手工印刷的、篇幅在五到六页的机关报，在上面刊登了地图和路线的说明，发给各个工厂，募集参加者。

奥多摩的御岳、里高尾²⁷³都很适合 C 项目。在集中攀登景信山²⁷⁴的时候，“日出旅行会”从高尾出发，“曙旅行会”从小佛出发，“若叶旅行会”从相模湖一带出发，一齐登山。

各个旅行会的队伍在碰头会上事先估算好几时几分登顶，到了那个时候，大家集合在一起，举行盛大的联欢会，初次见面的人相互交换点心，一起煮味增汤喝，聊聊各自工厂的事，然后又举行合唱，表

²⁷² 候鸟运动 (Wandervogel) 是二十世纪初德国兴起的青少年远足运动，纳粹上台后，候鸟运动被纳入希特勒青年团 (Hitlerjugend)。日本也曾引进该运动。
——中译者注

²⁷³ 奥多摩 (奥多摩 / おくたま) 是东京都最西北端的町，御岳山 (御岳山 / みたけさん，海拔 929 米) 和里高尾 (裏高尾 / うらたかお) 都在奥多摩附近。——中译者注

²⁷⁴ 景信山 (景信山 / かげのぶやま) 位于东京都与神奈川县的边境，海拔 727.1 米。——中译者注

演才艺，玩得很开心。下山时，我们是按照各自的路线走的。有时还会唱起劳动节的歌曲。通过这些活动，旅行会的会员们保持了联络。

我们就是通过这些方法，努力把老会员集结起来、并维持印刷工人的组织的。

佐藤次雄回忆了当时的活动：

“我是‘青桐吟诗社’的负责人，当然，我不只负责俳句活动，还要协助‘旅行会’，还要拿着‘读书会’的书到处跑来跑去。这样做的不光是我一个人，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各个团体的负责人的住址和姓名都是错开的，但在根子上是牢固地连成一体的。

“我们的神田区办公室（也就是根据地）设在牛込区（现在的新宿区）新小川町的南云富吉的家里，小宫和大桥都在南云家租房住。当时能商量的会员有小宫、南云、大桥、谷口、渡边武、佐藤、青野义雪²⁷⁵等六七人。

“组织体制的转换进行得比较顺利，大部分的老会员应该都被吸收过来了。尤其是俳句会进展喜人，发展了不少新人。在开展俳句和其它活动时，我们都必定要把协助者给组织起来。在制作俳句杂志时，我们也是这么做的，每一期杂志的封面，都是由在宫本印刷工作的排字工木下²⁷⁶和在冢田印刷工作的拣字工中村画的；从整理原稿到誊写、印刷、装订、分发，都找了好些人来帮忙，在一同活动的过程中，大家的关系变好了。凡是物色到有前途的人，就在下班时跟他

²⁷⁵ 原日本印刷工业分会青年部长。——原注

²⁷⁶ 曾有作品入选日本美术展览会。——原注

日本美术展览会是日本规模最大的综合美术展览会，自1907年起，每年11月在东京举办，展期约为一个月。——中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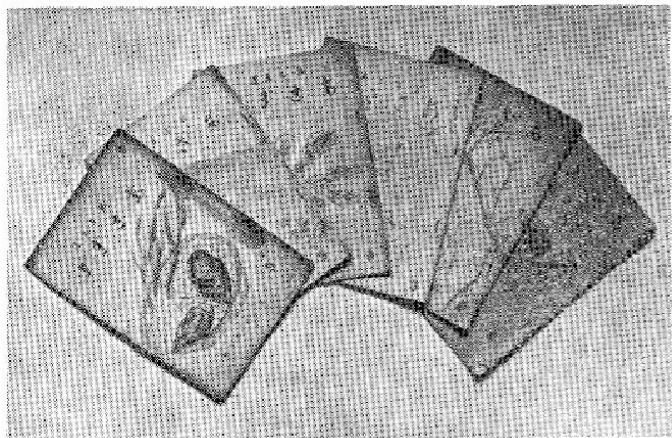
一起回家，请他去喝咖啡，边喝边了解他的生活还有想法，几个人一起有意识地做他的工作，系统地帮助他提高觉悟。为此充分利用了读书会里的范围广泛、数量众多的书籍。经常给《青桐》杂志投稿的有七八十人，它的印量是三百本左右。就算不投稿也没关系，只要是读者，我们也一定会送去杂志，不过，最重要的是，这份杂志是把各工厂的读者和我们连接起来的纽带，是联络工厂的武器。通过读者的推荐，这份杂志获得了新的读者，在尚未建立联系的工厂里也赢得了读者。

“每隔两三个月，我们会举办运座，虽然是在神田桥的荞麦面店的二楼举行的，但搞得也挺盛大的。由于会费便宜，而且大家基本上都能拿着作为奖品的生活必需品回家，所以大家都赞不绝口。大家不是印刷工就是活版工，聚在一块，自然就会谈起工厂的事，对工厂里的工人的生活 and 活动也就更加了解了。俳句写得好的只有渡边武，其他人基本上都是临时充当‘俳句家’，所以写俳句对他们来说恐怕是一件很辛苦的事。虽然买来《岁时记》学习，但还是很难成为俳句家，心里难免会有‘俳句算什么玩意’的想法。”

在京桥、芝区发行的油印的俳句杂志《朝雾》，主要是由杉浦、田口、福田等人负责的。杂志的封面，是先由擅长绘画的河崎画出线稿，再由活动家们上色的，从誊写到印刷，都是由老会员们合力完成的。最近找到了“朝雾吟诗社”发行的六本机关刊物，在战争期间，田口仲子²⁷⁷把它们很好地保存了下来。第三卷第三号是在一九四二年（昭和十七年）三月一日发行的，发行地址为芝区田村町二-一〇岩

²⁷⁷ 战后当过日本共产党东京中央区区议会议员。——原注

田宅，这证明了这份杂志连续出版了三年。在“志友芳名簿”上，记录了十四名同仁、六十九名志友的姓名。



最近发现的当时的俳句杂志



青桐吟诗社的吟诗会（1941年，镰仓）

“朝雾吟诗会”的运座会经常在爱宕山的“藤よし”餐馆举行。“青桐”、“朝雾”两个吟诗会也在柴又、镰仓、池上本门寺联合举办过吟诗会。

参加这两个俳句会的人，分别属于好多个工厂，所以我们也同大工厂建立联络。

躲避警察的耳目

佐藤介绍了出版工俱乐部伪装解散后的活动：

“改成旅行会后，我们经常去爬山。不仅如此，我们自己也已被山的魅力给迷住了，甚至憧憬起了在冬天登山。星期六晚上出发、星期天晚上回来的行程，很适合我们这些年轻人，我们甚至有过一个半月爬山四次的记录。

“但是，我们绝不会一个人去爬山，就算是只有几个人也好，我们也一定要邀请协助活动的人或是觉得有前途的年轻人一起去。

“神田、京桥和芝区的各个旅行会，会联合举行登山活动，攀登人人都能登上的阵场山、小佛岭²⁷⁸，每次的参加者有五十人左右。在登山的准备活动中，会有一些年轻的新人加入进来，在登山过程中，我们就让这些新人照顾参加者、鼓励他们积极行动。我们还搞过一次集体攀登富士山的活动。

²⁷⁸ “阵场山”现名“阵马山”（陣馬山 / じんばさん），位于东京都八王子市与神奈川县相模原市绿区的交界，海拔 854.8 米；小佛岭（小仏峠 / こぼとけとうげ）位于东京都八王子市里高尾町和神奈川县相模原市绿区的交界，海拔 548 米。
——中译者注

“随着活动走上正轨，事情也变得忙起来了，就得转移到比较方便开展活动的工厂去，于是我跳槽去了小川町的秀英社，而铃木君就留在三秀舍。

“每天晚上，我都要经过饭田桥，走去南云家。在我们当中，南云年纪最大，我记得比我大六七岁。他体格比较健壮，每当我露出丧气的神色时，他都会过来找我谈话，帮我恢复自信，给我鼓劲打气。他在狱中由于营养不良得了肺结核，战后代表日本共产党的新小岩支部参加了江户川区议会选举，但是落选了，一九四七年（昭和二十二年）七月七日病逝。

“大概是在初夏的时候，我跟往常一样，到柴田家二楼的书库去取书，拿去给订了书的读书会会员看，拿到书后，在回去的路上，在锦丝町站附近的十字路口的派出所，被巡警拦下来盘问。由于事出突然，我又是第一次被盘问，所以巡警叫我把包袱打开时，我就照做了。包袱里放着石川达三²⁷⁹的《结婚的生态》²⁸⁰，还有《多甚古村》等好几本书，由于书装得太多，包袱鼓鼓囊囊的。

“巡警问我：‘你背这么多书是要干嘛？’我就回答说：

²⁷⁹ 石川达三（石川 達三/いしかわ たつぞう，1905年7月2日——1985年1月31日），生于秋田县平鹿郡横手町一个英语教师家庭。1927年考入早稻田大学文学部英文科，1930年前往巴西，数月后归国，1935年利用在巴西的体验创作的小说《苍氓》（蒼氓）荣获第1届芥川龙之介奖。1938年1月，以中央公论社特派员的身份前往中国，采访了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官兵，创作了报告文学《活着的士兵》（生きてゐる兵隊），发表于《中央公论》1938年3月号，触怒了军方，被判处监禁4个月缓刑3年。战后曾担任日本笔会（日本ペンクラブ）会长、日本艺术院会员、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日本文艺著作权保护同盟会长等职务。——中译者注

²⁸⁰ 《结婚的生态》（結婚の生態）是石川达三的小说，发表于1938年。——中译者注

‘我给读书会的会员送书来着’，巡警露出了不屑一顾的表情，就不管我了。我走上通往锦丝町站台的楼梯时，有个目光锐利的刑警在盯着什么，我这才觉察到可能出了什么事，所以警察才会布置警戒线。

“第二天，我先跟小宫谈过话，又去找柴田，柴田认真听了我的话，然后说：‘你不该提到读书会的。读书会经常是用来掩护政治活动的借口，那个巡警或许没看出来，但如果是特高的话，一听就明白了。’意思大致是这样。

“我吓坏了，他又对我说：‘不用太紧张。不过，以后一定要更加小心才是。’然后我们就谈别的事。打那以后，我就买了帆布鞋，还准备了衣服。”

田口说，在分发读书会的书时，为了避免引起警察注意，他换上了登山时穿的衣服，把书装在登山包里。

在黑暗战争年代，不管政府怎样加强镇压，对战争的不满情绪还是在底层国民当中蔓延开来了。人们在碰面时说出反战言论，或是用“煽动性文章”（不穩文書）来宣泄怒气的事情不断发生。这些文化活动持续到了第二年。



若叶旅行会越过那须白河（1941年1月）

一九四一年（昭和十六年）一月，若叶旅行会从那须高原出发，越过了白河²⁸¹；同年五月，又去了大菩萨岭²⁸²。日出旅行会在同年五月，从三峰出发，攀登云取山²⁸³；同年七月，与另外几个旅行会一同

²⁸¹ 那须高原（那須高原/なすこうげん）是栃木县北部的那须岳南侧的山麓地带的统称，白河关（白河の関/しらかわのせき）是著名的关隘。——中译者注

²⁸² 大菩萨岭（大菩薩峠/だいぼさつとうげ）是位于山梨县甲州市盐山上萩原与北都留郡小菅村鞍部的交界处的山道，海拔 1897 米。——中译者注

²⁸³ 云取山（雲取山/くもとりやま）位于东京都、埼玉县、山梨县的交界处，海拔 2017.13 米。——中译者注

攀登富士山；同年八月，去奥武藏高原²⁸⁴旅游；同年九月，与另外几个旅行会一同去正丸岭²⁸⁵旅游；同年十月，与另外几个旅行会一同前往志贺高原，翻越涉岭²⁸⁶。一九四二年一月，曙旅行会到赤城山²⁸⁷旅游。同年一月，日出旅行会去凤凰山麓²⁸⁸游览；同年二月，若叶旅行会去了升仙峡、增富温泉²⁸⁹等地。通过这些活动，维持了青年工人之间的横向联系。

在物资匮乏、自然也没有多少钱的时代，我们根本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一下子就把登山的装备给搞全。我们先是扎绑腿，然后再慢慢凑齐了帆布登山包、登山镐、踏雪套鞋、防滑钉等装备。田口买了双鲨鱼皮做的靴子。大家揶揄他，“不怕被老鼠咬坏吗？”不过他非常爱惜这双靴子，可是，在游览积雪的凤凰山麓的途中，靴子却破了个意想不到的大洞。为了加强登山安全，田口和中山春太郎²⁹⁰举行了技术讲习会，还买来德国的登山书籍学习。大家还看了《勃朗峰上的暴风雪》²⁹¹等电影，然后就开感想会，相互学习团结的精神以及一个人

²⁸⁴ 奥武藏（奥武蔵/おくむさし）高原是埼玉县西南部的山岳丘陵地带的统称。
——中译者注

²⁸⁵ 正丸岭（正丸峠/しょうまるとうげ）是位于埼玉县饭能市和秩父郡横瀬町交界处的山道，海拔 636 米。——中译者注

²⁸⁶ 涉岭（渋峠/しぶとうげ）是群馬县吾妻郡中之条郡和长野县下高井郡山之内町之间的山道，最高点海拔 2172 米。——中译者注

²⁸⁷ 赤城山（赤城山/あかぎやま）是一座死火山，位于群馬县境内，是日本百大名山之一，海拔 1827.6 米。——中译者注

²⁸⁸ 日本有两处名为“凤凰山”的旅游景点，一处在山梨县，一处 in 秋田县，这里讲的应该是前者，其由地藏岳、观音岳、药师岳三座山峰组成，统称“凤凰三山”。——中译者注

²⁸⁹ 升仙峡（昇仙峡/しょうせんきょう）是位于山梨县甲府盆地北侧的一处溪谷，是日本国内屈指可数的游览胜地，号称“日本五大名峡”之一。增富温泉（增富温泉/ますとみおんせん）位于山梨县与长野县交界处的秩父多摩甲斐国立公园的西侧，是著名的温泉疗养地。——中译者注

²⁹⁰ 战后当过大日本印刷工会书记。——原注

²⁹¹ 《勃朗峰上的暴风雪》（*Stürme über dem Mont Blanc*）是一部德国电影，由阿

要想登顶，离不开许多人的支持等道理。

我们举办这些活动，是想以此来加强工人之间的团结。但是也有适得其反的情况发生。有些青年完全被山的魅力给迷住了，别的什么都不管了。

在严酷镇压下残存的妇女组织

俱乐部的各个部门分开活动之后，只有妇女部仍然保持着以前的组织形式。领导妇女部的小宫和田口起初打算把妇女部解散，并入旅行会。于是他们去找柴田商量，柴田就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是否有必要这么做，应该再仔细考虑一下。现在日本妇女的地位非常低，就算她们活跃起来，也不会被人们注意到，这就是现在的状况。从这一点来考虑的话，还是继续保存妇女部比较好。可以换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名字。你们讲过的‘大和抚子²⁹²’这个词，现在很流行。不如就拿它来当名字吧？内容才是关键。只要内容是属于工人的，那就没问题了。”小宫和田口就把女会员集中起来开会讨论。然后就成立了“抚子和睦会”（撫子和睦会）。

妇女部是以西田富子、水野静江²⁹³、八木絃（八木いと）²⁹⁴等人为核心而组织起来的。她们出了一份油印的通讯，每一期有十二到十六个版面，封面是川崎画的，卷首语是田口写的。以“抚子和睦会”为名的妇女部集结了大约六十名会员，她们在南多摩丘陵和向丘举行

诺尔德·范克（Arnold Fanck，1889—1974）编剧和执导，1930年12月25日首映。——中译者注

²⁹² 在日本的父权制意识形态下，大和抚子（大和撫子/やまとなでしこ）是凝聚了传统女性美德的完美女性的代名词。——中译者注

²⁹³ 与山本广次结了婚，战后参加了晓印刷的建设。——原注

²⁹⁴ 战后当过安信舍工会妇女部长。——原注

远足，还办了厨艺学习会、戏剧研究会，在严酷的镇压下保存了组织。水野静枝²⁹⁵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我到现在还记得，柴田说过：‘人既然来到这个世上，就必须为世界做点什么。不光要让自己过上好生活，还要让大家过上好生活，只有这样，才能说世界变得美好了。’那个时候，生活真的很充实。我觉得人生很有成就感。不过，老实说，我记得活动是很辛苦的。没有星期天，没有假日，午休时还得自己掏钱给会员打电话，每天晚上要到十一点以后才回到家，母亲经常责骂我，说要跟我断绝关系。我跟西田谈过好多次，都说不干了，要退出俱乐部。我们打算领到工资后，就把大部分工资用来照顾家里。父母嘴上虽说要断绝关系，但他们相信自己的女儿做的不是坏事。活动很辛苦，可是我们还是忍下来了，这大概是因为从俱乐部活动中得到的教导吧。回想起来，那时候我们都是竭尽全力地生活的，所以我们对青春无怨无悔。”

这样的活动并不轻松。在战争期间，无论什么活动都要遭到特高的监视，所以，我们能够持续活动这么久，简直可以说是奇迹。

²⁹⁵ 上文明明是“水野静江”，但这里不知为什么又变成了“水野静枝”，可能是笔误。——中译者注

第十章 地下活动时期遇到的各种困难

会员的剧减

俱乐部“解散”后，我们继续开展俱乐部的各方面活动，又坚持了一年半左右。所谓“坚持”，是因为跟合法时期不一样，我们现在要受到许多制约，所以组织的人数急剧减少了。而且，从小宫开始，我们的中坚活动家也接二连三地入伍了。此外，因为印刷产业属于“非急需非必要”产业，工人会被军需产业征用，所以，一个又一个活动家被调到军需工厂去了。活动家没有了，组织自然要受到打击。

俱乐部的实践，也变得像是被巨大的激流冲走的小船一样了。

由于会员的剧减，俱乐部要想维持积极的活动，就必须建立一支稳定的队伍，而这样做又需要稳定的资金。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不能再让俱乐部的核心会员继续分散下去。我们打算把由于“企业整备”²⁹⁶而准备放弃经营的印刷所给承包下来，以柴田为中心经营企业，以此来筹措资金。

在麻布²⁹⁷有一家经营困难的小型印刷所，叫做明文舍。经过俱乐部会员浅井幸夫²⁹⁸的父亲的介绍，柴田跟明文舍的经营者交涉，承包

²⁹⁶ 随着战局恶化，日帝当局为了加强对经济的管制，以“企业整备”为名，对非军需企业进行整合，于1941年12月发布“企业许可令”，全面实施许可制度，1942年5月又发布“企业整备令”，以法律的形式强制推行企业整备。此举导致大量非军需企业由于资金紧张、原料和劳动力缺乏而被迫停业。——中译者注

²⁹⁷ 麻布（麻布/あざぶ）原是东京市的一个区，1947年与芝区、赤坂区合并为港区。——中译者注

²⁹⁸ 战后当过日放印刷工会副委员长。——原注

了工厂的经营。双方达成了分配利润的协议：排版的利润，经营者分四成，工人分六成；印刷的利润，经营者分七成，工人分三成。我们把一批俱乐部老干部集中到了明文舍：

排字：柴田、高木、河崎

拣字：杉浦、田口、佐藤、竹入弘治²⁹⁹、山本广次³⁰⁰

拆版：水野、石井、柴田（妹）

铸造：阿泷（タキちゃん）（姓氏不明）

大部分干部都集中在这里，相互联络就变得非常方便了。但这一回，由于工作变得非常忙碌，浑身腰酸背痛。大家起早贪黑，拼命干活。我们竟然获得了工厂的管理权，这在当时看来简直就像做梦一样。我们干活越卖力，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活动家能够腾出手来，专门从事运动。

这家印刷所不得不承接与俱乐部会员的思想相悖的业务。然而，在战时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接下的业务，主要是印刷儿玉誉志士³⁰¹等人主办的右翼杂志，在五·一五事件³⁰²中上蹿下跳的井上日召³⁰³等

²⁹⁹ 战后当过板桥文化印刷工会书记长。——原注

³⁰⁰ 战后当过文祥堂印刷工会书记长。——原注

³⁰¹ 原文如此，应为“儿玉誉士夫”。儿玉誉士夫（児玉 誉士夫 / こだま よしお，1911年2月18日——1984年1月17日），生于福岛县安达郡本官町，自幼家境贫寒，7岁丧母，8岁时移居朝鲜，从京城商业专门学校毕业后，回到日本，从此投身右翼运动。在三十年代积极参加了多次右翼阴谋。1937年受外务省情报部委托，到中国刺探情报。1941年接受海军委托，在上海设立“儿玉机关”。1946年初被作为甲级战犯逮捕，1948年底获释后，继续活跃于右翼运动，利用战争时期搜刮的大笔钱财，在政界兴风作浪，被称为“政界与经济界的黑幕”。——中译者注

³⁰² 井上日召的“血盟团”在1932年2月至3月制造了一系列政治暗杀，企图发动“昭和维新”，但警方在3月11日逮捕了血盟团的主要人物，血盟团残党和其它右翼团伙、部分海军少壮派军官一起在1932年5月15日发动政变，袭击首

人的著作，也是由我们拣字和排字的。我们真的很不喜欢这些活儿。但另一方面，这又是最能躲避特高耳目的工厂。活动家们只好不去计较接什么活儿。正经的印刷品只有三笠书房的出版物而已，尤其是中河与一³⁰⁴的《天上的葫芦花》，还成了畅销书。此外，我们还承接了京桥的石川、土井、共立三家印刷公司的外包业务。为了成功地经营工厂，大家都非常努力。柴田每天都在认真地研究，怎样提高工作效率，怎样让尽可能多的人有时间去从事运动。因此，每当接到印刷品的原稿时，他都要对工作内容进行彻底的调查，让工作更加好做一些。每天晚上他都要阅读原稿，找出相同的字，就先拿去浇铸铅字，在拣字的时候，把相同的字排在活字箱前，还要考虑铅条、嵌块的种类等问题。就这样，工作方法得到了改善，工作效率自然也就大大提高了。佐藤次雄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我记得刚开始不久，我就被叫去明文舍了，在芝区办公室里，不记得是杉浦还是小宫对会员们说：‘麻布有家工厂快倒闭了，大家想包下来试试，你也一起来吧？’明文舍就在都电四之桥（光林寺前）的车站出来，往天现寺方向走

相官邸等地，刺杀了时任首相犬养毅，政变计划当天就被警方粉碎，史称“五·一五事件”。——中译者注

³⁰³ 井上日召（井上 日召/いのうえ にっしょう，1886年4月12日——1967年3月4日），本名井上昭，生于群馬县利根郡一个医生家庭，曾就读于早稻田大学。1909年进入南满铁道工作，从事间谍活动。1928年加入日莲宗。1932年参与成立“血盟团”，策划了多起政治暗杀事件，因此被判处无期徒刑，1940年特赦出狱。战后继续活跃于右翼运动。——中译者注

³⁰⁴ 中河与一（中河 与一/なかがわ よいち，1897年2月28日——1994年12月12日），生于香川县阿野郡坂出町一个医生家庭，1919年考入早稻田大学预科文学部，从192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24年与川端康成、横光利一等共同创办《文艺时代》，成为新感觉派的旗手。《天上的葫芦花》（天の夕顔）是他的代表作，发表于1938年。——中译者注

一会后的左手边，从明文舍前面一点的小巷进去，从不太干净的长屋³⁰⁵前面走过，走到尽头的厨房，才是工厂的入口。虽然叫工厂，但装拣字工的大字等的活字柜就放在一个面积三畳的房间的榻榻米上，那个房间是由那栋长屋的两间侧屋打通形成的，还留有隔扇和障子。机械车间正对着都电线路，有一个看上去很文静的青年住在里面，操纵机器。

“负责排字的是柴田、河崎正一、高木锦之助三人，拆版由水野静江负责，后来柴田伊纪（柴田イキ）也来当见习工，给他们打下手。

“拣字由杉浦正男、田口俊郎、山本广次、竹入弘治、佐藤次雄五人负责，石井敏子（石井とし子）负责拣选假名。忙的时候，南云富吉也来帮忙。

“业务采取承包制，利润四六分成，（业务用的）原稿本来应该是由并木先生拿过来的，但是他总是不能按时拿来，柴田焦急之下，把杉浦从拣字那边调过来，让他到处去找业务。

“经营者并木先生一头白发，年近五十，对人很和善，可是在印刷这方面简直像个外行人。没有活字的时候，跟他说一声，他就会到固定在紧挨着厨房旁边的地板上的铸造机旁边，灵巧地操纵机器，铸造出活字。

“虽然我跟柴田是到了明文舍以后才在日常接触中亲近起来的，但我觉得，他对我产生的强烈影响，是一辈子都忘不掉的。柴田是个对工作要求很严格的人，时而见到他对负责拆版的水野还有自己妹妹严格要求的样子，而他对自己的工作更是一丝不苟，效率极高。有时他还会过来看我们拣字，

³⁰⁵ 长屋（長屋/ながや）是一种集体住宅，一般只有一层，里面的各户住家呈水平方向排列，邻居共用墙壁。——中译者注

但不知为何，对我们的工作却没有插过话。”

尽管我们继续像这样努力工作，但运动还是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日本的形势也在日渐恶化。

“有时候，人必须闭上眼睛，从清水的舞台上纵身跳下³⁰⁶”，说过这番强硬言论的东条英机，被天皇授权组阁。正像国民担心的那样，东条一头扎进了对美战争。

收音机里传出了重大新闻：

“八日黎明，帝国海军在西太平洋与美英军队进入战斗状态”，日本海军的三百五十架飞机袭击了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八艘主力舰有六艘被击沉，一百六十四架飞机被摧毁。一九四一年（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国民从收音机中收听了《君之代》³⁰⁷和宣战诏书。

在对美宣战的同时，日军还进行了南方作战，取得了“超出预想的战果”，把战线扩大到了马来、新加坡和苏门答腊。但是，随着战争的扩大，国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黑暗时代。

政府在开战时，还采取了紧急措施，宣战后的第二天，即十二月九日清晨，政府下令逮捕此前一直被监视的“危险人物”：

作为涉案嫌疑人而被逮捕者：二百一十六人（有证执行者一百五十四人）；

预防性拘留者：一百五十人；

被预定预防性监禁者：三十人（有证执行者十三人）³⁰⁸。

³⁰⁶ “清水的舞台”是指京都清水寺的正殿，位于锦云溪的山崖上，高度约为12米，在江户时代，开始出现从清水舞台上跳入溪间的祈愿方法，久而久之就有了一句俗语：“从清水舞台跳下”（清水の舞台から飛び降りるつもりで），表示抱有背水一战的觉悟。由于这种祈愿法比较危险，被京都府于1872年下令禁止。
——中译者注

³⁰⁷ 《君之代》（君が代）是日本的国歌，意为“君王的世代”。——中译者注

³⁰⁸ 《社会运动的状况》，一九四一年，第235—236页。——原注

此外，在开战之后召开的第七十八回国会还制定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临时取缔法》，把国民所剩无几的政治自由给彻底剥夺了。

离开导师

以明文舍为中心的活动仍在继续，但是，在我身上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点我不能不讲清楚。我无比尊敬柴田，但在明文舍工作期间，我第一次违逆了他，并离开了明文舍。原因并不是思想上的对立，而是工作上的问题。

原因是这样的：自从我们开始在明文舍进行自主生产，仅靠以前的客户——出版社和母公司——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订单了。因此，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发展新的客户。我被调到了营业部。这可以说是提拔，然而，我以前都是作为拣字工、在技工的专业气质下熏陶出来的，脑子又不够机灵，所以总是适应不了新工作，业绩老是上不去。在为了把生产搞上去而竭尽全力的柴田看来，我一定让他觉得很烦躁，却又无可奈何。我也隐约感觉到了这一点，产生了自卑感。终于有一天，柴田当着许多同事的面，不由分说地大骂了我一顿，我一气之下，二话不说就跑回了家，然后连续旷工了两三天。柴田大概是为了给我一点教训，并没有过来接我回去。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也拉不下脸来低头道歉。过了一阵子，他叫当过妇女部长的西田富子到我这里来，看看我的样子。而且还让她装作不经意路过的样子。我变得更加顽固了，我说我不想再在明文舍干了，不肯听她的意见。

在此期间，我却跑到本乡区的一家公司上班了，那家公司叫正文社，印刷的是医疗书籍。结果，我和柴田之间的隔阂，被我自己弄得越来越深。这是一九四二年（昭和十七年）二月的事。可是，我以前一直都在跟同志们一起开展活动，离开他们后，我就产生了逃离运动的空虚感，每天都受着阶级良心的折磨。以前我天天都没日没夜地投

身于激烈的活动中，到了某一天，就像紧绷的琴弦突然绷断一样，不再搞活动了，从此以后，就只是上班、下班、回家读书，寂寞了就去看看电影，每天都过着这样的生活。西田还是继续来找我，不知不觉地，我们两个年轻人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西田建议把我们俩结婚的事告诉柴田，借这个机会请他原谅我。我也同意她的意见。我心想，柴田如果认可了我们俩的婚事，那就等于原谅了我吧。

柴田非常高兴，两三天后，西田转告我说，柴田听说我们俩要结婚，就答复说：“其实我也想撮合你们俩结婚的。”一九四二年五月，我和西田结婚了。我本来应该趁这个机会，到明文舍去向同志们道歉，然而，就在我还犹豫不决的时候，出版工俱乐部在八月遭到了第一次逮捕，柴田和白石就是在这时候被捕的。我也被关进横滨监狱之后（下文会详述），在澡堂里偶然碰见了她，我们躲过看守的监视，热烈地握手，她说了好些亲切的话，直到这时候，我才觉得，自己终于得到了她的原谅。

我和柴田的这段往事，其他会员又是怎么看的呢？关于当时的情况，佐藤次雄是这么说的：

“柴田对于自己身边那些值得信赖的人，不会隐瞒自己的态度，又时常对他们十分严厉。有些时候恐怕过于严厉了。对于那些不是很信任的、可管可不管的人们，柴田则显得十分亲切而耐心，喜怒不形于色。像我这样的人，或许是因为两者都不沾，或许是因为还是新人，所以他对待我们并不会这么严格。

“我来到明文舍不久后，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柴田狠狠地批评了杉浦几句，就连正在拣字的我都听见了，最后只看见杉浦气鼓鼓的样子，从第二天开始，在工厂里就见不到杉浦了。

“这件事似乎对柴田造成了极大的精神打击，有一段时间，他连笑话都不讲了，总是在沉思苦想，看上去怪可怜的。

“代替杉浦跑业务的田口，年纪轻，胆子大，比较适合这个工作。

“到了午休时间，大家就聚在位于工厂一角的三叠大小的房间里吃饭。有时候，吃完饭后，大家谁也不想站起来，于是休息时间就随随便便地延长了。在这种时候，大家一般就会以柴田为中心，七嘴八舌地谈天说地，不过，说着说着，就变成了对我们进行政治启蒙的谈话。而且，平时在工厂里随便聊天，也会聊着聊着就聊起政治话题来。

“工作完成后，我们就像事先决定好似的，到芝区办公室去，但是，那段时间里，柴田有时也会跟我们一起去做办公室，跟年轻人一起，给油印刊物之类的工作帮忙。”

当时，在战时的监狱劳动下，工人的处境变得越来越艰难。工会被强行解散、工人被强行编入由上头拼凑出来的产业报国会后，工人就失去了通过团结的力量来保卫自己的生活和权利的手段；而在“非常时期”的借口下，工人不得不在特高的监视下，怀着战争必胜的信念干活。不仅如此，工人还必须携带劳务手册；不能跳槽；由于限薪令，不能加薪；大米要靠配给；衣物凭票供应³⁰⁹。黑市物价不断上涨，工人的不满情绪不断地在心中郁积起来。要想诉说生活的困苦，只有向公司递交请愿书一种办法。

工人的斗争，自发地转向了怠工。

根据内务省警保局的资料，全国都发生了下列情况：

³⁰⁹ 由于物资匮乏，日帝当局从1942年起开始对布料和衣物实行管制，所有衣物都必须凭布票（衣料切符/いりょうきっぷ）购买，这种制度一直执行到1950年。——中译者注

- 一、迟到早退的人数增加；
- 二、缺勤人数激增。兵库县的播磨造船的七千二百一十人当中有一千五百一十七人缺勤；岐阜县的川崎航空的一万〇四百〇五人当中有一千七百三十二人缺勤；全国的平均缺勤率为百分之十二·三至百分之三十；冈山白炼瓦工厂的九百七十七名工人在七月有百分之四十九缺勤；
- 三、被征用的工人不断逃跑；
- 四、工人调换工作单位的案例没有减少，甚至还有不少工人用非法手段调换单位；
- 五、俗称“打黑工”（あんこう稼ぎ）的双重打工现象开始增多。在公司里，到了四点就下班，草草吃完晚饭后，从五点半开始就到附近的中小工厂打工，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五点半，早上七点再去公司上班。由于在中小工厂里通宵干活，在公司上班时就会怠工，甚至还会在仓库里午睡。
- 六、全国的怠工情况不断加剧。监工在的时候就干活，监工不在就不干。利用上班时间制作私人物品的现象普遍存在。
- 七、在工厂内外，工人单独或集体从事抢劫、盗窃、暴行、诈骗、胁迫；在工作单位里公然赌博；养成工、征用工行为不轨；这些不良倾向显著增加；
- 八、工人集体对监工和管理层施暴³¹⁰。

³¹⁰ 《社会运动的状况》，一九四二年，第十四卷，第407页。——原注

第十一章 接连不断的镇压

对出版工俱乐部的镇压

大多数国民看了初战的战果，都以为日本能够获胜，然而，实际的战况却越来越令人担忧。日军在中途岛战役遭到惨败。被誉为日本海军的至宝的“赤城”号、“加贺”号、“飞龙”号三艘航空母舰被击沉。美军开始转入反攻。

四月十八日，本土遭到了“敌机”的轰炸。炸弹落在了东京、神奈川、爱知和兵库，让国民体会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国内经济也已经失去了支持战争的能力。就连印刷业的主要原料——印刷用纸都要实行配给，到了十二月，其它原料也要实行配给，按照官方规定的价格，根本买不到原料，不得不在黑市上购买物资。从一九四一年（昭和十六年）到一九四二年，在印刷产业工作的工人减少了五千人（百分之八·二）。

一九四二年（昭和十七年）四月三十日举行了大选。大政翼赞会推出了四百六十七名候选人，绝大多数都当选了，但是，这次选举遭到了国民的猛烈批判。选票上写有下列怨言：

“政府才是我们的敌人，零售商要活不下去了”

“请增加味噌、酱油的配给”

“饿着肚子怎么打仗”

“所谓战阵训³¹¹，就是不吃不喝也要干活”

“不要选举要大米”

“以整备为名，把我们这些小民给打垮，却让官吏和资本家大发横财，实在太混账了，砍了东条的脑袋”

“工钱无几生活难，选举谎言我等苦”³¹²

在这次“翼赞选举”中，有八十五名“非推荐议员”³¹³当选，但值得注意的是，自称工人阶级的代表、却始终拥护战争的松冈驹吉、金正米吉³¹⁴、伊藤卯四郎³¹⁵等人都落选了。

即使面对着种种困难，俱乐部的干部仍然以明文舍为据点，继续

³¹¹ 战阵训（戦陣訓/せんじんくん），本意是指战场上的训诫，在二战期间特指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于1941年1月日下达的规范军人行为的训令。——中译者注

³¹² 《社会运动的状况》，一九四二年，第十四卷，第520页。——原注

³¹³ 在1942年4月30日举行的第21届日本众议院总选举中，由于1940年发布的结社禁止令，所以在本次选举中只有大政翼赞会参选，因此这次选举又被称为“翼赞选举”，大政翼赞会推荐了461名候选人，其中有381人当选。非推荐议员是指未得到大政翼赞会推荐、以个人名义参加选举并当选的议员。——中译者注

³¹⁴ 金正米吉（金正 米吉/かねまさ よねきち，1892年12月8日——1963年11月28日），生于佐贺县，小学毕业后当过蒸汽机车司炉。1917年参加友爱会大阪联合会。1922年参与创立大阪合同工会（大阪合同労働組合）。在劳动总同盟内属于右派，1925年劳动总同盟第一次分裂时，积极打击排斥左派。1946年参与创立日本工会总同盟（日本労働組合総同盟），并担任副会长，1952—1959年担任日本工会总同盟会长。——中译者注

³¹⁵ 伊藤卯四郎（伊藤 卯四郎/いとう うしろう，1894年8月19日——1974年5月1日），生于长崎县南高来郡有明町，18岁时前往北海道当矿工。从1919年起参加工人运动，1920年担任歌志内矿井工会（歌志内炭坑労組組合）主席。1922年回到长崎，参与创立总同盟南九州联合会。1929—1934年出任总同盟中央委员。1945年参与创立日本工会总同盟九州联合会，并出任会长。次年出任日本工会总同盟副会长。战后参与创立日本社会党，并任中央执行委员。1960年随社会党右派脱党并参与创立民主社会党，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中译者注

开展活动。但是，想想就会明白，在这种严酷的局势中，活动迟早会暴露的。

一九四二年（昭和十七年）八月，柴田、白石被神奈川县警方逮捕了。关于这次逮捕是怎么开始的，当时在出版工俱乐部内负责胶版印刷工的工作的藤坂房雄³¹⁶是这么说的：

“我跟柴田君商量后，开始在胶版印刷工当中开展组织工作。那些胶版印刷工当中，有一个人在横滨港散发反战传单，警方就趁机把以柴田为首的十四人抓了起来，从东京押往横滨。”

我们原先也相信这种说法，但是，为了编写本书，我们查阅了许多文献，在内务省警保局编纂的《社会运动的状况》（第十四卷，一九四二年）当中找到了这样的记录：

平冢团体事件的状况

（一）逮捕情况 自二月二十八日起，在神奈川县逮捕了高梨重治（三十五岁）、笹谷二郎（三十三岁）、柴田隆一郎（三十五岁）、白石光雄（三十一岁）、今村忠赖（三十七岁）、藤坂房雄（四十岁）、五味宣雄（三十四岁）等七人，上述人等的活动状况如下：

（二）活动状况 高梨重治自昭和六年十月起，与日本共产党员东重夫、福家进等人联络，在其影响下成为预备

³¹⁶ 战后参加了晓印刷的建设，后来当过东京千代田区民主商工会会长，现已病逝。——原注

党员，此后在湘南、平冢一带为扩大和强化党组织而奔走，在此期间被捕，昭和七年四月，横滨地方法院特别开恩，对其处以暂缓起诉的处分，然而，此人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依然不改，此后仍然继续与同志偷偷保持联络。（中略）昭和十二年四月，加入以柴田隆一郎、白石光雄为中心的“出版工俱乐部”，参加了发行机关报《出版工俱乐部新闻》、提高阶级觉悟、让进步分子潜入工厂内、诱发劳动争议等活动。

此后，昭和十四年四月，因病暂时返回平冢市家中静养，但在昭和十五、十六年，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以及粮食短缺等情况的刺激下，重新唤起了运动的热情，与同志笹谷二郎联络和协商后，得出了结论：为了响应很快就会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整个平冢地区着手准备武装起义。为此成立了“平冢团体”，并为了团体的武装而四处奔走。

如上所述，“平冢团体”是为了武装起义而成立的，但其目的也包括在日本—美英战争中，趁空袭造成的混乱之机，在以平冢为中心的区域内发动武装起义。

我认为，上述文件中介绍的这起事件，就是导致出版工俱乐部遭到镇压的缘故。

在明文舍工作的人一边继续工作，一边给被捕的人送饭送东西。第二次逮捕的征兆也出现了。大家聚在一起午休时，就会有收废品的进入明文舍前的小巷，这种情况出现了不止一回。

第二次逮捕从十一月十一日开始了，在这次逮捕中，杉浦、田口、山本、佐藤、高木、南云、大桥被捕了，岩田、福田和好多人则遭到了审问。佐藤次雄回忆了当时的感想：

“那是十一月十一日的早上。我到工厂入口时，比平时

晚了五六分钟，一到入口就听见工厂里头有奇怪的吵闹声，然后就有两三个便衣特务上来堵住了我。在厂子里头，田口也被两三个便衣特务给围住了，我跟他默不作声地交换了一下眼色，互相点了点头，然后就被特务给带到外头去了。”

俱乐部会员河崎接管了明文舍，从此以后，他就带头管理明文舍。不久后，河崎也被征兵了，于是明文舍就由“抚子和睦会”的水野带头管理。男子都不在了，“抚子和睦会”的会员们就慢慢接管了各项工作。由于领袖接连遭到逮捕，运动的指挥部遭到了毁灭，在佐藤操³¹⁷、西田、杉浦的妹妹以及新加入的鹿谷等男子的努力下，勉强把运动给经营了下去。不仅是被捕的人在受苦，他们的家人也在受苦。南云的母亲、岩田的妻子、高木的母亲等人失去了家中的顶梁柱，只好向在明文舍工作的人们求助。还在工作的俱乐部会员从销售额中拿出一部分，每月分给这些被捕者的家属一点钱，还努力帮被捕者家属找活干。此外，为了鼓励物质条件困难的家属，还到埼玉县釜伏岭举行远足，采集了蔬菜；还招待家属到出津海岸旅游。

后来，竹入也被军需产业征用了，随着企业整备的逐渐开展，业务也没有了，最后明文舍只好解散³¹⁸。水野带着曾在明文舍工作过的女工，到芝区的爱宕印刷去找工作。那家公司的工人都被征用了，正因人手不足而发愁，一听说来了会排字的鹿谷、会拣字的西田、会校正错版和拆版的水野、会拆版的杉浦妹妹，公司大喜过望，马上录用了他们。

³¹⁷ 佐藤次雄的妻子，战后参加了晓印刷的建设。——原注

³¹⁸ 根据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于1965年10月30日发行的《日本劳动年鉴·特集版·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的记载，明文社是1943年11月解散的。——中译者注

凄惨至极的拷问

我是在第二次逮捕中被捕的，那是十一月十七日早上的事。当时我正在本乡的正文社当临时工，我妻子去上班了，但我们没有把她的工作地址告诉租房给我们的房东。特高搜查了我父母的家和妻子的娘家。妻子娘家把特高过来搜查的事通知了我妻子，她就给我打电话，然后我马上回家，把值钱的书藏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又去妻子的娘家吃了晚饭。两个特高来到妻子的娘家，把我抓走了。他们用电车把我押送到横滨的神奈川警察署，在押送途中，特高对我还算客气，可是一到神奈川警察署，他们的态度马上就变了。我被带到道场，五个拿着木棍、竹刀的刑警把我围起来，轮流殴打我，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拖来拖去，用木棍打我的膝盖，用竹刀打我的头，逼我正坐，然后又用皮靴踢我的膝盖，踩在我的膝盖上，等等。

同时他们还对我施加彻底的恐吓：

“现在是非常时期，你们这帮家伙还要搞共产主义运动，还想赤化日本，这么蠢的事都要干，你们是不是哪里有毛病？活活打死都便宜了你们这帮家伙，皇军的士兵正在支那、在南方为了保卫国家而拼死战斗，你们想过这回事没有？像你们这种该死的卖国贼，杀掉一两个，也没人会说三道四。做好被打死的觉悟吧！”

我被拷问了大概两个钟头，这就是我在被捕第一天的“洗礼”。在被带到牢房的途中，我连站都站不起来了，只能靠在特高的肩膀上，才能勉强走到牢房。但是，狱友们却很亲切。他们帮我脱下裤子，看见肿胀发紫的膝盖，便同情地说“太过分了！”第二天、第三天我都没有被拉去审问，但到了第四天，我又被带去道场，他们揪住我的头发，把我拖来拖去，用竹刀打我，逼我正坐，然后又轮流踩我的膝盖，跳起来踩在我的膝盖上，又踢来踢去，就这样重复了不知多少次。在拷问的过程中，我开始发觉，有大批俱乐部会员也被捕了。神奈川县

警发挥机动性，到各个警署去，对被分别关押在各警署的俱乐部会员进行审讯，逼问出新的案情后，又利用新案情来逼问其他俱乐部会员。被关押的人个个痛苦不堪。“案情”一个接一个地被挖了出来。特高甚至还根据需要来捏造案情。我后来听说，柴田用坚决的意志来对抗刑讯，一步也没有退让。

无论特高问他什么，对他施加怎样可怕的酷刑，他仍然泰然自若。他果断地回绝了特高：

“我是共产主义者。要我抛弃共产主义，就等于叫我死。随便你们怎么说都好，反正我已经有了为主义含笑赴死的觉悟。我跟你们没什么好说的，你们想怎样就怎样吧。”

他的态度始终如一，神奈川县警也拿他束手无策。

柴田平时教过许多干部，被捕后应该怎么做，所以他们才能同刑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也有一些人没能顶住。

在我被关在神奈川县警拘留所的一年多时间里，由于各种富有战时特色的罪名而被关进来的人越来越多。

每天都有各阶层的人被关进来：在学校不小心说出反战言论后、由于学生不小心说漏了嘴而招来牢狱之灾的教师；因为在公司里搞怠工而被关进来受罚的工人；被怀疑是间谍而被逮捕的基督教牧师；因为卖缝衣针而违反了物价管制令的人；卷入贪腐丑闻的造船统制会大人物。在平时根本算不上犯罪的行为，在战时就要挨重罚。

我并不是幸灾乐祸，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囚犯来说，有这些人进进出出是件好事。因为通过跟这些人聊天，可以多少了解一点外面的事。

一个由于无故旷工而被关进来的川铁³¹⁹工人告诉大家，德军在斯大林格勒被反包围，三十五万人被苏军歼灭。在拘留所里，许多囚犯一直以来都只知道德军无比强大，他们惊讶地问：

“德军怎么会输呢？这怎么可能？准是搞错了吧？”

但我却认为，这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它最终也会影响到日本。

在国际上，以斯大林格勒战役为契机，得到了全世界工人阶级支持的盟军开始转入反攻，但是，黎明的曙光还没有照耀到日本工人阶级身上。此外，尽管随着山本元帅的战死、阿图岛和基斯卡岛的“玉碎”（全军覆没）³²⁰，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战争的失败越来越明显，然而高喊“战局惨烈”的军部却还要加强体制，进一步对国民进行战争动员。

此前，学生的志愿劳动（勤劳奉仕）都是自发的，但现在变成了强制性的义务，当局逼迫学生到附近的兵工厂、军需工厂、农村去，强逼他们为这场毫无胜算的战争送死，践踏他们的青春。

警方的调查结束后，俱乐部会员中的主要人物被转移到了横滨拘留所。在拘留所里的生活又延续了半年左右。有时候，法官要进行讯问，我们就会被蒙上眼睛，坐着汽车到法院去。

来回法院的路上，我透过囚车的隙缝看出去，发现街上的样子变化越来越大。男人穿上了国民服、戴上了战斗帽、扎起了绑腿；女人戴上了防空头巾、穿着扎腿套裤。虽然我被关在拘留所里，但我也能从这些变化当中切身感受到日本的战况正在恶化。

³¹⁹ 即川崎制铁（川崎製鉄），它是日本的一家重要钢铁制造商。——中译者注

³²⁰ 1943年4月18日，山本五十六在海军战斗机的护卫下，前往前线视察，美军截获该情报后，便派战斗机拦截，击落了山本的座机，山本当场身亡；1943年5月中旬，美军向占领阿图岛（Attu）的日军发动进攻，夺回了该岛，美日双方均遭受了惨重损失，守岛日军几乎全军覆没；1943年5月下旬，美军又向占领基斯卡岛（Kiska）的日军发动进攻，但日军在美军眼皮底下撤出了守岛部队，几乎没有遭到损失。——中译者注

第十二章 日本的战败正在迫近

绝望的战局与监狱内的状况

一九四四年（昭和十九年）五月到十月之间，各人的判决下来了，除白石之外的三人被判决在横滨监狱服刑。

柴田被判处七年徒刑；杉浦、田口被判处三年徒刑；白石被判处二年徒刑，缓刑四年³²¹。白石虽然是俱乐部的核心人物，但只被判了缓刑，这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参加地下时期的活动。柴田、杉浦、田口的判决书已毁于战火，只有白石的判决书幸免于难，所以便刊登在此：

预审终结决定书

籍贯 东京都本所区向岛请地九十九番地
住址 同 都葛饰区本田原町一百〇一番地 宫本常住宅
排字工

白石光雄
现年三十三岁

对违反治安维持法的上述人物的预审决定如下：

³²¹ 但根据下文中的缓刑执行书来看，缓刑期应为三年。——中译者注

正文

本文件交付横滨地方法院，用于公审

案由

被告人幼时失去双亲，大正十四年三月，经叔父白石三郎同意，从栃木县上都贺郡鹿沼町鹿沼寻常高等国民学校初等科第六学年毕业，同年四月，到当时经营印刷业的小舅有松勇（东京都本所区横川町三十六番地）身边帮工，同时就读于东京府立第三中学夜间部。昭和三年二月，被告人在第三学年辍学，昭和十年一月，有松勇的印刷业因经营困难而停业后，被告人辗转于东京都深川区白河町东京印刷株式会社及东京都内其它印刷工厂，从昭和十年二月、三月起，与共产主义者柴田隆一（化名柴田隆一郎）、千叶秀雄等人结识，受其感化，又读了山田盛太郎³²²的《日本资本主义分析》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左翼文献，在昭和十一年四月信奉了共产主义。共产国际自称要实现以世界无产阶级专政为基础的世界共产主义社会，而作为世界革命的一环，企图在我国通过革命手段变革国体、否定私有

³²² 山田盛太郎（山田 盛太郎/やまだ もりたろう，1897年1月29日——1980年12月27日），生于爱知县，1920年考入东京大学经济学部，1923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25年当上副教授，1930年因“共产党同情者事件”而被逐出东大，1932—1933年发行《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1934年发表了代表作《日本资本主义分析》，1936年因卷入“共产主义学院事件”而被捕，1945年重新回到东京大学经济学部任教，1947年担任中央农地委员会委员，1950年担任东京大学经济学部主任。1957年退休。——中译者注

财产制度、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结社日本共产党是其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建立的日本支部，被告人明知这一点，却仍然对其予以支持，并根据我国内外形势，于昭和十年十月，在柴田隆一的劝诱下，加入了以柴田隆一等人为中心而成立的、表面上自称是东京印刷工的联谊与互助团体“出版工俱乐部”（原名“和工会”，昭和十一年四月改称“出版工俱乐部”），通过对“出版工俱乐部”会员进行启发和提高共产主义觉悟等运动，企图帮助实现前述两个结社的目的。从昭和十一年四月到昭和十五年八月三十一日该俱乐部解散为止，被告人作为“出版工俱乐部”的最高干部，与柴田隆一以及杉浦正男、田口俊郎、小宫吉一等最高干部一起为了实现共产国际及日本共产党的目的，而进行了发展“出版工俱乐部”会员、启发和提高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中略……等各种活动。

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治安维持法》第一条、第十条、附则第二项，《刑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第十条，足以作为嫌疑人交付公审，经过考虑，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做出正文中的判决。

昭和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横滨地方法院

预审法官

石川勋藏

缓刑通知书

东京都葛饰区本田原町一百〇一番地 宫本常住宅 排字工

白石光雄
现年三十三岁

被告人于昭和十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横滨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贰年，裁定其刑期依照下列规定缓期执行：

一、缓刑期为昭和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至昭和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中略)

特此告知。

昭和十九年五月十一日

横滨地方法院 检事局
检察官 伊东 胜

柴田被捕后，躲过了搜捕的八木夫妇时常会去走访和鼓励他的家人。我母亲和妹妹把怀孕的西田保护在我家里，她才能生下我们俩的孩子。田口的父亲心情非常低落，但他得到了中岛良助的鼓励，中岛还帮他找工作。被捕者的家属自然是过得非常艰难。

在这个时候，美军的反攻一天比一天厉害，战败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就是在监狱里，也有人在锻炼时无意间说出“外面为了造武器，连寺庙里的钓钟、火钵、锅釜都收上去了”这样的传闻。外面的物资好像越来越紧张了，看守也说“你们这帮狗崽子算是走了狗屎运，我们现在连一碗乌冬面都吃不起了”，看守还跟杂役要饭吃，杂役就把囚徒的饭克扣了一部分。囚徒的饭食也在渐渐变差：一开始吃的饭是大米和小麦混合做的，然后变成了大米和大豆，后来又变成了大米和

苞谷混合的块状物，原先每周能吃上一顿的“大餐”——天妇罗（其实也只相当于街上卖的一块油炸什锦菜（五色揚）），也越来越难吃到了，海带、羊栖菜之类的倒是增多了，每周有一天，配菜只有一颗梅干。每年只有正月才发一块饼干和一个橘子，这是我们唯一的乐趣。

衣服也变糟了。按照规定，到了冬天应该给我们发棉衣，可我们却没得到。在严寒的一月底，一到晚上，外头寒风大作，在铺着水泥地板的单人牢房里，我只能穿着纱布一样薄的衬衣、用那时候上市的人造丝做的劳动服、长到膝盖的裤子，因为袜子穿不上，只能顶着寒冷生活下去。囚犯们吃不饱，穿不暖，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因为泊事件³²³而入狱的改造社的和田喜太郎就是在这个时候庾死狱中的。不过，待遇的变差，也意味着日本的战力即将逼近极限。这一事实越发明显，就连狱中的囚徒都能看得见。就连监狱也要实行灯火管制，每天夜里都会响起空袭警报。从牢房的窗户望出去，能看见横滨的天空一片火光，空中有几架飞机在缠斗，乍一眼不知是我方的还是敌方的，还有几架飞机坠落，我记得简直就像看电影一样，只觉得“真美啊”。

然而，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面对反反复复的空袭，日本飞机却没有出动，只有探照灯向空中投射出虚弱的光柱，我就知道，日本已经没有迎击敌机的能力了。

到了这个时候，看管我们的看守也一个接一个地不见了，问了杂役，才知道那些看守都接到了征召令，被调到战区去了。太平洋的战

³²³ 1942年，综合性杂志《改造》在8-9月号上刊登了细川嘉六（1888—1962）的论文《世界史的动向与日本》（世界史の動向と日本），被人认为是“赞美苏联、批判政府的亚洲政策”而向陆军报道部告发，导致《改造》杂志被当局勒令停刊，细川也于9月14日被捕。在搜查中，特务搜出了一张细川与《改造》和《中央公论》的编辑一起在富山县泊町一家饭店吃饭时的合影，便认为这是企图重建日本共产党的阴谋，趁机大肆逮捕《改造》、《中央公论》、朝日新闻社、岩波书店、满铁调查部的有关人员，共有60多人被捕，其中有4人庾死狱中，史称“横滨事件”，又称“泊事件”。——中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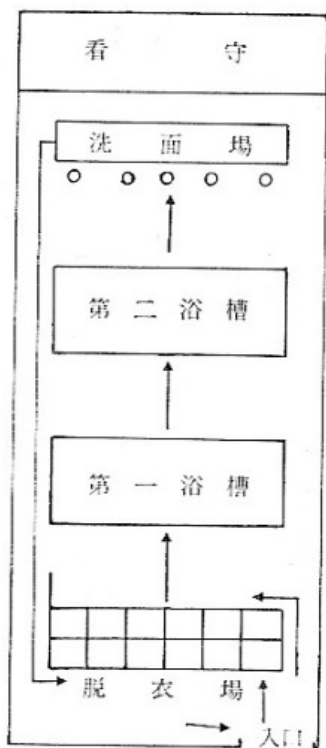
局越来越危急，不管是谁都得入伍，就连学生也失去了暂缓服役的特权。

与柴田重逢

一九四四年（昭和十九年）年底，战局已经毫无胜算，但是，狱中的我却碰上了一件喜事。

我跟柴田在分开两年半之后，终于在监狱澡堂里握手重逢了，虽然时间非常短。每周有一天，被关在单人牢房的囚徒在工作间隙，可以去澡堂洗澡。跟往常一样，看守发出号令后，我们从牢房里走出来，排成一列，走向澡堂。这里我先说明一下澡堂的布局。

澡堂的大小相当于一个长二十五米的游泳池，从入口进去，就是几排好似文件柜的木箱，用来装衣服。脱下来的衣服就放在这些木箱里。要从澡堂出去的话，得从另一边走过来，穿上衣服再出去。从脱衣场往前走是第一浴池，从第一浴池出去就是冲澡场³²⁴，再往前是第二浴缸，从第二浴池出去就是洗脸台。中央有看守台，拿



澡堂的布局

³²⁴ 第一浴池可能是用来弄湿身子准备冲澡的，因为那时候可能不像现在这样每个人都有水龙头。在日本的公共澡堂里，一般是要彻底冲洗干净身子，洗完头发，然后才能进入浴池泡澡。日式浴池就像一个小水潭，水深约为一米，而且还是热水。关键在于全身进入浴池，想泡多久就泡多久，放松自己的肌肉。——英译者注

着木刀的看守站在上面，监视洗澡的囚徒。那个看守一吹哨子，此前正在第一浴池里洗澡的二十来个囚徒就要从浴池里出来，到冲澡场去，在冲澡场洗澡的人就要进入第二浴池，第二浴池里的人就到洗脸台去，正在洗脸台洗脸的人就要到脱衣场去穿上衣服。伴随着“哗——哗——”的哨声，澡堂里的囚徒分批移动，每一批人只有两分钟时间，根本不够暖身子的。

在浴池里人人都是光着身子，这么多人光着身子混在一起，谁也看不出谁跟谁是同案犯³²⁵。那一天，柴田、田口和我偶然在同一个时间段相遇了。我们三人本能地迅速靠拢，在浴池里，我们面对着正前方的看守，柴田处在田口和我之间，我们三人相互握手。柴田面带微笑，只对我和田口说了一句话：“身体还好吧？要好好保重啊，快点出去吧³²⁶。”我一时百感交集，不禁热泪盈眶。田口的心情应该也是一样的。

洗完澡回到监舍后，我一整天都觉得非常充实，哪怕是在做工的时候。

那时柴田已经预感到了战争不久就会结束吧。在写给母亲的信中，他暗示了自己出狱后要做什么：

“昭和十九年十二月十日

“现寄上第二封信。空袭接连不断，不知您是否平安？

天气越来越冷了，待在防空洞里恐怕会对母亲的身体不好。

请把我的大衣袖子改一改，穿上保暖吧。还有，用我的和服

外套来做防护服吧。不用吝惜我的东西，衣服裤子什么的，

能用的就用吧。准备万全之后，要放宽心，不用太担忧。反

³²⁵ 按照监狱管理的要求，应当尽量不要让同案犯相互接触。——中译者注

³²⁶ 这句话有两重含义：既可以理解为“快点从浴池里出去”，也可以理解为“早日离开监狱”。——中译者注

正不管怎么担心，炸弹该落下还是会落下的。不会落下的话，就是取笑它也不会落下。这种时候，请好好理解‘尽人事，听天命’这句话。有个办法可以让日常生活变得更加快乐开朗：到了明年春天，务必要让空箱子、盆子什么的来个总动员，像今年春天一样种上蔬菜。还有余力的话，种些花花草草也不错。观察红色和青色的嫩芽破土而出，能让人生更有乐趣、生活更有活力。母亲您一定很了解这种快乐。今后请您务必准备好土壤，能找一点是一点。另外，在上一封信中，我得知我攒下来的独立资金还留有一部分，请母亲用这笔钱购买有奖债券吧。当然，就算运气好中了奖，现在恐怕也花不出去，不过，等我出去后，为了能够自立，就请您先把奖金存起来吧。为此，可以请家人聚在一起商量，现在买什么债券比较有赚头（下个月会见时就谈这件事吧）。还有一件东西想麻烦您带给我，最近监狱里发行的报纸《人》上刊登了一篇消息，说社会上发售了一种用来擦身的东西，叫做‘健康刷子’。如果您能买到的话，能不能在下次会见时带给我呢？被捕之后，我一直都用干布擦身，但我怕弄坏毛巾，只好用抹布之类的代替。这样很不卫生。所以，我想麻烦您把‘健康刷子’，或是我以前在家里用过的丝瓜络带来给我。请您好好地跟警官解释，我想他一定会批准的。

“没有时间了，剩下的就留到下次会见时再说吧³²⁷。”

柴田在信中说“等我出去后”，还说要用健康刷子来锻炼身体，然而，在一九四四年（昭和十九年）年底，他已经生了病。在他的单人牢房的房门上，挂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只能吃粥”，几天后，

³²⁷ 原文中的假名标记已经改成了现代的用法。——原注

换成了“准许横躺”的牌子。然后，他突然就从单人牢房里消失了。我和田口都很担心他。我惴惴不安地想着：“是不是被调到别的监舍去了？或许是因为刑期长，而被送去工厂了？难道是被调到其它监狱去了？那样的话就再也见不到他了。”过了一个月，柴田又回到了单人牢房。

可是，他已经得了重病。战争期间伙食很差，人人都营养不良。判决下来后，进了监狱，而监狱不许亲属送食物和衣物，加剧了营养不良。

在点名时，年轻的田口特意喊得很大声，让我们知道他的存在。不过我觉得他这么做，主要是为了激励柴田。

在十一月底的一个寒冷的日子里，此前从来没有错过锻炼的柴田，没有从牢房里出来。这让我很担心，他的病是不是复发了？在牢里，得了病可是非常要命的。先是动作变得不灵活，接着就是没法参加早晚的锻炼，然后脸开始浮肿，到了这一步就没救了。十二月底的一个夜里，我听见外面有动静，就从门上的观察孔望出去，发现在柴田的门前，有人搬来了担架，又把担架搬进了牢房里面，他被放在担架上抬了出来。我想通过观察孔看看他的脸色，便尽力睁大眼睛。在五烛³²⁸的灯泡下，看不见他的脸。两个杂役把担架抬走了。看守关上了牢房的门，用公事公办的态度，取下了牢房门上的号码牌。

生活物资的匮乏与言论管制

此时，日本的形势越来越困难了。日本跟周围所有国家都开战了，无论有多少士兵都不够用。每一户家庭里，只要是身体合格的男性，

³²⁸ “烛”（c.）是衡量白炽灯泡亮度的单位，现已被“坎德拉”（cd）取代。亮度为5烛的白炽灯泡，其功率大约为8瓦。——中译者注

都被军队拉走送上了前线³²⁹。

我的大舅子尽管已经有了五个孩子，又超过了四十岁，可还是被征召了，幸好他没有被派到国外去，战后就平平安安地复员了。没有被征兵的“后方”国民，全都被工厂征用了。

即便如此，生产军需品的企业始终得不到足够的工人。

各个町的邻组越发变成了监视国民的摄像头。生活物资是通过邻组分配的，所以它就趁机强行摊派国债，夺走人们的积蓄。贵金属也必须上交国家，我母亲有一枚贵重的家传戒指，也被收走了。

此外，给出征士兵送行、慰问士兵家属、为了防备敌人登陆而举行防火演习、竹枪训练等等，这些事儿都是由邻组组织居民做的。

由于粮食匮乏，主食能吃上高粱、玉蜀黍、麦片都算好的，配给粮先是变成了红薯、马铃薯，后来又变成了橡子粉。配给量下降到了每人每天二合一勺³³⁰（三百克）。报纸上甚至开始刊登文章，告诉国民哪些野草可以吃。每月能配给味噌一百八十三匁³³¹、蔬菜七十五克，偶尔会发一点介党鳕鱼（スケトウダラ），白糖、食用油、衣服之类必须凭票供应。

随着空袭越来越激烈，铁路周围的房屋都被强行拆除了，儿童被迫离开母亲，集体疏散到偏远的乡下。

政府为了向国民隐瞒战争正在走向失败的现状，加强了言论管制。报纸只能刊登大本营声明，而大本营声明里全是谎言。比方说，

³²⁹ 起初，家中长子或大学生可以免服兵役，但是，由于兵力越来越紧张，所有二十岁以上的男性都要服兵役。这也是神风特攻队里有大量大学生的原因。他们的许多信件表明，他们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至少也是不相信战争的目标的。——英译者注

³³⁰ “合”（ごう）和“勺”（しゃく）是日本的体积单位，1合=10勺，在用于测量液体体积时，1合=180.39毫升，1勺=18.039毫升。在测量米时，1合大约等于150克，二合一勺大约相当于300克。——中译者注

³³¹ 匁（もんめ）是日本的一种质量单位，1匁约等于3.75克，183匁约等于686.25克。——中译者注

凡是提到美军的损失，就夸大十倍，而提到日本的损失，就缩减为五分之一，因此，国民并不知道真实情况。尽管如此，报道中的“玉碎”、“转进”（撤退）等词汇，还是让国民本能地察觉到了异样。

此时，美国正在向日本步步进逼。一九四四年（昭和十九年），马绍尔群岛、塞班、马里亚纳群岛接连陷落。塞班陷落后，美军便可以对日本本土发动空袭，所以，日本的主要城市一连数日遭到了空袭。而我们这些囚徒对前线的这些情况一点都不了解。

第十三章 导师瘐死狱中与战败

失去了两位无可替代的人

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二月底，锻炼完之后，我从其他囚徒那里听说，前线正在节节败退。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田口，田口用斗笠遮住了泪水盈眶的眼睛，以悲痛的语调，一字一顿地说：

“柴田死了。”

我一下就懵了，好像浑身的血都凉透了。回到单人牢房后，我才大声哭出来。

日本统治阶级就这样从人民的手中把我们珍贵的导师给永远夺走了。他只要再坚持半年，就能等来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就能获得自由，重新率领印刷工人投入斗争了，但他没能等到那一天，就在狱中去世了，享年三十八岁，终生独身。

他的一生，是为工人阶级奉献的一生。特别是在战争期间，他可以说是坚决彻底地进行了反对战争的抵抗运动。在中国、东南亚、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各国，被占领国家的国民拿起武器，组成抵抗组织，同占领者进行了斗争。战后，这些国家依然在传颂这段光荣的历史。

而日本并没有被占领，却是侵略其它国家的基地。在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下，高举反战旗帜的先锋党被打垮了，残余的反战活动也被逐一扑灭，力量变得非常弱小，因此，日本的抵抗斗争仅限于通过散发反战传单、张贴地下标语、口口相传等方式，呼吁国民反战；或是用消极的方法，比如故意让自己得病或潜入地下，来躲避征兵。在这种形势下，柴田直到最后仍在守护工人的组织，一点一点地培养出了

许多反战分子，并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监狱里，看守的数量越来越少了。剩下的都是部长级的看守，由于战况不利，他们一天比一天歇斯底里。

由于寒冷和营养不良，我两手的手背上生了冻疮，肿得很厉害，我就请巡诊的看守开点药，他就骂我：“你们这些卖国贼还想开药！在前线战斗的士兵都没有药呢。美国马上就要登陆了。到时候就先杀光你们，我们再自杀。还要什么药呢！”但是，有个囚徒每天都带我和田口去锻炼，他毫不隐瞒地对我们说：

“我跟你们说啊，就连七万二千吨的武藏号³³²都被击沉了，听说塞班也失守了³³³，这样一来台湾和冲绳也守不了多久了。就连联合舰队也不知跑哪儿去了³³⁴。东条也不干了，这下子日本也要阿弥陀佛了。到时候你们就能出去了。你们还算运气好的，我们可就没那么好运了。”

听了他的话，我才知道东条辞职了。接二连三的败仗、生活水平的严重恶化、化作焦土的国土——这一切自然使国民抛弃了东条。终于，在塞班失守后，他便趁机辞职了。

日本吃了一连串的败仗，深陷于战争之中，无法自拔了。虽然祈求老天爷刮起“神风”，却无法上达天听，那就只好自己来制造“神风”吧。他们企图用带给美国人恐怖和羞辱的“自杀飞机”——神风

³³² 武藏（武藏/むさし）号战列舰是大和级战列舰2号舰，标准排水量65000吨，满载排水量72809吨，1938年3月29日动工，1940年11月1日下水，1942年8月5日服役，1944年10月24日在莱特湾战役中被击沉。——中译者注

³³³ 1944年6月15日，美军向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塞班岛发动进攻，7月9日攻占该岛，导致东条英机内阁于7月18日总辞职。——中译者注

³³⁴ 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与航空兵主力在1944年10月20日至26日的莱特湾海战中基本被消灭。——中译者注

特攻队来挽回战局。

随着美国对日本本土的空袭日益激烈，俱乐部会员的主要活动地区——中小微工厂密集的芝、京桥、神田在战火中几乎全部化为灰烬。

印刷业的大工厂也损失惨重，凸版印刷的下谷工厂在三月十日的空袭中被彻底烧毁，位于板桥区的志村工厂中了 B-29 轰炸机的燃烧弹弹雨，然而，留在厂里保卫工厂的工人，尽管他们的家也在燃烧、家里什么东西都被烧光了，但他们还是拿起消防水龙、灭火掸子（火叩き）和水桶，在工厂里面跑来跑去，或是爬上屋顶，扑灭了火灾。在四月十三日的空袭中，东京书籍也烧起了大火，为了保卫自己工作的工厂，许多工友涌向公司，拼命用水桶灭火，尽管王子站周围已经被烧成一片焦土，但他们却成功守住了东京书籍的建筑物。共同印刷被炸弹直接命中，彻底毁灭。大日本印刷的榎町工厂也被摧毁了。图书印刷（当时叫帝国印刷）也在五月二十五日的空袭中被彻底烧毁，尽管工人直到最后仍在努力保卫工厂，拼命灭火，但还是没能保住。第二天早上，工人茫然地站在废墟上，但他们很快就振作起来，从废墟中收集用来铸造活字的铅块。虽然还不知道这些东西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派上用场，但工人全都在拼命地保护自己赖以生息的地方。

三月十日，美军发动了东京大空袭。由于美军实行了无差别地毯式轰炸，在这一天，仅在空袭中就有二万六千所房屋被烧，十万人被烧死。下町³³⁵的损失特别严重，因为那里的木制房屋非常密集，柴田、田口、我以及许多俱乐部会员所居住的深川（现属江东区）、本所（现属墨田区）被彻底夷为平地。在那一天的空袭中，我们三人的家都被烧毁了。

我的妻子西田在这次空袭中丧生。空袭造成的损失有多么严重，可以从被收容埋葬的遗体的数量看出来：在锦丝町公园有一万三千

³³⁵ 下町（したまち）一般是指城市中平民聚居的工商业区域。东京的“下町”大致包括日本桥、京桥、神田、下谷、浅草、本所、深川等地。——中译者注

具，在隅田公园有四千九百具，在上野公园有八千四百具，等等³³⁶。

柴田的母亲和妹妹静江³³⁷幸免于难，她们搬进了设在没有被完全烧毁的江东乐天地³³⁸里的难民营。坂村和白石就赶紧去找她们。白石住在立石³³⁹那边的叔父家里，由于那一带躲过了战火，他就把她们接到叔父家去住。后来，杉浦的两个妹妹也住进了白石叔父家。

跟山本结了婚的水野也担心他们，就找到立石去了。当时我们还在狱中，对这一切自然毫不知情。

四月里的一天，教诲师叫我过去一趟。戴着高高的斗笠的看守押送着我，朝监狱里的教堂的方向走去，但是，我却被带到了教堂前的一栋小楼。那里有个四十岁左右的僧人，正是教诲师。他让我坐在椅子上。我摘下斗笠后，教诲师对我说：

“虽然很突然，但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讲。你岳母拜托我，无论如何都要转告你。在三月十日的东京大空袭中，你的妻子身亡了。她虽然跟你岳父一起躲空袭，路上却跟你岳父走散了，躲到了附近的东川小学，就在那里中了炸弹。这件事本来应当由你岳母亲口跟你讲的，但她悲不自胜，只好拜托我转达。这只能说是人各有命。请节哀顺变，保重身体。我请你过来，就是要转告你这件事。”

我只觉得浑身的血好像一下子被抽干了，差点昏了过去。原来这就是收不到她的信的原因。就在这段时间里，柴田死了，现在妻子也死了，在物资匮乏的战争时期，她生下了孩子，在惨烈的空袭间隙抚

³³⁶ 《昭和五十年史文档》，第4卷，第140页。——原注

³³⁷ 战后参加了晓印刷的建设。——原注

³³⁸ 东京乐天地（東京楽天地/とうきょうらくてんち）是东京墨田区的一家综合娱乐设施，1937年2月27日设立。——中译者注

³³⁹ 立石（たていし）是东京葛饰区的一个地名。——中译者注

养还没断奶的孩子，还到监狱来看我，给我送东西，不停地鼓励我，现在连她也死了。看着我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教诲师连声安慰我。

我一边向教诲师道谢，一边回到走廊，我不禁潸然泪下，为了不让别人看见，我迅速拉低斗笠遮住脸。我跟在看守后面走着走着，觉得这走廊怎么这么长，怎么走也走不完。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我走向单人牢房时，天空十分晴朗，明明是战争期间，监狱的院子里，樱花却在盛放。

在那段时间里，横滨也遭到了空袭和舰炮轰击，而且越来越严重。到了五月，由于空袭十分频繁，市内各个警署接连不断地把拘留所里的在押人员运过来，挤满了监狱。监狱里都能听见炸弹爆炸的声音，有好几次，我的牢房的门都没上锁。

出狱之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快就要结束了。美军攻占了硫磺岛，并开始冲绳登陆。然而，军部仍然不肯认输，高呼“一亿玉碎”，强迫国民进行竹枪训练，准备进行本土决战。

然而，实际的战况，却比狱中的我们好不容易得知的情况更加糟糕，再这样下去，日本必定战败。

在日本战败的那一天，包括我在内的大量政治犯是如何迎接战败的，我已经在本书开头讲述过了，所以这里就不再赘述。

从那时起，我每天都通过手语，跟对面牢房里的人交谈。一有新的囚徒进来，都会带来新的消息。不管我们怎么质问杂役，他们还是什么都不肯说。饭菜里的“大餐”虽然变多了，但完全不给我们出去锻炼。以前拿到的书全部被收回了。每天都无所事事，这样无聊的日子过了半个月左右，终于能够出去锻炼了。在带我们去运动场的路上，杂役无所顾忌地说了很多话：

“大家爱跟谁聊就跟谁聊吧，反正日本都输了。昨天我去了樱木町³⁴⁰，看见好多美国兵，还有黑人。那边的妞儿呀，变得可厉害啦。扎腿套裤什么的都不穿了，都穿短裙子，一弯腰，屁股都露出来啦。真想快点出去啊。”

大家都被他的话给逗笑了。他还骂监狱的看守，说他们刚一战败，就把牢里的东西、服刑人员的米、味噌，还有衣服、药品什么的，统统往自己家里搬，“他们才是真正的大盗，等我出去了，一定要告他们。”

正在饱受疥疮之苦的我听了这话，才确信自己一定能出去。

很久没有收到信的我，接到了妹妹的来信。信上说她知道我要出去了，但什么时候能出去还不知道，所以叫我把出狱的日子告诉她，她好过来接我。但是，就连我们自己也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去。

有一天，我们这些被关在单人牢房里的囚徒被集中到一个地方，狱方大方地把海军用的优质麻绳发给我们，还教我们怎么编草鞋。大伙谁也没有说出口，但是心里都在猜测，这种草鞋应该就是释放时穿的“回家草鞋”，所以大家都很振奋。我怀着强烈的期待，用心地编了两双草鞋。然而，狱方好像并不想释放我们。我们得知，司法大臣和内务大臣发表了声明，说还没有考虑释放政治犯。我和田口渐渐地觉得没戏了，看来不服完刑期是出不去了。

可是，盟军对日本的统治，正在顺利地进行。

于是，就像本书开头讲过的那样，到了十月六日，我们终于获释了。那一天，我真是百感交集。我最先想到的是柴田，还有我的妻子。我心里充满了这样的念头：柴田只要再挺过半年，就能跟我们一起出狱了。

³⁴⁰ 樱木町（桜木町/さくらぎちょう）是横滨市的一个地区。——中译者注

那一天，我和田口两人站在横滨站，留着和尚头，穿着被捕时穿的浴衣³⁴¹，腋下夹着包袱，别人一看就知道我们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我们看见，白皮肤、黑皮肤的美国士兵靠在车站的栏杆上大声说话，而在他们面前，穿着有些脏污的士兵服的日本人全都背着帆布背包，默不作声地走来走去，这副景象让我们大吃一惊。

我和田口在有乐町³⁴²站下了车，然后就去田口家，他家在京桥，侥幸没被全部烧掉，全靠他父亲艰苦维持，在他家里，我们与很久没有见面的田口的父亲重逢了。

四天后，也就是十月十日那天，以日本共产党的德田球一为首的大批政治犯被府中预防拘留所³⁴³释放了。日本的民主化运动的潮流开始奔涌起来了。

第二天，我到船桥市去，拜访了我姐姐家，从她那里得知，我母亲被疏散到了千叶县柏市附近的逆井乡下，我问她要了地址，然后去拜访了母亲。我母亲比我想象的还要健康。

一周后，我要到静冈的亡妻老家去见我的独生女，我跟逆井站的站长说明了自己的情况，才买到车票上了火车。车上挤得要死，连坐的地方都没有，车窗也破了，乘车的人大多是去买东西的，要不就是做黑市买卖的。

我在妻子的老家见到了岳父和岳母。岳父向我道歉，说他没能在我坐牢的时候保护好女儿。然后，他把一个小小的女孩子交给我，让我抱住她。

我忍不住嚎啕大哭。然后我想：“日本明明是有工会的，可是为

³⁴¹ 浴衣（ゆかた）是一种较为轻便的和服，用于夏季期间穿着。——中译者注

³⁴² 有乐町（有楽町/ゆうらくちょう）是东京市千代田区的一个町。从有乐町到京桥的距离很短。——中译者注

³⁴³ 此处有误，应为“府中监狱”（府中刑務所/ふちゅうけいむしょ）。府中监狱建于1790年，1903年改称巢鸭监狱，1935年迁往东京府府中町，改称府中监狱。——中译者注

什么没能阻止战争呢？”

第十四章 播下的种子有了收获

俱乐部会员们站起来了

鲁莽轻率的战争终于结束了。对统治者来说，这是黑暗的战败，但对自从明治时期以来一直生活在天皇制下的黑暗时代的大部分劳动人民来说，终战意味着从暴政中解放出来。大多数国民并不知道前面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他们，但他们能够确定的是，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光明的、让人能活得像人样的世界。

就好像回应了这种期待似的，社会发生了快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这种变化的速度，比和平时期要快上几十倍。日本被盟军——实际上是美军——占领后，日本的军队被解散了。《关于民权自由的指令》（民権自由に関する指令）于十月四日发布后，政府不得不释放了以共产主义者为首的全部政治犯，我们也包括在内。让我们吃尽苦头的特高警察，也在这个时候被废除了。根据这个指令，《治安维持法》、《军机保护法》³⁴⁴等限制言论、出版、集会、宗教、思想的自由的镇压性法律，也都被废止了。

然后是解散财阀、农村土地改革、神道教与国家的分离、停止使用战前的历史、地理和修身³⁴⁵教科书、对军国主义者进行“公职追放”等等，对诱发战争的原因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改革。

³⁴⁴ 《军机保护法》（軍機保護法/ぐんきほごほう）是为了保护军事机密而设立的法律，1937年8月14日发布施行。——中译者注

³⁴⁵ 修身（しゅうしん）是日本战败前的一门小学课程，1890年设立，其作用是向学生灌输帝国主义思想道德，1945年废除。——中译者注

另一方面，还发布了一连串的法律，包括《工会法》³⁴⁶在内，保障了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

这一切都是国际民主势力联合起来战胜了法西斯阵营的结果，也使身处日本的我们获得了自由。

当前形势对全体俱乐部会员——被监禁在狱中的俱乐部会员，一边照顾饱受战火之苦的家人、一边继续进行细致的救援活动的俱乐部会员，被征兵后送往战场的俱乐部会员，被工厂征用的俱乐部会员——提出了两个任务：

第一、重建工会运动，首先是把印刷出版工人给集结起来，但不是单纯的集结，而是要继承柴田所属的全协的精神，从阶级立场出发，在各个产业中重建全国性的产业工会组织。第二、建设印刷所，印刷日本民主化的武器——先锋党与民主团体的机关报，这是只有印刷工人才能完成的任务。为此，必须尽可能地集结进步的印刷工人。

散落各地的家人重新聚在一起生活后，我又向京桥的田口家走去。中小微印刷工厂密集的京桥，正是重新开始活动的绝佳场所。

有一天，我在那里与中岛良助重逢了。中岛对我说：“你们受苦了，你们不在的时候，我们什么也没做成，实在对不起。”但他并不是什么也没做成，我们不在的时候，他代替了我们，不断地鼓励被捕者的家属，努力维持横向联络。田口和我马上着手把京桥一带的印刷工人给集结起来。我们俩还找到了已经合法化的日本共产党，一起入了党。此时，工人已经开始在工厂里成立工会了。艰苦的战争结束了，然而，由于资本家破坏生产和激烈的通货膨胀，工人连填饱肚子都做不到。成年男子一天只能领到二合大米³⁴⁷的配给粮，根本无法维持生

³⁴⁶ 《工会法》（労働組合法/ろうどうくみあいほう）于1945年12月22日发布，它是“劳动三法”（《工会法》、《劳动关系调整法》、《劳动基准法》）之一。——中译者注

³⁴⁷ 二合大米略少于300克。——中译者注

活，工人只好到处采购粮食。可是工人的工资很低，根本没有钱，完全无计可施。当时有个凸版印刷的工人说过：

“我把正在用的被子里的棉絮掏出来，做成丹前³⁴⁸，到乡下去换了大米，才能让孩子们吃上三天的馊饭³⁴⁹。”

许多人迫于生计，为了填饱肚子，只好去当黑市商人或货郎。物价飞速上涨，忍无可忍的工人就陆续成立了工会，自发地开展了保卫生活的斗争。终战那年的十二月四日，凸版印刷的工人为了争取加薪而成立了工会。大日本印刷的工人也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成立了工会，图书印刷的工人也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成立了工会。客观形势要求全国印刷工人集结起来。

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关东工厂代表会议（関東工場代表者会議）在芝田村町³⁵⁰的飞行会馆召开了，我和田口作为京桥的中小印刷企业工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我们在会上遇见了大日本印刷工会的铃木登、凸版印刷工会的矢沼光吉、共同印刷工会的谷口圭一。那一天，在关东地方工会协议会（関東地方労働組合協議会）的帮助下，我们就成立涵盖整个印刷产业的工人组织的问题，畅所欲言地交换了意见。当时，民主化浪潮正在惊人地高涨。各个产业的工人都在成立产业工会。而我们也就召开印刷产业工会的成立筹

³⁴⁸ 丹前（たんぜん）是一种宽袖棉袍，里面嵌有厚棉絮，一般用来套在和服外面穿。——中译者注

³⁴⁹ 《凸版印刷工会十年史》。——原注

原文说的“馊饭”，是指大米已经煮熟并且变馊了，这可能是为了省油，大米已经全部煮成了饭，但是，由于没有冰箱，搁了三天，饭已经开始发馊了。由于当时粮食很难入手，费了很大劲才搞到，能有馊饭吃都不错了。——英译者注

³⁵⁰ 芝田村町原是芝区的一个地名，1947年随芝区并入港区。——中译者注

备会达成了一致意见。

大日本印刷工会的办公处被选为筹备会的会场。开过几次筹备会后，决定在筹办过程中不仅要向印刷工人的工会、而且也要向出版工人发出呼吁，于是向出版界的强大工会和志同道合者发出了呼吁。岩波书店³⁵¹、主妇之友³⁵²、东贩³⁵³、日贩³⁵⁴等企业的工会也参加了筹备会。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一年）四月七日，以印刷工人和出版工人为主的全国组织——全日本印刷出版工会（全日本印刷出版労働組合，简称“印刷出版工会”）成立了，它组织起了一万五千名工人。在大日本印刷的讲堂里，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大日本印刷工会的铃木登被选为首任委员长，凸版印刷工会的矢沼光吉和文寿堂工会的清野被选为副委员长，出版界的松本慎一³⁵⁵被选为书记长，田口被选为执行委员，我被选为常务书记。在当天的成立大会上，我们原本邀请了新

³⁵¹ 岩波书店（岩波書店/いわなみしよてん）是日本一家老字号出版社，于1913年8月5日成立于东京市神田区，创始人是岩波茂雄（1881—1946），该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的学术书籍，还发行了岩波文库与岩波新书，对文化的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1949年4月25日改为株式会社。——中译者注

³⁵² 这里是指出版月刊《主妇之友》（主婦の友/しゅふのとも）的出版社“主妇之友社”。该出版社由石川武美（1887—1961）于1916年9月18日创立，原名“东京家政研究会”，1917年创办《主妇之友》杂志，1921年5月改名为“主妇之友社”。2008年《主妇之友》停刊。但“主妇之友社”仍然继续开展图书出版业务。——中译者注

³⁵³ 东贩，全称东京出版贩卖（東京出版販売），其前身是1941年5月5日成立的日本出版配给株式会社，1949年9月19日改为东京出版贩卖株式会社，1992年改称东贩株式会社。——中译者注

³⁵⁴ 日贩，全称日本出版贩卖株式会社（にほんしゅっぱんはんぱい），1949年9月10日从日本出版配给株式会社中分离出来，现在与东贩并称日本两大出版公司。——中译者注

³⁵⁵ 松本慎一（松本 慎一/まつもと しんいち、1901年11月8日——1947年11月26日），生于爱媛县，毕业于东京大学，曾在三省堂工作。1932年参加日本共产党，1934年被捕。战后出任全日本印刷出版工会书记长。——中译者注

剧³⁵⁶的演员表演我们印刷工人的骄傲——描写共同印刷罢工斗争的《没有太阳的街》，但是，有人提议去加入同时举行的“讨米游行”³⁵⁷，代表们情绪高涨之下，同意了这个提议，所以只好取消上演。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挺抱歉的。

参与创立产别会议

印刷出版工会成立后，东京都内各工厂以及横滨、京都、岐阜等地都向我发来了联络的请求。仍然保留着出版工俱乐部会籍的会员们原先被疏散到了各地，他们现在一马当先，率先在各自的地方成立工会。

小宫退役后，回到了老家京都，进入了大日本印刷的京都工厂工作，并担任了那里的工会的委员长，后来又当上了京都产别副议长。

印刷出版工会的筹备工作，与在战后日本工人运动当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全日本产业工会会议（简称“产别会议”）的筹备工作是同时进行的。我也参加过几次产别会议的筹备会，为它的成立出过一份力。

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二年）八月，产别会议成立了，它拥有二十一个单一产业工会和一百六十二万会员，然后它就发动了大规模的

³⁵⁶ 新剧（新劇しんげき）是指在题材和表演等方面向近代欧洲戏剧靠拢的日本戏剧，与旧剧（歌舞伎）、新派相对立。兴起于明知时代末期，与无产阶级戏剧运动关系较为密切，在三十年代中期遭到当局镇压，二战后重新兴盛起来。这里是指参加新剧运动的剧团。——中译者注

³⁵⁷ 二战结束后，由于粮食供给状况严重恶化，粮价暴涨，各地群众纷纷举行“讨米大会”和“讨米游行”（米よこせデモ），要求提供粮食。1946年5月19日，日本共产党在皇宫前举行了“饭米获得人民大会”，抗议政府的粮食配给工作不力，号称“粮食五一节”（食糧メーデー），在运动的最高潮时，参加者高达二十五万人。——中译者注

斗争。全日本印刷出版工会是产别会议的核心，它在一九四六年响应了国铁、海员的反裁员斗争，以东京为中心，毅然发动了争取“缔结统一劳动协议”的总罢工，通过整齐划一的罢工，赢得了胜利。在此期间，为了开展活动，我和田口都在没日没夜地四处奔走，顾不上跟俱乐部会员联络了。

另一方面，重建后的日本共产党在战后重新发行《赤旗》，但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压力下，原先承印《赤旗》的那家印刷所不愿印了，所以共产党非常需要建立自己的印刷所。太田庆太郎³⁵⁸、松本一三³⁵⁹等共产党干部便向出版工俱乐部的会员们求助。失业中的白石便欣喜地接受了这个光荣的任务。参加这项工作的俱乐部会员有白石、佐藤操、渡边武、藤坂房雄，不久后，柴田静江、山本广次、大户匠、松仓二郎等人也参加了。由白石奠定基础的“光印刷”（ヒカリ印刷），后来发展成了“晓印刷”（あかつき印刷）。

在这个过程中，白石发扬了出版工俱乐部时期的阶级性和组织性，不顾自己正在受到侵蚀的病体，为晓印刷的发展和全国的民主印刷所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培养了许多的后辈。一九五九年（昭和三十四年）十一月八日，他在东京女子医科大学医院因癌症去世，结束了四十八年的生涯。

然后，俱乐部会员当中，关口、岩田、佐藤、皆叶要³⁶⁰等人参加

³⁵⁸ 太田庆太郎（太田 慶太郎/おおた けいたろう，1906年3月8日——1989年3月22日），1921年毕业于开成中学后，考入东京大学。1927年当选为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中央委员，1928年参与创立解放运动牺牲者救援会，并担任首任书记。1946年担任《赤旗》经营局长。——中译者注

³⁵⁹ 松本一三（松本 一三/まつもと かずみ，1907年8月27日——1988年6月16日），生于静冈县沼津市，1931年考入天理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1933年参加日本共产党，曾活跃于全协和共青，同年被捕，被判处四年徒刑。战争期间再次被关押。战后参加了共产党的重建工作，担任过《赤旗》编辑局长、日共中央委员等职务。——中译者注

³⁶⁰ 战后当过光阳印刷工会委员长。——原注

了民主印刷所“光阳印刷”；铃木喜久治³⁶¹、青山、竹入等人参加了“日本机关报印刷所”。佐藤次雄后来当上了民主经营的“神奈川机关报印刷”社长，一九七九年（昭和五十四年）初去世。

在日本的民主印刷所内部，是如何评价出版工俱乐部会员所起的作用的呢？在一九七七年（昭和五十二年）十一月³⁶²举行的出版工俱乐部纪念碑揭幕式上，晓印刷株式会社专务渡边进发表了贺辞，他在贺辞中说道：

“（前略）镌刻了战前、战后日本印刷出版工人的不灭的斗争历史的出版工俱乐部纪念碑，现在已经出色地树立并盛大地揭幕了，在此，我谨代表全国所有阶级的、民主的印刷所，向它献上衷心的祝贺。

“现在，以印刷工会、民主团体的宣传品——也包括我们日本共产党的以机关刊物为主的所有印刷品——为主要业务的印刷所，北起北海道，南至冲绳，一共有十三个工厂。在这些工厂里工作的工人有一千五百多人。同时还拥有三十多台高速报纸轮转印刷机，此外还拥有近代工厂所应有的一切设备。（中略）

“我们深信，我们民主印刷所能在战后三十年的历史中取得如今这样巨大的飞跃和发展，不仅要归功于以日本共产党为首的工会、民主团体的强有力的鼓励与支援，也要归功于出版工俱乐部的诸位前辈，他们顶着战前的不断镇压，保存了印刷出版工人的斗争的一丝火种，把他们的革命传统和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传承给了战后诞生的光印刷，洒下了全

³⁶¹ 战后当过全日本新闻广播工会（全日本新聞放送労働組合）执行委员。——原注

³⁶² 原文为“一月”，但这与上下文不符，因此改为“十一月”。——中译者注

国的民主印刷所的星星之火。

“战后，以田口、杉浦等人为代表的俱乐部会员们，把全部精力献给了工人运动，像已故的白石和藤坂等人那样，为了创建和发展光印刷、晓印刷、光阳印刷，把人生和热情都献给了保障日本共产党和民主势力的机关报刊的印刷的工作，对此我们将会永远铭记心中。

“直截了当地说，全国的民主印刷所都是从光印刷中诞生和培育出来，发展成为今天这样强大的力量的，这样说是毫不为过的。

“光印刷的创始期是非常艰苦的，充满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苦难，然而，在这种状况下，不图回报、只是默默地捡活字、操作排字盘、为《赤旗》组版和拆版的人，正是出版工俱乐部的会员们。我也是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以见习工的身份进入光印刷工作的，然后就一直工作到了现在，正是因为诸位前辈的教导，才有了今天的我。

“今天，我们要深刻地理解自己肩负着何等重大的任务与责任，还必须切实地继承白石和出版工俱乐部诸位前辈的革命气概与传统，怀着为印刷所的发展与前进而更加努力奋斗的决心，我坚信这座纪念碑将会把这一切，永远地传承给我们的同伴与子孙，特此祝贺。”



由野坂参三题词的出版工俱乐部纪念碑（1977年11月）

一九四八年（昭和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在为了纪念柴田隆一郎的忌日而举行的出版工俱乐部会员年度例会上，我提议解散俱乐部。我记得提案包括以下内容：

“柴田曾与我们一同期盼的出色的产业工会，现在已经成立了，它就是全日本印刷出版工会，我们不能让出版工俱乐部的存在妨碍了它。从今以后，就让我们发扬俱乐部的精神，在各自的领域中大显身手吧！”

这个提案被全体出席者一致通过，出版工俱乐部就此解散。

正如前文所述，在战时法西斯主义的镇压下，日本的工会全军覆没了，尽管如此，出版工俱乐部仍然保卫了组织，没有让印刷出版工会的血脉就此断绝。在全印总联³⁶³为了教育会员而制作的相册《印刷

³⁶³ 全日本印刷出版工会于1953年改组为全国印刷出版产业工会总联合会（全国

出版工人在前进》（前進する印刷出版労働者）中，编制了印刷出版工会一百年来的系谱，俱乐部在这个系谱中得到了应有的位置。

附注：出版工俱乐部的活动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他们有的是怀着阶级觉悟来参加活动的，有的则没有阶级觉悟、而仅仅是出于正义感才参加活动的。其中有很多人在斗争中牺牲了。以下是他们的姓名：

青山智司、内田光敏、小泉孝一、坂村义雄、佐藤次雄、柴田隆一郎、柴田都纪、柴田伊纪³⁶⁴、柴田一郎、柴田政子、白石光雄、岛田安门、杉浦富子、南云富吉、藤坂房雄、福田荣司、八木宗一

对我们来说，这些名字都是非常令人怀念的。为了缅怀他们，也为了铭记出版工俱乐部的功绩，一九七七年（昭和五十二年）十一月六日，以俱乐部老会员为中心，在全印总联、出版劳联³⁶⁵、全国的民主印刷所的协助下，在柴田、白石曾长时间居住过的立石附近的东京都葛饰区乘愿寺里，树立了一座由日本共产党议长野坂参三题词的出版工俱乐部纪念碑。

（中译者补注）碑文如下：

一九三五年元全協労働組合員柴田隆一郎及白石光雄を中心に、印刷出版労働者の親睦を目的として和工会を設立、一九三七年出版工クラブに改組、戦時下弾圧のきびしい中で、東京都内百余工場に

印刷出版産業労働組合総連合会），简称“全印总联”。——中译者注

³⁶⁴ 这两人的原名分别是“柴田トキ”和“柴田イキ”，名字都是用片假名书写的，所以只能找出读音相符的汉字替换上去。——中译者注

³⁶⁵ 日本出版工会联合会（日本出版労働組合連合会），简称“出版劳联”，成立于1953年4月，原名“出版工会恳谈会”（出版労働組合懇談会），1958年3月改称“日本出版工会协议会”（日本出版労働組合協議会），1975年7月改称“日本出版工会联合会”。——中译者注

一、五〇〇名の会員を組織す、一九四〇年日本の労働組合はすべて官製組織産業報国会へ吸収さる、出版工クラブはこれに抗し非公然活動を通じ印刷出版労働者の生活と権利擁護、戦争反対の闘いを展開、一九四一年特高警察に探知され多数逮捕、三名投獄、一九四五年二月柴田は非転向のまま獄死、終戦後クラブ員は全日本印刷出版労働組合結成と、民主的印刷所の基礎を作るため努力、一九四七年出版工クラブはその任務を果たし解散す。

ここに碑をつくり永く記録する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

一九三五年，在前全协工会会员柴田隆一郎与白石光雄率领下，印刷出版工人成立了以友好互助为目的的和工会，一九三七年，它改组为出版工俱乐部，在战时的残酷镇压下，它在东京都内一百多个工厂发展了一千五百名会员，一九四〇年，日本的工会全部被强行并入御用组织产业报国会后，出版工俱乐部通过地下活动对此进行反抗，开展了保卫印刷出版工人的生活与权利、反对战争的斗争，一九四一年被特高警察查获，多人被捕，三人下狱，一九四五年二月，坚贞不屈的柴田庾死狱中，终战后，俱乐部会员为了成立全日本印刷出版工会、为了给民主印刷所奠定基础而努力斗争，一九四七年，出版工俱乐部在完成任务后解散。

特此立碑，永久纪念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



出版工俱乐部纪念碑

一九三五年元全協労働組合員柴田隆一郎及白石光雄を
中心に、印刷出版労働者の親睦を目的として和工会を設
立、一九三七年出版エクラブに改組、戦時下弾圧のきび
しい中で、東京都内百余工場に一、五〇〇名の会員を組
織す、一九四〇年日本の労働組合はすべて官製組織産業
報国会へ吸収さる、出版エクラブはこれに抗し非公然活
動を通じ印刷出版労働者の生活と権利擁護、戦争反対の
闘いを展開、一九四一年特高警察に探知され多数逮捕、
三名投獄、一九四五年二月柴田は非転向のまま獄死、終
戦後クラブ員は全日本印刷出版労働組合結成と、民主的
印刷所の基礎を作るため努力、一九四七年出版エクラブ
はその任務を果し解散す。

ここに碑をつくり永く記録する。

一九七七年二月

碑文

日文第二版后记

在上次战争中，日本的天皇制政府和军部对战斗工会进行了彻底的镇压，打垮了它们，让右翼工会干部篡夺了领导权，迫使工会配合战争政策，最后就连这些组织也全部被解散，当局炮制了御用组织产业报国会，逼迫工人和国民协助战争。这在日本工人运动的历史上，被认为是完全没有工人运动的时期。

然而，就是在这种形势下，首都东京的印刷出版工人仍然在特高警察的眼皮底下，维持了组织，顽强地继续开展活动，尽管多次遭到镇压，领导层也最终下狱，但组织还是维持到了战后。本书记载的就是当时的斗争。

我为什么要在现在这个时候写这本书呢？因为我认为，现在的形势，跟昭和初期，日本猛然冲向战争之前的形势非常相似。

最近，统治阶级企图把劳动人民再次推向战争的动向，变得越来越露骨了。

美国逐渐地加强了对日本施加的压力，要求日本强化军力。在这种压力下，出现了露骨的要求修改宪法中的和平民主条款、允许自卫队出兵海外的动向。此外，自民党的金主财经界也在配合美国的要求，声称应当解除对武器的制造和输出的禁令、增加军费、修改宪法、考虑征兵制等等，铃木内阁³⁶⁶体察了这些意向，不顾财政危机，在编列昭和五十六年³⁶⁷的预算时，对军费特别处理，给全部战斗机配备了空对空制导导弹，让主要舰队装备了鱼雷，还特意在八月十五日终战纪

³⁶⁶ 即 1980 年 7 月 17 日至 1981 年 11 月 30 日的铃木善幸内阁。——中译者注

³⁶⁷ 即 1981 年。——中译者注

念日那天，举行大规模图上推演，并让以首相为首的十八名阁僚大举参拜靖国神社，现任法务大臣³⁶⁸还发表了否定宪法的言论，此外还有多个地方议会在自民党的怂恿下，有意识地通过了支持“修宪”、支持制定保密法的决议，等等；这一切表明日本正在一路奔向军国主义。

在这种形势下，最重要的是革新势力必须统一起来，阻止这种反动趋势，然而，社会党却堕入了社公民路线³⁶⁹，抛下了反对安保³⁷⁰的旗帜，容许了自卫队，率先在各地破坏革新统一战线，在劳动战线上，总评³⁷¹领导层决心按照右倾路线重整劳动战线，走向了容许美国、财经界和自民党的阴谋的道路。

³⁶⁸ 即奥野诚亮（奥野 誠亮/おくの せいすけ，1913年7月12日——2016年11月16日），生于奈良县御所市，毕业于第一高等学校，1938年3月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政治系，同年4月进入内务省工作。二战期间担任鹿儿岛县警察部特高课长。二战后转入自治厅工作，历任自治厅税务部长、自治厅税务局长、自治厅财政局长，1963年7月担任自治事务次官，同年10月弃官从政，代表自由民主党参加众议院选举，并成功当选，此后连续当选13次众议员。在政治上属于保守派，主张修改宪法和参拜靖国神社。1972年出任文部大臣，1980年出任法务大臣。1987年出任国土厅长官，1988年5月9日因发表了否认侵略战争的言论而被迫辞职。——中译者注

³⁶⁹ 在六十年代后半期到七十年代前半期，以日本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为主的革新势力经常在地方选举中缔结“革新势力统一协定”，日本社会党还曾打算建立包括日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权，但在1969年大选中却遭到了惨败，以江田二郎（1907—1977）为首的社会党右派便趁机鼓吹同公明党、民主社会党建立统一战线，争取成立既不包括自民党也不包括共产党的联合政权。这就是所谓的“社公民路线”，它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成为了社会党的主流思想。1980年社会党与公明党缔结共建联合政权的协议（通称“社公合意”）之后，社会党便彻底同共产党决裂了。——中译者注

³⁷⁰ 安保，即《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日米安全保障条約）。——中译者注

³⁷¹ 总评，即“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日本労働組合総評議会/にほんろうどうくみあいそうひょうぎかい），它是日本最大的全国性工会中央组织，1950年7月12日成立。总评长期奉行支持日本社会党的方针。1989年11月解散，改组为日本工会总联合会（日本労働組合総連合会/にっぽんろうどうくみあいそうれんごうかい）。——中译者注

在那场可恶的战争期间，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支持由政府、军部发动的侵略战争，打着反资本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反共产主义的“三反”纲领，实际上却只进行反共行动，抛弃了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把劳动人民引上了战争道路，而现在这种情况，跟当时其实非常相似。我们现在坚决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我想通过介绍出版工俱乐部这个团体的活动，来让世人明白：在上次战争中，我们工人阶级陷入了怎样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工人的活动又是多么的重要，我就是为此而编写本书的。

如果这本书能让很多人学到一些东西，那我将感到无比荣幸。

在搁笔之前，我还要申明几点：

1. “出版工俱乐部”的正式名称是完全使用汉字书写的，但在前文讲过的征集到了“好人、好技术、好俱乐部”这个口号后，出于方便、亲切、好写等理由，在会员当中使用汉字与片假名混用的“出版工クラブ”的写法，书中也都采用这种写法。
2. 出版工俱乐部的导师柴田隆一郎，在户籍上的姓名是柴田隆一。但他不管对谁都自称柴田隆一郎。考虑到这一点，本书采用柴田隆一郎这个名字。
3. 为了使读者了解出版工俱乐部的会员战后在各个领域中的活动，在会员的名字后面标注了他们担任过的代表性职务³⁷²。
4. 书中出场人物的姓名，均省略了敬称，仅在引用的受访者的谈话中保留。如有失礼，还请多多包涵。

³⁷² 中译者将其移入了尾注之中，并标上了“原注”。——中译者注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还参考了与三十二名前俱乐部会员的对话。另外还引用了下列书籍：

历史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东洋经济新报社）

《与赤旗在一起》（白石光雄追悼文集刊行委员会）

《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

内务省警保局编《社会运动的状况》（三一书局）

《昭和五十年史文档》（汐文社）

特此向各位有关人士致以深深的谢意。

一九八一年二月

作者

访问杉浦正男先生

2016年5月，凯·布罗德本特到船桥市拜访了本书作者杉浦正男先生。当时他已经102岁高龄了。下文就是根据这次采访整理的，采访的原稿由结城宽子（Yuki Hiroko）抄录，并由凯·布罗德本特译为英文。

1960年，我们这些俱乐部老会员写了本书的第一版，目的是为了纠正这样一种观点：在战争期间，日本的工会被全部消灭了。写完之后，有人建议我们加入更多细节，重新出一版，并将其公开出售。所以我们就出了第二版。

有人说，战争期间，日本没有工会运动，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们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抵抗。这种错误说法为什么能流传这么久呢？当时日本统治阶级对我们进行了严酷的镇压。那时出版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也能在书店里买到。买书和读书是允许的；但是，成立读书会，或是进行集体行动，就会被抓起来。当时的气氛就是那样子的。

明治维新后，日本有了宪法，在宪法中，天皇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国家的财富属于天皇，国民都是他的奴仆。“富国强兵”成了基本国策，老百姓累死累活，成全了天皇的权力。在走向战争的过程中，发布了严苛的法律，比如1925年的《治安维持法》。天皇制成了批评不得的东西，资本主义和法律的镇压性也越来越厉害。我们那时候就是在这种气氛中进行斗争的。

体验过1930年的压抑的现实的人，都会记得日本当时的经济危机有多么严重。大部分工人，包括我们在内，都只上过六年小学。只

有皇族、军人、警察和公务员能领到国家养老金。老百姓啥也得不到。那时候的穷人只能讨饭——非常悲惨；大多数人除了上街乞讨，什么办法也没有。我们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开展活动的。

俱乐部的创始人是柴田隆一郎。柴田曾是全协执行委员，全协又是红色工会国际日本支部。那时候全协的领导层实行强硬路线，导致全协分裂成了温和派和强硬派，遭到了红色工会国际的强烈批判。这让大家全都看到了两者之间的派别斗争。

有一些像柴田这样的人，他们认为必须推动工人阶级的斗争。柴田在一家大型印刷公司当临时工，做排字的活儿。他想建立全协的下属组织。他开始寻找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先是找到了藤本³⁷³，然后是白石。他们一起办了杂志《步》，刊登工人写的诗歌、短文和小故事。这份杂志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当时的印刷业被五家大公司统治着，在神田区还有许多中小公司，俱乐部也是在那一带活动的。那时候，印刷工人大多是临时工，基本上都没有参加工会。俱乐部就是要把这些工人给组织起来。

为了把工厂里的工人给组织起来，柴田和全体同志都在拼命工作，但是，那时没有活儿可以干，他们发动的争取加薪和改善劳动条件的罢工也失败了，在军国主义气焰嚣张、镇压严酷的时期，这多少也是难免的。在罢工中，柴田集结了一批活动家，其中不少是学徒工，因为他决心要采取行动，而且他还认为，现有的工会帮不上忙。我们决心建立自己的组织——和工会，后来改组为俱乐部，而我也是参加了那次大会的活动家之一。

我们与印刷工人一起成立了和工会。在印刷业里，印刷工人也分好多种——印海报和广告牌还有传单的，印纸钞的，印书的，印英文印刷品的。一开始有大约一百人，有三十个是积极的活动家。我们搞

³⁷³ 此处与第三章中的说法不一致。在第三章中，作者说柴田找到的第一个同志是坂村义雄。——中译者注

了好多活动，但成员人数总是很难超过一百人，所以会员里头就有人对方针和活动产生了怀疑。我们发现，自己还有很多要学的，我们的团体也过于狭小，所以我们决定扩大组织。柴田警告我们，说不要去找那些自高自大的工会干部，要到我们自己的工厂里去找。他们都是了不起的活动家——为了给大家争取更好的生活，他们对学习和研究非常热心。

在镇压越来越厉害的情况下，我们在1937年正式成立了俱乐部，有两百人出席。

在学生运动当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受欢迎，他们的书有很多人读；但有人建议我们不要去找学生或知识分子，应当在自己的工厂里找人，工厂里的人比较淳朴、勇敢，而且生活也很艰苦，又没受过多多少教育。所以这就成了我们在开展组织工作时的重点和战略。

我们是一个很有包容性的组织，欢迎普通老百姓加入。我们组织了远足、海滨旅游、将棋、象棋和俳句等活动。俳句特别受印刷工人喜欢，他们要比当时的大多数工人更有文化，因为他们必须认得几千个字。许多印刷工人都是自学的，或是上班以后才学的。

发生罢工时，我们也会赶去支援。我们会张贴传单，这在那时是很危险的。我曾经因为张贴传单而被关了二十九天。

在柴田指导下，我们到周围的各个工厂去，支援罢工，组织募捐。在开展这些活动的过程中，我们会跟新人讨论自己读过的书，再向他们推荐。那时有许多描写工人生活和工厂斗争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比如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有小林多喜二（代表作《蟹工船》）这样的作家。通过这些活动，我们扩大了组织。

培养干部是一个重点。我们会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五到十人，举行读书会。那真的很难。我是一个读书会的领导，但我只上过六年小学，所以我就请一位大学生来教我们。

那时候的政治气氛非常紧张；日本入侵了中国，对政治活动的镇

压非常严厉。每个街角都有警察的岗哨，在我们活动的街区还有一个派出所。警察按时在街区里巡逻。全日本都一样，所以读书会的活动很难开展，光是我们读的那些书，只要被发现了，就会被抓走。

许多搞过学生运动或其它斗争的人，都批评这种活动方法；我们没有跟他们论战，而是专注于工厂。但是活动越来越难开展了——被警方查获的书越来越多，而且在我们的集会上，特高至少会派一个人监视。警方的镇压越来越厉害，每个印刷厂的走道里，往往都会有警察守着。

最后，我们连五一节游行都不能搞了。一切政治活动都被当局镇压了，所以我们成立了俱乐部，组织野餐和其它活动，比如运动会。

我们组织了运动会、赏樱会、俳句会和文学会等活动。我们组织各工厂的工人举行棒球等项目的比赛，这样一来，工会活动家就能避开特高的耳目，把工人组织起来。如果去剧院的话，我们就会唱当时的流行歌曲。我们想通过这些方法与其它工厂的人建立联系。没有其它组织会像我们这样做。

自从一九三一年的满洲事变开始，战局就开始逐步恶化，军国主义在国内也越来越嚣张了。美国实行石油禁运后，政府便企图向南方的印度尼西亚等国进军，企图夺取资源。于是政府宣布“全民皆兵”，甚至还动员了四十岁以上的男性。

在这种环境中，俱乐部的活动减少了，这主要是因为许多干部都被征兵了。尽管我们努力坚持，但开展活动的机会还是越来越少。

当政府勒令所有工会解散并加入御用组织产业报国会时，我们没有服从。就是在战时，我们仍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组织的存在。中小工厂里的工会消失了，劳动条件恶化了。产业报国会其实是战争教育组织，它没有使工人得到一丁点好处。

就是在战时的这种条件下，俱乐部仍然设法开展了一些活动。著

名工运活动家、历史学家盐田庄兵卫³⁷⁴说过，“即使是在战争期间，日本的工会运动仍然播下了种子。”看着俱乐部的活动，我觉得跟他有同感。

我继承了柴田的遗志，试图重建战斗的工会运动。本书是根据我和另外三十六人³⁷⁵的回忆编纂而成的。

柴田坚信，工厂是至关重要的基础——我们在工厂里撒下的种子，将会萌生出来，形成新一批活动家。



³⁷⁴ 盐田庄兵卫（塩田 庄兵衛/しおた しょうべえ，1921年4月15日——2009年3月20日），生于高知县吾川郡伊野町，194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1946年担任东京大学科学研究所助手、武藏高等学校讲师。1950年担任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部讲师，历任助教、教授。1959年设立工人运动史研究会（労働運動史研究会）。1962年担任东京都立大学经济学部教授、经济学部学部长。1965年担任日本科学家会议（日本科学者会議）常任干事。1973年被授予东京都立大学名誉教授称号。1974年担任立命馆大学经济学部教授，1978年担任立命馆大学经济学部长，1987年被立命馆大学授予名誉教授称号。——中译者注

³⁷⁵ 此处也与作者在后记中的说法不一致。作者在后记中的说法是“三十二人”。——中译者注

译后记

由杉浦正男同志执笔的这本《不向风暴低头》，凝聚了出版工俱乐部老会员的记忆，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记录，我们可以通过它，了解到在黑暗、压抑的战争时期，日本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是如何组织起来，设法保卫工人利益的。

这本书篇幅并不长，只有一百八十多页，却触及了工人斗争与工人生活的诸多方面，提供了大量很有价值的细节。

三十年代的日本，社会矛盾十分尖锐，阶级矛盾高度激化，各种思潮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在这种形势下，产生了一大批对现状非常不满、渴望寻找出路的青年，他们“出身贫苦家庭，尝尽了贫穷的滋味……人生中一无所有，对他们来说，整个世界是惨淡无光、毫无前途的……”，但他们“……拥有正义感，渴求进步，发自内心地憧憬高尚的事物，怀有改变未来的理想精神……具有惊人的能量……能够为了正义而忍受任何艰难困苦”，本书作者便是其中之一。

他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柴田隆一郎这样一位优秀的导师。本书讲述的，便是柴田如何把一群有志青年集结起来，启发和教育他们，把他们培养成工运活动家，在艰难的形势下建立和维持了工人积极分子之间的联系，维护工人的利益的。

在二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繁荣时期，日本的各种群众运动曾有很大的发展，也建立起了比较有力的工会组织。但是在二十年代末的世界资本主义大危机的打击下，日本资产阶级为了走出困境，不得不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为此它必须扑灭国内的一切反对力量，也就是要打垮国内的群众运动，首先是工人运动。日本工人运动当中最勇敢、最

富有战斗性、最积极地反抗侵略战争的部分——日本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全协，自然首当其冲，遭到了最严厉的镇压，在三十年代初，日共和全协的组织就几乎被彻底破坏殆尽。

尽管如此，日本资产阶级对于打击瓦解工人运动，依然是很有策略和分寸的，它并没有一下子彻底消灭全部工人运动，那样会遭到激烈的全面反对；正相反，它首先用铁腕粉碎了工人运动当中最勇敢、最主动、最积极的部分，然后恩威并施，逐步迫使主要的工人组织或屈服，或解散，最后所有保持着独立性的工人组织被全部解散，由官方扶持的御用组织产业报国会成了唯一的合法工人组织。

于是，在三十年代中期，出现了这样一种很复杂而又微妙的形势：一方面，虽然日共和全协的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依然有不少共运积极分子成了漏网之鱼，他们虽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仍在设法开展活动；而在十月革命的感召下，社会主义依然对广大劳动群众有着强烈的吸引力，马克思主义在民间仍有很强的影响力，有许许多多对现状强烈不满、渴望迅速改变现实的青年，他们很容易接受颠覆性的思想。另一方面，日本资产阶级也没有一下子全面废除形式民主并彻底走向法西斯主义，各种民主权利虽然遭到了越来越严厉的限制，却还是保留了一部分（比方说，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仍然可以引进，并在书店里半公开地出售，只是要钻书报审查制度的空子），所以，依然留下了不少开展群众运动的合法或半合法的空隙。

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把劳动群众组织起来，保卫他们的切身利益，并与即将到来的战争作斗争，成了虽然与组织失去联系、却不甘就此放弃斗争的大量先进分子面前的重大课题。

对这个课题，柴田给出的答案是：以互助会/联谊会为形式，通过文化、娱乐、互助等合法活动，把印刷工人给组织起来，同时积极协助工人斗争，力图维护工人的生活水平和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进行阶级教育，启发和提高阶级觉悟。简单来说，

就是尽量利用每一点合法活动的空隙，组织和教育工人。

为此，柴田先从建立文学同好会开始，凝聚了一小批志同道合的觉悟分子，然后再介入工人斗争，扩大了影响力，随即建立了日文印刷工的互助组织“和工会”，然后又把和工会改造成了覆盖全部印刷工人的互助/联谊组织“出版工俱乐部”。在这个过程中，柴田始终着眼于在日常生活中维护工人的利益，并不以政治觉悟作为是否接纳工人入会的唯一标准，也不从事冒险的激进活动，而是在合法的前提下，开展求职、娱乐、文化、互助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慢慢推动工人的觉悟成长。

从书中的描述来看，这种做法是比较有效的：在被迫解散之前，俱乐部已经在一百多家工厂发展了一千五百名会员。在被迫解散后，他们化整为零，继续开展活动，并为了维持会员的生计，承包了一家经营陷入困境的印刷厂，进行自主生产和经营。即使是在俱乐部领导层被“特高课”破坏后，剩下的俱乐部会员依然坚持了下去，维持了印刷工人之间的横向联系。而不赞成这种做法的会员分裂出去，成立了自己的工会，但他们的工会并没能维持多久。

在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发起疯狂进攻、而工人阶级又暂时无力还击的形势下，柴田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有序撤退”策略，他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教育、培养了一批先进分子，并将这些先进分子集结起来，为工人阶级保全了一部分力量，或者说火种。所以，在日本投降后，当工人运动重新高涨之时，这些先进分子才能立即投入火热的斗争。为此，柴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这本书里，收录了许多工人的回忆，提供了大量的细节，使我们能够看到，在战时那种黑暗、压抑的气氛中，工人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继续斗争的，我们认为，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经验，不仅具有历史意义，更具有现实意义，于是我们便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希望它能够给现今的中国社会提供一点启发。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同志和朋友的帮助，没有他们，我是不可能完成翻译的，在此我要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首先是国内的“保马”公众号，它在一年前发表了关于本书英文版的一篇书评，其次是 L.X.同志，他看到了那篇书评后，建议我把全书翻译出来；以及一位朋友“伯尔尼库斯”，是他替我购买了这本书的英文版，并将其扫描、传给我；当然还有本书的英译者凯·布罗德本特女士，她为本书的翻译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此外还有许多朋友，在此恕不能一一列出。

由于我的日文还很差，达不到直接根据日文版翻译的水平，所以我是根据英文版翻译后，再根据日文版校对的，在校对中，发现英文版少了一些段落，于是我又根据日文版翻译了这些段落，将其补入译文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赤坂卫君、赤坂羽君和大树君三位友人的大力帮助，才能完成校订，在此我要向他们一并致以感谢。

龚义哲

2020年12月13日

参考书目

1981 年日文第二版参考书目：

《日本工会故事》（日本労働組合物語），未标明日期，东京：筑摩書房。

《与赤旗在一起》（アカハタとともに），白石光雄追悼文集刊行委员会，未标明日期。

《昭和五十年史文档》（ドキュメント昭和五十年史），第四卷，东京：汐文社。

《现代史资料》（現代史資料），第十五卷，《社会主义运动（二）》。

《近代日本工人运动史》（近代日本労働者運動史）。

内务省警保局编纂，《社会运动的状况》（社会運動の状況），第 13 卷（1941 年），东京：三一書房。

内务省警保局编纂，《社会运动的状况》（社会運動の状況），第 14 卷（1942 年），东京：三一書房。

《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太平洋戦争下の労働運動），大原社会問題研究所，1965 年，东京：労働旬報社。

《太平洋战争史》（太平洋戦争史），歴史学研究会编纂，1953年，东京：東洋經濟新報社。

《日本社会运动史》（日本社会運動史），塩田庄兵衛，1982年，东京：岩波全書。

《社大党战时运动方针》（社大党戦時下運動方針），社会大众党，1937年。

《世界民主革命年表》（世界民主革命年表），田宮滋，1948年，东京：民主評論社。

《凸版印刷工会十年史》（組合10年史），东京，凸版印刷労働組合。

2019年英文版参考书目：

Banno, J. (坂野潤治), 《日本现代史 1857—1937》(Japan's Modern History, 1857—1937), 2014年, Routledge: London.

Broadbent, K. and O'Lincoln, T. (凯·布罗德本特与汤姆·奥林肯), 《日本：反抗当局》(Japan: Against the regime), 2015年, 收录于: D. Gluckstein (唐尼·格卢克施泰因) 编纂: 《各条战线上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人民抵抗运动》(Fighting on all Fronts: popular resistanc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Bookmarks.

Dower, J. (约翰·道尔), 《战争与和平中的日本：历史、文化与种族随笔》(Japan in War and Peace: Essays on History, Culture and Race),

1993 年, London: HarperCollins。

Finn, R. (理查德·芬恩), 《和平中的胜利者: 麦克阿瑟、吉田与战后日本》(Winners in Peace: MacArthur, Yoshida, and Postwar Japa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ujihara, A. (藤原彰), 《日本民众的历史(9)》(日本民衆の歴史 9), 1975 年, 东京: 三省堂。

Gordon, A. (安德鲁·戈登), 《战前日本的工人与帝制民主》(Labor and Imperial Democracy in Prewar Japan), 1991 年,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ane, M., 《日本简史》(Japan: A short history), 2000 年, Oxford: Oneworld Publications。

Ienaga, S. (家永三郎), 《日本最后的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日本人 1931—1945》(Japan's Last War: World War II and the Japanese 1931—45), 1979 年,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Mitchell, R. (理查德·米切尔), 《双面司法: 日本帝国的政治犯》(Janus-Faced Justice: Political Criminals in Imperial Japan), 1992 年,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Moore, J. (乔·摩尔), 《日本工人与夺取政权的斗争 1945—1947》(Japanese Workers and the Struggle for Power, 1945-1947), 1983 年,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Morris-Suzuki T. (特萨·莫里斯-铃木), 《昭和: 裕仁日本的内幕史》
(Showa: An Inside History of Hirohito's Japan), 1984 年, Melbourne:
Methuen。

Nimura, K. (二村一夫), 《二战后日本的劳资关系》(Post second world
war labour relations in Japan), 1994 年, 收录于 J. Hagan (吉姆·哈根)
与 A. Wells (安德鲁·威尔斯), 《澳大利亚与日本的产业关系》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Australia and Japan), Sydney: Allen & Unwin。

Ohara Social Science Institute (大原社会問題研究所), 《太平洋战争时
期的工人运动》(太平洋戦争下の労働運動), 1965 年, 东京: 労働
旬報社。

本书收录了许多工人的回忆，提供了大量的细节，使我们能够看到，在战时那种黑暗、压抑的气氛中，工人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继续斗争的，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经验，不仅具有历史意义，更具有现实意义。希望它能够给现今的中国社会提供一点启发。

